

出 版 说 明

本书系由弗朗西斯·科恩等五名熟悉苏联情况的法共党员集体撰写的。文章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苏联社会的现状及其矛盾,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对研究苏联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作者在对外政策方面认为苏联实行“和平外交”,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履行国际主义声援义务”。与此同时,却诬蔑我国的对外政策,攻击我国“进行霸权主义活动”等。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它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作者说明	(1)
引 言	(3)
第一章 历史背景	(23)
第二章 斯大林时期的现实	(36)
一、初步总结	(36)
二、一些看法	(61)
第三章 社会结构的几个特点	(74)
第四章 经济中的动力和障碍	(100)
第五章 政治生活面面观	(131)
第六章 文化与思想意识	(178)
一、文化历险	(178)
二、意识形态的变化	(188)
结 论	(207)

作者说明

这本书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由《新评论》以《苏联和我们》为题发表的文献的编撰工作的继续。

它是在法共二十二大开辟的走向“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景下，一些共产党人集体思考的结晶。

现在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这里将批判性地，也就是说，尽可能客观地来考虑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矛盾以及它在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运动中的意义。

本书提出一些分析、假设、疑问和研究方向。我们将不下断语，只是想归纳一下现阶段的形势。

作者都了解苏联；他们经常在苏联停留，对它进行观察；他们在苏联都有朋友。他们毫不隐瞒他们热爱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

他们认为尤其必须明确说清楚，发展法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共产党人、苏联人民和法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必要性。

本书各章节都是集体研究的成果。但多数章节中体现了执笔者个人看法的色彩。

引言和第一章“历史背景”是由弗朗西斯·科恩^①执笔的。

第二章“斯大林时期的现实”第一部分由亚历山大·阿德

^① 弗朗西斯·科恩，法共原理论刊物《新评论》杂志社社长、《国际研究》杂志主编，法共中央国际部干部和法共党报《人道报》前驻莫斯科记者。一九八〇年春，《新评论》停刊，与法国另一党报《新法兰西》合并创办新刊物《革命》。

勒^①执笔，第二部分由弗朗西斯·科恩执笔。

第三章“社会结构的几个特点”由弗朗西斯·科恩、莫里斯·德卡约^②和列昂·罗贝尔^③集体撰写。

第四章“经济中的动力和障碍”是由莫里斯·德卡约执笔的。

第五章“政治生活面面观”，是由亚历山大·阿德勒、弗朗西斯·科恩、莫里斯·德卡约、克劳德·弗里乌^④和列昂·罗贝尔进行座谈的一份记录。

第六章“文化与思想意识”第一部分由克劳德·弗里乌执笔，第二部分由列昂·罗贝尔执笔。

结论部分是由弗朗西斯·科恩撰写的。

本书这种结构说明了在文风上存在的一些不一致，从而会有某些评价上的差异，对此我们并不自我宽恕。这些都表明我们正处在探讨过程之中，而这一探讨还远远没有结束。

① 亚历山大·阿德勒，法共党员、历史学硕士。

② 莫里斯·德卡约，法共党员、经济学家。

③ 列昂·罗贝尔，法共党员、俄罗斯诗词专家、东方语言和文化研究院教授。

④ 克劳德·弗里乌，法共党员、俄罗斯文学专家、巴黎万塞纳大学教授。

引 言

法国共产党人对苏联需要有一个现实的看法。这出自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下述原因：

由于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这个国家所具有的份量以及它在当代世界中占有的地位，法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状况和法国的形势、尤其是对它们的前途的任何考虑，都不能撇开苏联不谈。

近几十年来，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使人们越来越强调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问题。目前，在这个星球上仍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个制度——人们称其为“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制度——终究摆脱不了破坏着它的四伏的危机。危机来自两方面：世界的一部分已摆脱了这个制度，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体系；世界的另一部分，被称为第三地区，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摆脱这个制度，并且日益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这是危机的根源之一。第二个根源在于这个制度的矛盾本身，除非进行变革，而且这种变革亦能展示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否则这些矛盾将越来越无法解决。

第三个原因是主要的：法国共产党，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召开的二十二大，制定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这条道路的制定主要是依据对我国形势的分析，并通过政治实践，同时也需要了解和研究现有社会主义的经验，或者从中得到启示，或者吸取其教训。社会主义世界是多样化的，它的任何组

成部分都不应被忽视。但显然，苏联在其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它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国际运动中曾发挥过领导作用，因此，苏联的经验和对苏联的态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再者，必须清楚地看到，苏联对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对法共的影响比其他某些党更为巨大。法共的诞生、其生存及活动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苏联，然而法共的许多缺点也应归咎于它。我们可以想到这一点，同时也可以学会不断地纠正这种状况。

苏联本身也在变化，必须对此作出估价。确实，法国人民群众越来越认识到，苏联的现实不是一个应遵循的样板。当建立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条件和特点在法国日益明确显示出来时，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它所采取的方法是怎样出现新的失调的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除此之外，还要补充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法国共产党人这些年来更关心确定自己的道路，更关心对苏联生活中发生的某件好事或坏事就事论事地表态，而没有对苏联提出一套完整的看法。可是，现在存在这样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及其舆论工具的看法。他们把苏联说成从骨子里都是坏的；另一种是一些党员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看法。他们把苏联看成绝对的好。对于往往被革命理想吸引的青年一代来说，以及对于党内占多数的新党员来说，现在是做出努力来确定一个现实的看法的时候了。

为了使观点具有一致性，就不能满足于把一些不同的情况或者互相对立的情况罗列出来，简单地认为某部分情况比另一部分情况重要，而应考虑到这些情况是并存于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的，主要设法揭示苏联社会的总的运动及其带有全球性影响

的变化。

法国共产党人今后拒绝把自己看成或被人看成是围绕下述中心组织起来的一个整体部分，更不是这个中心的附属品；即，这个中心将决定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进程，社会主义将从这个中心产生出来。法国政策的任何细小部分都不可能在莫斯科制定。但同时，法国的工人阶级和法国的革命运动又是全球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进程中，苏联依靠其它力量，但更依靠它自身的力量，在物质和思想方面占有非常现实的地位。这首先是为了扼制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是个“非同一般”的国家，对待苏联经验，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态度：把我们需要的经验挑出来，把我们不需要的经验剔出去。如果我们只限于对阴暗面和光明面进行对比式的描述，人们就可能反过来质问我：难道阴暗面不是光明面不可避免的代价吗？今后我们所倡导的那美好的社会主义难道就没有令人无法接受的坏的一面吗？

因此，我们的态度是全面地观察苏联的现实。为此，我们打算往后看几步，从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及其方向上去识别运动。我们试图集中思考六十年来，在接连不断的动乱中，在这个国家身上打上了深刻烙印的那些事态。六十年来这个国家处于全球斗争的中心。

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个现实是如何构成一个历史规模的现象的。我们不打算用先验论的标准，不打算根据普遍认为“应该”是如何的假设去判断该现象，也不打算把该现象当做一个简单的历史产物来研究，先是历史的前期，这段时期为这个简单的产物提供了以必不可免的预定的方式发展的场地；然后是历史这个受到一些同样不可避免的因素决定的创造者本身。

我们认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应该从它自身的目的、它的诞生和赖以发展的条件以及它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来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把一个普遍适用的蓝图用于某一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当然，苏联的革命和生活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文化和地理条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用很大篇幅来谈这些情况。但是苏联的历史不能仅仅用它受制约的条件来解释。

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在个人或集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唯意志论所造成的一系列主观选择来解释。创造这部历史的男女不是独断专行的决策者所操纵的工具，更不是无条件地受人愚弄的对象。

这就告诉我们，不存在现成的、可以拿过来使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存在将来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时间，把这一蓝图用于法国就可以产生与过去在苏联时不同的（即更好的）结果的问题。既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就必然有千差万异的表现，而该运动的理想的模式只有在运动不断取得成果之后才可能存在，而成果有待于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取。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满足于用引证一些已出现的错误、偏差、失策来作些解释。

错误已经出现。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当错误产生时，就要了解其产生的原因。在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人们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往往比从成绩中学到的更多。

但是难道因为我们一旦列出错误的清单，就算完事了吗？“噢！我们错了，他们也错了，再干吧！”但这些错误、这些偏差是同什么对比而言呢？错误又是同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对比而

产生的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这不是在拒绝进行解释吗？

苏联的历史并不是由一连串的错误写成的，也不能说充其量是错误和正确的路线相交替，也不能说是两者兼有的一个混合体，因为社会主义会带来胜利，主观错误（正如刚才谈到的时空条件那样）会导致失败。事实是，社会主义第一次成功的尝试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实现的，从而造成一些幻想，一种特有的混乱，简单地说，就是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人们不能把造成这些情况的第一位原因轻易说成是理论上的错误。理论上的错误只要纠正过来，就能指导现已正确的革命进程了。摆在我们面前要做的事，千头万绪，怎能仅仅指望靠一个概念性计划来保证，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呢？

如果我们想通过了解苏联的经验来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苏联，研究它的实际矛盾。正是这种辩证法的思想将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

我们掌握的材料无疑是不完整的，但这些材料也决不可忽视。苏联掌握和介绍自己的材料也不少（但它常常被人们忽视），对于愿意阅读这些材料的人来说，是可以获得一些真实情况的。除那些纯系庸俗的宣传材料外，西方的苏联学研究在不同的专题方面都提供了越来越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克里姆林宫学”也有它的贡献：如果人们不再把人员的等级看成政治变化的原因，那么，领导岗位的人事变动便是政治意图和决策的有价值的寒暑表。

我们将以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来充分利用这些材料来源。我们将从中探讨具有现实意义的事实和问题，并把它们同我们个人的认识进行对照。这将有助于我们的设想的形成，也有助于启发我们做出解释。

我们以前对苏联的看法并非始终如一。法国共产党人对“苏维埃国家”的态度是随着法国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变化只能说明它本身就是这一政治形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法国社会党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在都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以多数通过决议决定转为共产党并参加第三国际的时候起，十月革命所显示的历史转折就已在工人运动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从十月革命初期起，法国黑海舰队的水兵和罗马尼亚潮铁的干涉部队就毅然拒绝继续打仗，拒绝向人民的革命开火。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进行了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激烈的思想和政治辩论，这场辩论既涉及这一运动本身的前途，也涉及对俄国革命的意义的评价。

一部分人希望在俄国发生的是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协调一致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十月革命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些人不相信也不希望发生了这场革命，另一些人不但相信这场革命而且坚决地走上了这条新的道路。都尔代表大会选择的的就是后者。

从那时以来，事物也同各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一样，显示了它全部的复杂性。本书不准备一一阐述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这一问题的历史事实，再说它已同法国共产党的历史融合在一起了，而法共历史的许多方面尚有待于探讨。我们只能为开辟这一研究道路奠定一些基础。

正如社会党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样，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法国支部，而且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这是符合当时那种认为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国

际组织这一强烈主张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就是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首次体现。这是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国际阶级斗争中掌握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在实践中,它又导致了另一种情况,即某一时刻,在各国党里出现的不同形势、不同战术观点、不同的战略设想常常或多或少地为集中做出的决定所窒息。这就使得,当时仅仅只领导一个国家并还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党的影响在各国党的中央机构中起着压倒优势的作用。因此,在最初的年代里,当法国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运动遭到挫折,四面受敌,需要实际锻炼和巩固的时候,那种是本国先锋队和国际先锋队的思想,可能在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影响下,起到了松散党同人民群众相联系的作用。一个国际党通过组织机构把它的纪律强加于人并使人被迫接受的想法,可能与工人阶级要在国内扎根和发挥其在本国的作用的观点,即在法共处于斗争的伟大时期曾出现过的观点相冲突。

但是,曾占支配地位,后来一直发挥支配作用的是苏联随着它本身的日益发展,以及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后,所发挥的越来越实际的作用。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在当时就是保卫社会进步的新体制,保卫受到四面八方进攻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堡垒。苏联的失败会延长剥削制度在全世界的寿命。当时人们保卫的是一个支持和平的力量,支持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支持反抗民族压迫的国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在后来的热战中,反苏主义成了帝国主义有力的思想武器。冷战时期,这种反苏主义尤为猖狂。反苏有双重目的,破坏社会主义的信誉和破坏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并为直接入侵苏联创造条件。我们那时候的反映十分

强烈。象皮埃尔·古达特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九四六年在他的《评反苏主义》一文中竟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说：“每打击一次苏联，国际法西斯就赢得一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始终是正确的。”一九四八年十月，莫里斯·多列士提出如下口号：“法国人民将来不会、永远不会同苏联打仗。”

这些言论并不是象某些人所企图歪曲的那样是什么效忠行动，而是一种政治行动，一种在团结各种反对战争和反对社会倒退的力量中发挥了作用的政治行动。

今天，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使用反苏主义这一武器。只不过由于帝国主义本身的地位因受到各种危机的侵蚀而它大为削弱，我们的反击也不再是背城借一之斗了。我们在反击中采取的是更有论据的、更合适的形式。我们已学会从无条件的保卫过渡到象本书所尝试采取的这种解释性方式。

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把第一次社会主义的实践看成是普遍适用的模式的倾向。

这里带有一点幻想的成分，即认为钥匙找到了，门已打开，人们便可进入天堂了。显著的成绩导致了某种理想化的看法。在这理想化中产生了观念的斗争。在实际存在的或设想的错误面前，我们仅仅看到的是社会和文化的进步、经济的飞跃、“新人”超众的典范，却有点忘记了历史本身自始至终贯穿着矛盾，不能因为别人决定那样做了，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在什么地点和时间都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这本来是不应该忘记的事情。

就因为苏联当时在向前发展，所以认为那里的一切都是好的，这样想，这样说，难道不是有点公式主义了吗？过去认为凡是来自苏联的东西都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我们永远信任这个

历史的开拓者，它开辟了所有的道路，我们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我们曾宣布自己是斯大林主义者。因为，由于苏联本身，也由于它在世界上的敌人，我们曾把苏联党的总书记个人看成是整个新制度的化身。这种个人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是庸俗的。苏联实行的极端集中制使斯大林得以干预苏联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当时对待斯大林的感情，并不是出于效忠，而是把它当做激励人们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种思想和政治方法。

一方面在三十年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苏联的影响下获得新生的。苏联在出版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启蒙下取得的成就带来的威望引起了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的注意，这时正好遇上了由于法国工人运动本身的需要而引起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热潮。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后来又在战后，一种把科学精神缩小为某种逻辑规划的倾向在我国盛行起来了，这给人们接受斯大林时期的那种相当荒唐地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做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切不可忽视理论上的思考和日常政策之间常常存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仔细地检查一下我们接受的在那个时期最典型的一种教条主义的歪曲——李森科^①的生物学理论，就足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在哲学和科学实践的关系上我们有机械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对来自苏联的一切采取了完全信任的态度并把那场辩论拉入冷战之中，使辩论立刻带上了政治含义。这仅仅只是一个例子。

^① 格·杰·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曾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提出植物分阶段发育理论和春化法等。他把自己的论点和看法称为“米丘林遗传学”，反对摩尔根学派的基因理论。一九五六年后受到批判。

总的说来，对我党的历史进行客观研究取得的进展无疑使我们在对待苏联和苏联党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两党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因素，以及国际形势的因素，这种变化不是连贯的。苏共对法共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实践，对我党毋庸置疑的创建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人们对法共使自己的立场扎根于民族之中这一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法共来说，这是一条反映它的基本力量的，一句话，是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路线。

在法国党的重大创举中，我们可以以一种获得和人民阵线的思想同样重大成果的思想为证，这一思想尽管最初遭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反对，但它仍然使人折服了。同样，一九五零年我们提出战争并不是注定要发生的论点，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具有创建性的政治行动。当时提出这一论断时，正值法共由于冷战而继续处于孤立的状态中，这无疑助长了党内那些要求紧密团结在僵硬态度的苏联周围的深刻倾向。

重新进行认真的检查，无疑会说明，我们在一个时期内，轻易地接受了被斯大林简单化和教条化了的“列宁主义”。

必须强调说明一下，这里指的只是简单化和教条化了的列宁主义，因为，人们有时企图使我们通过拒绝斯大林的观点来走上系统拒绝列宁的观点。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这就提出了列宁主义的问题。

人们不能把列宁的著作看成是解决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也不能把它看成是过去对待政治问题所采用的一系列解决办法——只是把过去的办法照搬过来解决新问题的解决办法。人们不能从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一种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丹或思想工具。如果列宁主义是这样，那么一些人不

愿再称自己是列宁主义者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认为，列宁以及受列宁启示的人们的著作和活动具有另一种价值，就是提供了对现实进行分析的方法和政治领导的重要经验。这些方法和经验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对它们的研究依然是吸取教益的源泉。这一源泉远远没有枯竭，而且还有待于全面的探索。

那么，是否还需要继续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不但应该提，而且除了提以外，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人们赋予它的是什么含义。有各种各样、甚至互相十分对立的政治实践和理论都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致它们之间共同的东西也不能使它们互相接近，反而造成思想混乱，使社会主义的敌人有利可图，有机可乘。除非是提出实际的问题，我们将避免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结论。继续只从互相排斥的角度去考虑这些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或者想方设法来吹嘘“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然而我们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马克思和列宁同任何其他的大思想家一样，并非毫无差错，一贯正确。他们的功绩并不是提出了永恒的真理，而是善于分析他们时代的社会，以便从中找出加速这个社会本身运动的行动规律。马克思极为明确地说过：“共产主义是实实在在的运动”。第二，列宁并不是把马克思所制定方法简单地运用于革命现实的人。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首先是同马克思的事业、然后同列宁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上面所举马克思的名言就是以这种现实为依据的。这一历史经验在长时间里新起的后果，以及这种经验具体体现的多样化，是否会使马列主义的概念失去其普遍的参考意义呢？人们这样问并非荒谬之

词。

现在我们不再否认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制度所犯下的罪行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偏差。本书有一章专门谈及该问题，这并不是为把这一问题讲透，相反，是为了促进人们重新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故不在此展开谈了。我们仅仅想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过去否认这些罪行？而现在为什么又不否认了？

我们不能只限于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何况这都是些简单的事实呢。确实，我们和其他任何人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是沉默的或无动于衷的同谋犯。但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盲目性呢，对这种盲目性的解释决不能脱离法国工人阶级当时正在进行重大斗争的现实：一九二九年是苏联第一个镇压高潮的开端，这次镇压同实行集体化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出现了，失业，战争已露出苗头，法西斯已在扩张并在反苏的名义下威胁着各国人民。在进行莫斯科公审的年代，与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灾难性情况相反，苏联出现了惊人的经济飞跃；人民阵线的成立，西班牙战争的爆发；这些事件统治了阶级斗争的舞台。不久，帝国主义成功地孤立了法国共产党人，一九三八年慕尼黑的会议煽动了法国五分之四的力量来反对法国共产党人，反对苏联。

在这种条件下，某些人看到了我们未能看到的问题。我们的错误在于无视或怀疑了这些人的动机和观察力。但是，当时最终促使我们下决心的东西，是双方在我们所感受到的敌对阶级的决定性战斗中所处的地位。一切反苏的论点都遭到我们的

反对，因为我们从反苏论点中看到那些世界性势力令人不安的增长，这些势力企图通过战争来摧毁苏联的阵线，以便加强他们对劳动者剥削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当别人在这一点上反对我们反对对了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整个是对的。在承认我们错了的时候，我们也决不会同他们合流，不会退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社会主义以前的观点上去。

同时，难道不应该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为了把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进行到底而曾经在一起奋斗过的人们之间发生了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发展到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从肉体上消灭的程度。我们当时把这些斗争看成是正常的。人们可以看到上述情况的出现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当时存在着需要磐石般团结一致的思想，这种思想符合当时一个自称是先锋队的年轻党要把自己确定为并组织成紧密团结的力量的需要。它必须摆脱各种传统，战胜内部派性的争吵，进一步投入往往处于孤军奋战群敌境况的战斗中去。当时人们没有觉察，在苏联，一党制可能会把党内的思想一致和社会上的清一色混为一谈。实际上，这种思想一致和清一色必然是虚假的，因而，也是靠强制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同类事件也产生很大影响：一七八九年的英雄们^①曾互相揭露是叛徒。法国革命者之间互相屠杀。法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常常受到叛变的干扰，比如说多里奥^②叛变在三十年代曾严重地损害了党。之后，地下斗争的严酷条

①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参加者。

② 雅克·多里奥(1898—1945)，法共党史称多里奥是法共的叛徒，一九三四年被法共开除出党。他曾进行了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活动，反对人民阵线，抗德战争期间公开倒向法西斯，同纳粹并肩作战。法国解放后，逃到德国，被人杀害。

件必然造成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斗争的极端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曾对象托洛茨基或布哈林（仅举此两人为例）这样人物的思想和著作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两位伟大人物在苏联至今尚未被恢复名誉。难道不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利用工人运动的分裂（常常成功了）这一事实，使我们曾跟在苏联人的后面，毫无道理地把一些工人运动的流派统统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至少部分情况是如此）吗？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了呢？现在我们开始承认罗莎·卢森堡^①或葛兰西^②的重要作用，但并未陷入盲目的敬仰，也未丧失批评的精神，难道不应该也估量一下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思想以及遭到类似命运的其他人物的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不同组成部分的复杂历史中所应占有的地位吗？

因为世界变了，我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总看法也变了。

难道说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吗？我们来阐明一下，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和在法国发展壮大，我们党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发展了，而苏联的地位相应地缩小了，因为它不再是独门独店了，随着我们的发展，法国共产党人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具体了，因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作为一个现实的前景问题直接摆到了法国人民面前。

另一方面，苏联本身也在变化。苏联在取得无可争议的进

^①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原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后参与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卢森堡强调群众性罢工是无产阶级唯一最重要的斗争手段，认为客观条件的自发结果必将使工人激进化并推动革命前进，不强调需要有严密的党，认为从斗争中会自然产生组织，强调民主，反对民主集中制。

^② A·葛兰西(1891—1937)，一九二一年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九三六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入狱，直至一九三七年在狱中逝世。主要著作有《狱中札记》等。葛兰西的思想被认为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源泉。

展的基础上，它本身的缺点接连不断地暴露出来。随着岁月的推移和冷战趋于平静，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矛盾和缺陷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因此，这个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它作为样板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使得这个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苏联同它的世界性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盟友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还必须看到，近年来，这些缺点和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有两件大事加速了这些变化并说明变化的深度，这就是：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揭发了前一时期的骇人听闻的错误；一九六八年苏联和另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改革横加干涉。

然而，法国共产党确实过了很久才从苏共二十大中吸取教训。由于这种迟缓态度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这一迟缓的原因。虽然对历史还缺乏详细的研究（这一研究有待于继续进行），但仍然有可能对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尼基塔·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揭发了斯大林的过火行为及所犯的政治错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三年里，这些错误和过火行为已被揭发出来并部分地得到了纠正。这个报告的文本随后在苏共党内进行了传阅并向人民作了通报。在同样情况下，也向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作了通报，但从来没有公布过。几个月后，一个有些地方被歪曲了的文本传到西方，随即在西方被翻译和公布出来。只有当时参加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其中包括当时担任法共总书记的塞里斯·多烈士知道这个报告。即使是他们，也是在一种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知道的，有人把俄文本交给他，限他在几个小时内看完，并且要求他不要作笔记。

但是报告的内容并未为法国党所了解，特别是，这个报告似乎也没有马上引起象在其他党内，比如在意大利党内所引起的那样重大的反响。比如当报告人向共产党人汇报二十大情况时，还高呼斯大林的名字，通过这种作法来回答人们普遍的观望。

造成这种观望态度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对苏共新领导缺乏信任。苏共的这些揭发不仅同过去的表面现象相矛盾，而且也同过去两党在多方面的合作以及同斯大林本人合作的经验相矛盾。即使看来基本情况是属实的，并且同合作的其他方面是无关系的，但是，这种揭发似乎是过份的、不确切的、缺乏说服力的。法共领导决定首先要求做出解释，以便了解所描述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同时也是为了对所发生的事实加以证实。

更深一步讲，对很长一个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论、政策提出疑问，这难道不是对党内和党的领导中的绝大多数仍认为是基本的和无可争辩的思想原则和行动原则产生严重的怀疑吗？

造成这种观望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无疑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当时法国正在进行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殖民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党进行的反对这场战争的斗争是艰巨的。为此，它实际上再度陷入孤立境地。一九五六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左翼（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多数，而社会党政府使国家更深地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同英国一道对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发动了惩罚性的征讨。这一年，在二十大以后，在波兰，特别在匈牙利又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导致猖狂的反共主义的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莫里斯·多列士和党的领导面对二十大的揭露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就不难理解了。他们认为这些揭露可能

会在党员中造成混乱并损害苏联的威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难道不是对党对付这一局势的能力以及对党向群众说明真相的勇气缺乏信心吗？拒绝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不是阻碍了对新事物的了解、妨碍了人民联盟政策的制定和进行民主的实践吗？而两年后戴高乐上台的事件不反而迫使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提上了日程吗？

随着斯大林一贯正确的神话的破产以及苏共领导内部出现的严重分歧，关于由一国共产党指挥的一系列概念——曾或多或少为我党接受的概念被否定了。苏联不再是一个样板，它的经验失去了普遍的意义。我们曾经在理论和做法中所采纳的苏联部分应以批判的精神来加以检验。

诚然，我们否定了苏联把事情都说成是“个人迷信”的恶果造成的那种解释，但我们却接受了“这是在一个健康的肌体上出现的肿瘤”的那种说法，而且我们迟迟没有从社会主义本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中去探索存在困难的根源。这大概妨碍了我们观察和承认我们两党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分歧，从而迅速走向确定和实践我们自己的民主道路。

也许这正是我们未能做好充分的准备来理解一九六八年五月一六月^①风暴的所有反对垄断、要求民主的各组成部分的力量的原因之一。

一九六八年八月后，在由于五、六月的阶级大搏斗而出现的新形势下，尽管党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但党却反而因此制定了一项大胆的政策，第一次提出今后的社会主义将是公开摆脱苏联的模式并扎根于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具体实践的社会主义。

^① 指法国的“五月风暴”。

一条以民主为阶级斗争的舞台和手段的法国道路形成了。

同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违反了我们的坚定信念，即，社会主义的变革只能来自本国人民的大多数的愿望，并采取人民自己选择的方式，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在苏联党对其国际义务的观念同法国党所肩负的法国人民的运动的利益之间可能会出现不调和。这自然使法共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当然是荒谬的，倘若法国遭到苏联的侵略，我们将站在保卫祖国领土的最前线。这就促使我们更加认真地去制定完全独立的法国的国际政策。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去进行理论方面的探索。近几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和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我们已进行了许多工作。我们出版了大量已被人遗忘的或不曾见过的俄文、意大利文或其他文种的基本文献。我们并不想用几句话来对这些文献作出评价，而只想限于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以及对为了使法国的运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可能从苏联的经验中得出哪些结论提出一些看法。这是我们想建议的研究方向。由此看来，大量的专题著作、综合性著作、辩论、理论著作都占有它自己的地位，或更确切地说，都是需要的。但愿这些出版物使人感到兴趣。

理论上的这种合理的渴望显然不能掩盖下述事实，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能靠简单的观念上的争论来解决，而主要是靠实践和对实践的研究。实践才是理论研究的目的。

法共对世界社会主义及对自己本身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批判，主要也靠自己的政治实践。法共对苏联以及对苏联的重要性的看法的变化，是法共本身发生总的变化的组成部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本书也是置于共产党人当前正在进行研究

的共同园地之中的一部著作。

我们不打算回避下述几个大问题：苏联是社会主义吗？苏联有哪些内部矛盾？能否对斯大林造成的损失作个总结？恐怖是不是制度的产物？在苏联是否已形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是什么？苏联是否存在经济的或政治的危机？

但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提供的答案只能是部分的并且是有局限性的。这不是仅仅因为本书的篇幅不能令人满意地全面铺开，更不是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编辑一部有关苏联的教科书或是想绘制一幅苏联的全图，而是因为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地对苏联进行研究和观察。

现在已有大量书籍谈到苏联的政治实践、机构和思想。但是不能仅仅看到这些上层建筑而忽视了社会演变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不管思想和机构多么重要，都不是一种随意的和独立的东西，而是建筑在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之上的。这就是说，政治民主不能独立于经济民主，当经济民主欣欣向荣时，政治民主决不可能死气沉沉。

一般地讲，必须明确地说明苏联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出现了某些缺点就全面谴责这个制度，也不能因为它有某些优点就闭眼不看其缺陷。有一个时期，我们曾坚持认为坏的方面正象疾病一样，它侵蚀着这个肌体，却又不是来自这个肌体本身。

今天，我们要正视这个肌体总的运转情况，承认它存在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懂得进行对比，才可能取得进步。

当然，只有苏联人才可能从他们自身的发展中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们这样做。我们不可能向他们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建议。我们准备做的就是进行调查、分析和提出一些设想。我们意识到，这一工作是微妙的，然而基于下

述两点理由，又说明这样做并非无必要。

第一，法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光明正大的基础上。分歧显然存在，但决不是出自某种情绪或碰巧引起的分歧，而是实质性的分歧，是有待进一步明确和弄清的分歧。这是献身于同一个世界性社会运动的各政党进行合作的良好条件，因为，我们支持的，是这个历史性的运动，而不是这个行动或那个措施。

第二，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苏联的经验以及所有社会主义的经验，以便丰富我们本身的经验。在这方面，问题不在于如何吸收正面的经验，警惕反面的教训，而是要懂得是什么动力、什么联系、什么结构、什么关系、什么环节在起作用，从而从一个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第一章 历史背景

这一章的宗旨是扼要地叙述一下历史背景。这样，读者就可以了解后面一些章节谈到的重大历史运动和重大问题发生的背景情况。后面的几章就可尽量避免本章评述年代所造成的过于概念化的毛病。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苏联的现实，在其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只能从它自己所确定的目标和它遇到的具体问题出发去进行理解，或者说去进行判断。

因此，我们试图在本书中阐明苏联社会主义的六十年历史中各重大时期的目标和问题到底是什么。如果读者想要更详细地了解各种事件、人物和体制的演变情况等，则另有大量专著。如果他们善于以批判的精神去阅读的话，这些专著将可提供有用的材料。这里恕不赘述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即公历的十一月七日（苏维埃俄罗斯是一九一八年采用公历的）。

这一天，资产阶级民主临时政府被推翻，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政权移交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手中，一切问题也都涌现出来了。

革命决不是一次政变。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干革命是为

了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实现和平、土地归劳动者所有、政权归人民的直接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掌握。

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得到大多数人支持拥护的、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政治家和理论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指出：对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所面临的情况并不象社会主义的大师们曾设想的那样美，情况恰恰相反。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政权必须去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为革命不是在一个已经准备好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

没过多久，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想法生存下去。

欧洲的战火继续在燃烧。当时，列宁毫不犹豫地指出，必须摆脱战争并接受同德国缔结“耻辱的”割地赔款的和约，这就是代价极其昂贵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要生存下去。跟着就是挫败十四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取得对旧政权的支持者“白匪”所发动的内战的胜利。

要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垮了，它的成员拒绝为苏维埃服务，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行政机关、军队(因为要打仗)、警察(因为被推翻的阶级并不甘心)。

除共产党人以外，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都不信任新政权，他们都指望新政权垮台或失败。合作的尝试(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流产了。所以一九一七年选举出的已转向过去并已被群众抛弃的立宪会议，没引起什么反响就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党重新处于孤立境地，一党制则变成了行使政治职能的方式了。

革命仍在继续进行，后来在西欧失败了。社会主义竟会在俄国建成，这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要在孤立中、在旧职人员的逃离所产生的紧迫情况下生存下去，就需要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和能对各个领域进行干预的群众；于是，文化革命立即开始了。

一九一八年中期

由于武装干涉，内战也开始了。这场内战一直打了三年。而当时的原因，主要的是社会和政治原因，预示着这场内战将赢得胜利。

工人阶级为保卫政权而战斗。这个政权首先通过实行工人监督、然后实行工业国有化的政策而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

农民获得了土地，而由地主贵族组成或由他们所操纵的白军不允许农民拥有土地，布尔什维克终于找到了建立工农联盟的道路。

武装干涉在人民的抵抗面前失败了。帝国主义在战争结束时已大伤元气，而且它本身也受到革命的威胁，十月革命博得了国际劳动者的声援，甚至引起一些军队的倒戈、哗变。

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它的第一部宪法。各国革命者之间的联系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建立起来了。

随后又出现了白色恐怖。列宁遭到谋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企图策动政变。为对付白色恐怖，人们宣布实行红色恐怖。

国家远没有恢复元气。形势还在日益恶化。预定的社会和民主纲领未能成为现实，实行的却是人们通称的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供给制、商业国有化、农村实行余粮征管制以及实行集中制等。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内战结束了，形势十分严峻。应付这一局面的办法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尤其对农民做了暂时的让步。新经济政策及其它所带来的特殊问题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即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里一直起着主导作用。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实现工业化。一九二零年提出电气化计划。一九二一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工人的人数减少，他们有的开赴前线担任部分行政管理或领导职务，有的因工厂停工而返回了农村，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队伍。

一九二六年，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人们着手准备实行五年计划。这是社会主义经济集中管理和计划化原则的第一次实践。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

由于人们付出了巨大劳动，从一九二九年起，工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激起人们普遍的热情。这种热情越过国界，得到了反响，尤其因为时值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危机的开始阶段，反响就更大了。国家的工业装备和城市化建设都迈开了巨大的步伐。

这一时期也是社会运动、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出现巨大冲突的时期。正在壮大中的工人阶级同负担依然沉重的农民群众及新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之间正建立起一种极端复杂、极端矛盾的关系，而外部的威胁又日益增长。年轻的社会主义只看到

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加速历史的进程。用一部描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小说所用的标题来说，叫做“不能喘息”。

这是进行抉择的时期，这一抉择给苏联和世界以后的几年或几十年的命运打下了烙印，使第一个社会主义显露出明显的矛盾的面貌。

人们进行了决定性的选择，实现农村集体化。这是悲剧还是在前进呢？两者都是。实现集体化的理由如下：

一、城市化建设的需要，1. 工业劳动力队伍的形成要求农村输出人口，从而要求留在农村的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2. 要求增加对城市食品的供应。

二、对农业开始进行装备，生产力必须发展，小农户对此还不适应。

三、农村亦出现社会演变：1. 富农走向恢复对工资劳动者或雇佣劳动者的剥削；2. 同时出现“中农化”农户对上述劳动者的剥削，也就是说，当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中等规模的农户人数在增加。

四、通过农村的社会主义化来贯彻被称为“列宁的合作计划”的理论。

事实上，总的说来，集体化是以强迫的速度进行的，往往是以强制代替说服。消灭富农，同时也往往消灭中农，使国家丧失了最好的农业生产者。农民群众表现出敌意和不理解，行政当局又显得软弱无能，这些除了导致叛乱或流血的清算外，还造成对牲畜和物资的破坏。

结果是，人们不可逆转地跨越了一个社会阶段，农村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道路，同过去彻底决裂了。这是以巨大的生命的损失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的代价换来的。但是一

个新型的农业取代了旧的农业。

一九三二年进入“巩固”阶段，集体化阶段已告结束，原则上社会已变为清一色。

在这些年月里，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中的政府体制发展起来了；越来越强有力的警察机构的活动和越来越具有强制性教条主义的思想变成了政权统治的手段。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

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了。所追求的工业化实现了。而国际形势却紧张起来，西班牙爆发了战争，法国人民阵线好景不长，希特勒的力量在加强并形成了威胁。

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以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几乎全部是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人们想象的和介绍的也许还不到这个程度）。同新的社会所有制的体制和文化革命紧密相联的新的政治形式载进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的宪法中，它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

苏联变成了一个强国。这个强国后来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使人敬服。

国内的关系继续趋于紧张。大规模的镇压使苏联的一部分创建人消声匿迹，使大批党组织遭到破坏，大量的知识分子遭到杀害。教条主义使理论思考瘫痪了。这种状况，再加上孤立的处境，削弱了人们的创造精神，这同国家通过社会文化变革促使人发挥创造精神是相矛盾的（下一章将专门阐述苏联发展中的这一关键问题）。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

为打破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这个堡垒的包围而进行的种种外交努力失败了。尤其是，一九三四年的斯大林——拉伐尔条约实际上未收到效果。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举行的慕尼黑会议上，“西方民主国家”在反苏主义名义下向希特勒妥协了。

必须争取时间。于是又进行同英法结成联盟的新尝试。当这些新的尝试面临失败时，又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人们只是部分地赢得了时间。红军的力量由于清洗而被削弱。当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发动侵略的时候，红军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刚开始。

在大陆的另一端，在回击进犯苏联边界的阴谋活动中所显示的军事威力^①，迫使日本置身于冲突之外，但它却保存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四零年——一九四五年

“要生存下去”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来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不能单方面实行它在集体安全名义下主张的合作与友好的政策。西方对侵略者的消极被动态度帮了侵略者的忙。

苏联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上台的资产阶级相对被削弱的地位作为欧洲其他部分同苏联之间的一条“安全带”，并恢

^① 指一九三九年六一八月的哈勒欣河地区战役。苏军在蒙古的哈勒欣河以东击退了入侵的日本军队。

复了它的传统边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并入了苏联。罗马尼亚让出了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属于波兰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那些土地也于一九三九年底在波兰垮台时被苏联收回了。

对芬兰的战争爆发了。芬兰当时既同希特勒结盟又同一些西方国家结盟，而且它拒绝进行苏联认为对其安全是必不可少的边界调整（列宁格勒就处在芬兰领土上的大炮射程之内）。开始的不利战况暴露了红军的弱点；这个警告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并非无益。

一九四一年六月战争爆发后，苏联所有的武装力量都经受了最严峻的、无可置疑的考验。

政权坚持了下来，特别是在被占领区坚持下来。苏维埃的爱国主义同狭隘的爱国主义融为一体。这是以持久地恢复民族主义的传统而不是民族的传统为代价的。原集中在被占领区或受威胁地区的工业向东迁移或重新部署，在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伟大业绩。由于付出难以想象的劳动和置身于最艰苦的条件下，因此，后方、人民和妇女在做出牺牲方面和在工作的效率方面，都堪与军队相比。这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苏联的文学、电影，以及深刻点说，苏联的集体意识等不断地回顾战争的年代，而且搜肠刮肚，不厌其烦地挖掘战争年代中那些表现伟大或渺小的、历史性或日常生活性的、道德崇高或败坏的、悲剧性或喜剧性的等变化无穷的观点。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祸及所有人的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的民族创伤（十个居民中有一人死亡，遗留下两千五百万孤儿，两千五百万人无家可归；这个数字还远远不能体现战争祸害的程度），也不是因为人们情愿无止境地抚摸战争的创伤，也不是人们出自对

体现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形象的胜利的自豪感，而是因为战争最强烈和最现实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有一些直接反映阶级形象的，斯大林格勒或列宁格勒的工人直接从工厂开赴前线，集体农庄庄员反对其新老主子反扑回乡。俄罗斯人的传统品质（哈萨克人，乌克兰人，各族人民都有自己特有的品质），例如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同正在培育中的新一代人的品质融合在一起。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政权有广泛的可能性将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而由纳粹的狂热所鼓动起来的民众大联合却因大资本的危机和大联合内部的不可避免的互相对立而分崩离析。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

必须重建一个人力物力遭到巨大损失的国家。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工业生产增长一倍，而苏联的生产减少了三分之一。恢复生产是紧迫、迅速而又困难的，劳动力特别是在农村，遇到极大的困难，必须重新部署工业力量，这就是在重新建设西部的同时，发展东部的新工业。

东欧和中欧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结盟国家的整体，加强了苏联的地位，但同时也使苏联肩负起新的国际职责。

过去，当整个法国大资产阶级向德帝国主义投降时，英美大资本为了顶住德帝国主义而同苏联结成了同盟，但在战争胜利后，各帝国主义又重新结合起来，反对它们的共同敌人——社会主义，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影响深入全世界，并且还在扩大。不久冷战就出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起，在广岛和长崎

投下的原子弹，除了对主要由于在苏联的攻势下，当时事实上已被打败并正被赶出亚洲大陆的日本是致命的一击外，也是对苏联的一个明显的警告。一九四六年春，邱吉尔在富尔顿的讲话中就定下了破坏联盟的基调。

精疲力竭的苏联没有喘息的机会。被胜利证明似乎是正确的那些方法，在冷战中又发挥了它的威力。

一九四六年的恶劣收成，使定量供应的办法又延长了一年。一九四七年的货币改革回收了由于战争和走私造成的过剩货币。逐渐降低物价的政策使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以增加设备、从农业和轻工业中提取积累为宗旨的五年计划又恢复了。在科学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巨大的，这种努力带来了军事上的重大发展（并加速建立了必要的原子武器库），可是这种军事上的发展耗费了国家的有生力量。

国际活动的基础是：建立一个反帝阵营，支持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欧洲国家，支持中国、朝鲜等国的革命和解放运动。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零年左右

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四月（译注：应为三月）逝世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改组时期，这个时期的顶峰是一九五六年初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谴责了斯大林的镇压做法，个人迷信以及他的教条主义，宣布恢复列宁主义准则和法制。大会提出和平共处的政策，承认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化。

一党和国家机关逐步恢复了政治活动。非法的镇压停止了，对过去的违法活动尽可能地进行了纠正。对农业生产采取了力求使其获利的措施。

由政治变革激发起来的**活动**，使国内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赫鲁晓夫**（当时已是党的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的狂热和探寻奇迹般的解决办法，使部分活动受到鼓舞，部分活动受到阻碍或走入歧途。

这时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通常说来）同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显得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同生产的规模、复杂性以及同人类的能力显得不相适应。事实上，人们所遇到的是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达到的社会化水平所提出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形势阻碍人们解决，甚至看到这些问题。）以及从那时以来积累起来的所有问题。

核心的问题是投资的利润下降，这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个危险的信号是：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的计划被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的另一个七年计划。于是一个群众参加辩论的大规模地讨论和实验的时期开始了。

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八年

一个集体领导班子取代**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之后，一九六五年便开始对经济的计划化和**管理**进行改革。企业同劳动者、企业同各级管理机构之间的生产关系，集体农庄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粗放的发展原则代替强调质量的集约发展原则，这成了一个总方针。计划化和**管理**方面的几乎绝对的集中制不得不开始让位给各级发挥的主动性。

农业终于动起来了，而且它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成果。工业方面的成果并不那么明显，或者不那么容易看到，看来，

只要未出现自下而上的变化，成果的出现就会受到阻碍。尽管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服务行业和分配行业的变化却很不够。

看来一个导致发生大变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但这个进程却似乎缺少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动力。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正是这个进程以及它所碰到的矛盾、顺利和反复。这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中，社会主义发展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阶段。苏联理论所称之为“发达的社会主义”（或“先进的”或“发展的”社会主义，这是对同一个词的三种译法），或者称为“臻于成熟的”或“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正是这个新阶段。

当前的目标已由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一年）和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六年）确定。经济发展的目的已经颠倒过来：它不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生产为了消费、为了满足需求。生产社会化的新阶段是由生产所达到的规模、以及各生产部门之间联系的复杂性（因而要发挥信息化的作用）所确定的。

一些严肃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劳动生产率增长太慢；科学技术的发明投入使用阶段的时间拖得太长；由于消费资料的生产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使劳动的物质刺激遇到困难等。事实上，劳动和产品的质量始终贯穿各个阶段。充分发扬民主和更好地使劳动者参与管理的问题始终存在。

在短期和中期的中心目标里，有些目标很庞大，而且所宣布的改革造成的影响又难于估计。有些目标涉及领土整治和对矿物资源或人力资源使用的重新组织问题，它这些目标还将在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带来重大后果。附正在修建中的新铁路干线

(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沿路的中部和东部西伯利亚大量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这种情况。在无黑土区，也就是差不多在整个的俄罗斯中部地区，恢复农业、建立居住区和居住人口的做法也是如此。以谨慎的方针走向建立大型农工社会经济综合体的做法，即把一个小区或一个大区的活动都集中在现代化技术和文化水平上，下放决定权并使综合体拥有或多或少是重大的自主权的做法，也是如此。初期教育和职工教育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整个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方针和人才培养都存在问题。

如果说有人可能会贸然提出一些设想，那么一定会首先想到进行变革会遇到明显困难，尽管人们承认变革是必要的。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及其活力能够顶住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影响，而使它不受到多大损失，但是却比较难于对付自然灾害和军备竞赛所不得不承受的繁重负担。看来，主要是结构、习惯、政治生活方式、成堆的未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严重阻碍着在生产关系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中进行的变革。而且变革进行得很不平衡，甚至还受到强烈的抵制。政治领导人长期不变、第十个计划小心翼翼、思想意识上重复老一套，这些都是进行抉择时迟疑不决的表现。

第二章 斯大林时期的现实

一、初步总结

在法国共产党人发表关于苏联情况的著作中，对在该国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大规模专横无理的残酷镇压这一令人痛心的问题不能不进行探索。

我们同时想在这里向读者提供一些考虑问题的素材，使他们能够了解几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那些时期中，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职能格格不入的做法在苏维埃政权活动中占统治地位，我们还想就促使这些情况发生的实际的历史力量提供一些只能是十分概括的说明。首先我们要着重声明，尽管这些事实显然是不能饶恕的，并至今仍严重地损害着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形象，它们却丝毫不是历史上某个失去理智的杀人犯的表现，更不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有些人为了从根本上打击社会主义思想而把排斥一切民主体现的大规模的暴行、系统的血腥镇压、专横独裁和粗暴的做法说成是革命的必然产物，这种情况今天并不少见，此外，有人还认为，斯大林去世以后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对此必须加以澄清。因为某些政策获得急剧发展，在时间上是很有限制的。这并不是说这些情况是由于偶然的外来因素而发生的，在这之前是有根子的，在这之后也有其后果。但三十年代和五

十年代初，是最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时期。

革命初期

无可置疑，革命的最初十年不能被看成黑暗的年代。在这个时期里，苏联革命曾经有过，并证明了它可以有另一种面貌，不仅列宁在世时是如此——一九五六年个人迷信的反对者曾试图把列宁说成是具有一切人道主义和自由的品德的人——，而且只要某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未受到新的问题的破坏，那么情况也会是如此的。

革命初期的情况究竟如何？决不要把这一时期概念化，尤其不要按照目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而把它美化。这是随着旧的生活结构的全部瓦解，整个社会现实客观上发生强烈动荡的时期。这一大动荡本身就带了混乱，它是在长期疯狂的内战和外来干涉所造成的过度的暴力和极端贫困的环境中发生的。

这首先是孕育着混乱的时期，当时的革命只是由于俄罗斯群众对它自发、巨大的信任，才在最严重的困难中取得了胜利并巩固下来。显然，这一时期的许多方面不能被看作是某项既定政策的直接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权无法完全控制局势；当时的局势好象难以引流的熔化了了的金属，强加在它头上。内战的加剧导致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连续发生，许多无辜者遭到死亡。干涉军所进行的敲诈勒索无疑加强了不加区别的复仇情绪。二十年代初的饥荒象瘟疫一样地蔓延开来。这样的一场革命不是带着白手套进行的。

切实地了解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为应付时局而表现出来的政治毅力，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这一政权虽被指控在初期

采取了许多恐怖手段，但它却无疑是历史上最注意保护生命和一切文化艺术财富的革命政府之一。尽管当时局势无法控制，政府的这一态度却使革命的日子里杀的人很少，文物的破坏也达到最低的限度。注意保障文化人的安全和工作条件，是列宁的一贯思想。因为这一方针难以贯彻，故政府采取了值得赞扬的明确措施。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初，苏维埃革命者在俄国各大城市夺取政权时出色地避免了流血事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彼得堡只有几十人死亡，而一年后柏林的斯巴达克起义^①遭到镇压时有数千人受害），莫斯科军事学校的学员的抵抗持续多日也是绝无仅有。

至于这一事件中被捕的反革命分子，只要他们口头上表示不再拿起武器反对苏维埃政权就被释放，这种事就是发生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例如原保卫冬宫的一些士官生，数星期后撤消了自己的诺言的克伦斯基的军事顾问——克拉斯诺夫^②将军，临时政府的成员，他们都在初期，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初重获自由）……

无疑，一九一七年秋和一九一八年冬，当时开展斗争的艰难条件几乎在各地导致了一些双方无法控制的暴力行动，当一九一八年四月开始的外国干涉对革命的敌人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时，越来越加剧的暴力行动促使暴发全面的内战。

然而，即使在这特别困难的时期，在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上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

^① 斯巴达克起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和罗莎·卢森堡等于一九一六年组织的斯巴达克团（后改称斯巴达克联盟，即德国共产党的前身），在一九一八年号召柏林工人和士兵举行的起义。

^② 克拉斯诺夫，沙俄将军。

1)极少数群众性的枪杀是与内战特别悲惨的时刻联系在一起(在红军后方发生的叛乱、与白军的武装冲突等),在任何情况下只涉及一些手持武器反抗革命的反对者。这些枪杀事件也并不是不断发生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领导往往试图反对红军或契卡^①的行动。

2)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机构曾多次采取措施阻止红色恐怖,最著名的事件是苏维埃第六次全俄代表大会于一九一八年底(尽管当时内战仍在激烈地进行着)通过了关于“革命法制”的条令,该条令保护公民使其免受政府滥用职权之害,并普遍授予公民向上级机构申诉的权利。尽管直至(一九二一年)战争结束为止,这一条令不易贯彻,但它还是表明了这种思想已深深扎根在共产党内(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第一次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代表大会),尤其是它后来成为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很明显,苏联领导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就是依据这一条令和法律谈到斯大林时期“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情况的。

再讲一点列宁的个人态度:尽管他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派与加米涅夫^②一起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主张在前线立即取消死刑,尽管他有时要对战时下令贯彻严厉措施负严重责任,但他反对不加区别地使用暴力的主张是一贯的。只举

① 契卡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委员会”的俄语缩写读音。这一机构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建立,一九二二年二月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柏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又改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欧格柏乌”,以后几经分合,成为今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和内务部。

② 列·波·加米涅夫(1883—1936),一九一七年十月,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发表不同意中央武装起义的声明,从而向资产阶级泄露了党的计划。十月革命后任全苏中央执委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次反对列宁主义政策。一九二六年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首领之一。一九三四年被开除出党,后被判罪。

一例，当贝拉·库恩^①和科拉西^②一次在乌克兰执行任务过程中决定枪决一些自愿投诚的白军战俘时，列宁火冒三丈，一度考虑不顾他们的威望而把他们禁闭起来，并决定把他们打发到土耳其斯坦“执行任务”。

同样，人们看到列宁对一九二一年冬季格鲁吉亚被侵占时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③的粗暴行为^④感到愤慨，他也反对托洛茨基把工会纳入党内。

然而，索尔仁尼琴^⑤提到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的一项指示，在他看来，这是古拉格真正的起点。但是，这个主张迅速逮捕投机分子和敌对分子的指示有其当时的具体背景，一九一八年冬季哥萨克人最初的暴乱宣告内战的开始，在农村中一些毫无约束的人在饥饿和酗酒的驱使下对布尔什维克血腥杀害的情况愈益严重，尤其在乌克兰，犹太人参与了杀害行动（什克洛弗斯基在《富有感情的旅行》一书中描绘了这方面的情景）。只有考虑到一九一八年冬季的气氛，以及由于缺乏有力的措施而正在威胁着各大城市的严重饥荒的危险，才能理解这些严厉的措施。

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管制起来，其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居民，使其免遭革命过程中引起的某些群众暴动的过火行为。

① 贝拉·库恩(1886—1937)，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一九一九年领导匈共夺取政权，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不久共和国被反革命推翻，贝拉·库恩流亡苏联，后因政治思想分歧，于一九三七年被苏方处死，一九五八年恢复名誉。

② M·科拉西(1892—1971)，前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前总理。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移居苏联。

③ 格·康·奥尔忠尼启泽(1886—1937)，曾任苏联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④ “粗暴行为”，这里是指对格鲁吉亚居民的某些干部的辱骂而不是枪决，这在当时是不可设想的。

⑤ 亚·伊·索尔仁尼琴(1916—)，苏联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持不同政见者。一九七四年被驱逐出苏联，侨居美国。其著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引起世界注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设立了最早的拘留，拘留营是就地设立的，而不是在西伯利亚。而且当时的拘留营根本不是长久性的。列宁关于这一措施的论述有一段堪称楷模的历史，为了避免在执行该条令的过程中发生任何过火行为，列宁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他为阐述这一问题而写的最强硬的文章，因此索尔仁尼琴引述的材料只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哈林和玛利亚·乌里扬诺娃^①发表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时，人们才知道的，而当时这些措施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多党制的问题并不是一下子就解决的。一些党的领导人(布哈林和拉狄克^②)和一些知识分子(高尔基、巴甫洛夫)无疑曾考虑通过一九三六年的宪法来回到有限的政治多党制；孟什维克领导人直至一九二一年仍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贵宾”(马尔托夫^③就是在会上最早起来为新经济政策辩护的与会者之一。)孟什维克党仍在莫斯科取得四十六个席位，在哈尔科夫，它取得二百五十个席位，是一九二零年红军胜利后举行的选举中的多数；列宁在征服格鲁吉亚的初期曾考虑维持与他们的联盟。

当然，由于这些党的活动很快升级为采取武装的形式(暗杀，由社会革命党分子、孟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策动和支持的暴动)，它们终于被取缔了，但这种取缔有意采取温和的形式：反对派与其家属一起，并带着个人财产被赶出苏联国境(但是象什克洛夫斯基这样一个在当时接近孟什维克立场的作家在柏林流放

① 玛·伊·乌里扬诺娃(1878—1937)，列宁的妹妹，曾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

② 卡·伯·拉狄克(1885—1939)，前联共(布)执行委员会委员，因追随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恢复党籍，一九三六年再次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九年被处决。

③ 尔·马尔托夫(1873—1923)，孟什维克主义首领之一。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领导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十月革命后，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

一年后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便获准回国了)。

只有一次政治审判，即对曾多次血腥暗杀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乌里茨基^①和列宁本人)的社会革命党的秘密小组的审讯是在一九二二年进行的，这是一次公开的审判，有外国律师(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范代费尔德和旺泰尔参加)，结果是八人获释，十一人被判处不同年限的徒刑，二十人被判处死刑，但由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的法令而暂缓执行。

但是，尽管反对党和反对派的报刊从未被正式允许存在，新经济政策的方针却允许一批完全对政权保持独立的出版社和报刊合法存在，他们以几乎毫不隐讳的语言提出批评、疑虑或保留意见，它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反对派是一致的，而且往往是明显地受到反对派的鼓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

至于争取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参加祖国建设，当局曾明确宣布这不一定要求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支持政府。就是根据这一规定，大批希望在国土上生活而丝毫不准备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侨民回到了祖国。许多对这一规定感到满意的“同路人”在国家建设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很长时期里，苏维埃政权丝毫没有强迫人人加入共产党，相反给了所谓无党派的广大人民阶层，即不一定全部、或者只是部分赞成布尔什维克思想意识，但愿意“规规矩矩”参加新政权的社会实践的人以应有的地位。这种现象在不太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间尤为常见。这些人可在职业机构的范围内、在组织上参加公众

^① 莫·索·乌里茨基(1873—1918)，一八九八年参加俄国社会主义党，参加过一九零五至一九零七年俄国革命。在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支持“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一九一八年被任命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同年遭到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生活，乡村委员会、大学选举（直至一九二八年仍有几份竞选名单，其中一份几乎毫不隐讳地代表社会革命党倾向）。总之，直至二十年代末，人们可以不隐蔽与当局的主张明显不同的思想而生活在苏俄。

在许多方面，个人的意见并未被系统地追查。例如科学院的组成并没有变（只有三名共产党员是一九二八年进入科学院的，即：布哈林、波克罗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而这三个人都是学术界公认的知名人士），大学没有遭到任何清洗（只是在事实上许多教授在内战期间走了）。

非党人士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而不是根据其对党的方针的附和程度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百多名工作人员中，只有四十来个共产党员（包括一些打字员和司机）。委员会中的多数经济学家曾在孟什维克党（格罗曼、费尔德曼）或社会革命党内（康德拉季耶夫）工作过，他们对必须执行的政策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有时遭到反对，而有时则被采纳。有的人，象巴扎罗夫^①，从一九零五年以来就是列宁的老政敌，但列宁既往不咎，不同他们算个人之间的老账，而是尽一切努力联合他们。

这种态度在党内更加明显，后来盛行的在每个领导人的历史上找毛病，借以发现其后来出现偏差的根源的那种做法，当时是行不通的。因为反对过、甚至激烈反对过列宁，这对任何人来说不算什么污点。负责党的军事政策的托洛茨基，在这方面不是唯一的事例。国家文化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一九零五年

^① 弗·亚·巴扎罗夫（1874—1939），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是用马赫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列宁揭露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称他为“马赫派的半贝克莱主义者、半休谟主义者。”一九一七年成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著作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班康战线》等。

曾是经验批判主义者和左倾分子的卢那察尔斯基，以及领导工会工作，一九一八年因反对党干预工会而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并在一九二零年起又恢复高级领导职务的洛佐夫斯基，都是同样的情况。更不用说曾反对一九一七年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许多孟什维克分子，他们有时很晚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却很快又被重新置于负责岗位（例如哲学家德波林或外交家伊·马依斯基）。

在某些地区，一些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也担负领导职务，如中央委员、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斯克雷普尼克以及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许多穆斯林革命者。

至于处理党内分歧的方式，则是相当温和的。一九二一年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禁止党内存在派别，这不象人们常说的是出自当时形势的需要，而是至今仍然有效的原则问题，尽管如此，这并不禁止党员在党的报刊上就正在讨论的问题负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旦发生分歧，如一九二三年开始就与托洛茨基发生的分歧，并不导致排斥处于少数地位的领导人，直至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一直保持着政治局内的职务。

甚至在发生明显派别活动时，也只是最后才采取行政措施。例如，一个革命工团主义倾向的秘密派别曾试图在党内和党外组织起来准备在一九二三年发动工人反对政府的群众性示威和政治罢工，这个派别的二十八人中，十四人被开除出共产党，而另十四人仍留在党内，但受警告处分。只有这个派别的两个主要负责人被拘留了，而几个月后均亦获释。一般地说，党内处分，如开除出党或警告，与国家的判刑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当时受处分的干部一般仍都在国家机关，例如在外交或文化机关中任职（苏尔坦·加里耶夫）或担任其它公职。

波格丹诺夫直至去世为止，一直负责领导一个省级医院。

但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头不仅仅是“比人们设想的要更自由些”，这一时期一开始就不可逆转地使俄国社会在实际和法定的自由权利方面实现了巨大的跃进。在许多问题上，社会主义政权立即实现了一些主要的诺言。经济上剥夺资本家和地主，使劳动者摆脱了金钱的控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以便从法律上保护雇员免受雇主的压榨（这特别关系到农业雇工和商店雇员）。强制携带国内通行证的制度直至二十年代末才取消。劳工纠纷在长时期内是通过基本上公开的讨论来解决的，其结果往往是对工人有利。对当时世界来说，最引人注目的进步是男女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由关于离婚和避孕的十分先进的法律来保证的。苏联各民族享有在全部民族生活中使用民族语言的权利。最后还有选举权的普及（尽管由于当时的形势，这种权利不久后又受到了限制）。还可以加上加速扫盲问题，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巨大的自由。不要忘掉，这些成果不仅与旧俄国对比是巨大的进步，而且与许多所谓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比，也是如此（在法国，妇女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一直没有选举权，反对流产的野蛮法令只是不久前才取消的）；更不用说那些殖民地，它们还长期地向往俄罗斯帝国旧属地的命运。

是否说，在政府活动中除了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外，没有出现任何野蛮和无理镇压的行为呢？当时的任何政策都不包含威胁民主的萌芽吗？当然不是这样。这些年的暴力和紧张气氛使这种情况难以避免。例如，他们有时就被迫进行惩罚性的远征，只是因为哥萨克的农民要求政府考虑他们绝望的经济处境。在红军中，对被认为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人的清洗进行得

特别粗暴。这两方面的情况主要应由托洛茨基负责，他有一定程度的命令主义，而列宁没有始终加以反对。最后，列宁所赞成的某些恰当的措施已经威胁到原则问题，例如一九二一年二十来个哲学家，其中包括别尔佳耶夫^①，被强迫流放，只是因为他们属于唯心主义思潮。

但是革命初期政治生活中最危险的方面，是对国家机构和法律制度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曾正确地揭示了政治和司法形式的相对性和属于上层建筑的性质。法律的范畴、投票的意义，以及合法权利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基本经济力量对比的简单反映和阶级斗争宝库中的几件武器，而资产阶级则要使人把这些东西看成具有绝对价值。正是从这一批判性的分析出发——但这种分析被概念化了。并夸张到了极点——，新政权不仅抵制了社会活动，而且对用法制和司法的语言规定新立法的法定范畴一点也不着急。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在军事上和哲学上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即根据当时背景来看，首先考虑如何对阶级斗争更有利。所以，在很长时期内，无数的革命法庭只是遵照一些指示，或单凭一时的心血来潮来进行判决，而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同样，在整个革命初期，苏维埃国家除了一些有时根据当时政治背景很有限度地修改各类居民的投票权的临时规定外，没有任何其它立法条文可以参照。因此，在具体而“私下”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存在的比较开放的做法的同时，没有任何文件正式保证在政治上表达这些不同意见的权利，更谈不上什么罢工权。人们思想上的出发点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很快把社

^① 尼·亚·别尔佳耶夫(1874—1948)，唯心主义哲学家。早期著作已倾向“合法马克思主义”，用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的学说。在反共时期是其哲学流派——神秘主义的一个代表。一九二二年被驱逐出境。

会利益统一起来，消除劳工纠纷的根源。因而，如果在过渡阶段可以在实际上对意见分歧和劳工纠纷问题给以自由化的解决办法，那就根本没有必要使这些注定要消亡的现实具有法定的形式。乌托邦的烙印在这里是很明显的。

这种把政治机构几乎绝对地相对化，决定性地揭穿了资产阶级法律至上的神话，而且在阶级斗争采取全面战争的性质方面找到了某些根据。但它带来严重的危险。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混为一谈的观点，此外，它为主观主义的、专断的做法，以及认为民主的规定本身是可以任意控制的相对实体的思想开辟道路。无疑，在旧的民众社会的全部结构已被摧毁的情况下，对政治制度观念的批判性的解释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尽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政治思想的肯定的发展，并在社会斗争中取得特殊的成就，却为政治方面纯粹管理性的、有时是专制性的方针提供了依据。

这就是革命初期的复杂局势。首先是混乱的气氛，一种难以完全控制的巨大的震荡，然后是急于把具有重要解放意义的革命成果立即变成现实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一定时期内也曾注意进行某种政治和社会对话。与此同时，除了过早地采取了一些镇压性暴力外，在处理国家机构的作用和前途问题上采取布尔什维克的、不成熟的态度，这就会使建立具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关系的制度成为不可能，并会产生由一党制和个人迷信来弥补这一缺陷的危险。

合作化时期

第一次大的危险发生在二十年代末。当时农村危机的发展

与建立社会主义工业的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结合在一起。

由于对农民采取了未经充分考虑的强制征收的措施，以及巨大的经济困难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一九二九年在整个苏联农村爆发了普遍的不满，在最富裕的地区——南方的黑土地带尤其是如此，那里的人们感到，与其它地区相比，他们对城市的供应高于他们人口的比例，而且旧的民族意识在复燃：乌克兰对莫斯科的地方主义、对工人和城市的敌对情绪等。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对不满采取了极为粗暴的手段。

毫无疑问，党感觉到，在当时出现的局势下要满足农民的要求是十分困难的：运输的状况、城市人口的膨胀使形势更加严重。然而，从当时起所做的政治抉择，用暴力镇压叛乱，接着，在从城里来的、不仅带着宣传品而且提出使人印象深刻的论据的工人队伍的监督下强迫进行的集体化，这些不纯粹是因为无法避免，而是有意确定的政治方针。这一方针当时遭到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好几名重要人士的反对：政府首脑李可夫^①、《真理报》社长布哈林和工会总书记托姆斯基^②。

这些现象是“斯大林偏差”及其主要特征的真正开始：在困难面前不断任意采用流血或不流血的行政措施，这在较短时期后导致作为执行政策的主要工具的国家机器取代共产党。

实际上，一些极端粗暴的措施，如流放、揭发、大规模逮捕等，在全面的物资缺乏的情况下，虽然难以由多年来致力于与农村群众建立联系的地方干部来执行。不少党员苏维埃主席开

^① 阿·伊·李可夫(1881—1938)，十月革命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

^② 米·巴·托姆斯基(1880—1936)，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十一大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多次反对列宁的政策，坚持工会脱离党领导的“独立性”。

始时都企图为自己管理的人民进行辩护。与斯大林和领导机构预计的情况相反,贫农反对中农和富农的阶级斗争开展得很少。加上,某些地区贫农和农业雇工的情况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加速恶化,他们多年积聚起来的痛苦无疑大力地推动了合作化。采取粗暴的措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取得部分农民的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对正在重新组合的农村集团进行镇压的路线,总书记和支持他的人马建立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权限越来越大的镇压机构。这一特殊的镇压机构逐渐摆脱党的控制,并显然秘密地开展活动。内战的镇压措施是当局公开采取的,因而是可以统计的,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之间所进行的“行政”活动则往往由于其规模及违背共产主义道德^①原则的不可告人性质而被掩盖起来,公开地加以否认。

让我们对由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农业危机和直至一九三三年为止的农村集体化而采取的措施作一初步小结。

首先是由于在乡村中的冲突、或同警察的冲突而造成的死亡,然后是由于破坏行为(烧粮仓、盗窃物资、掐死牲畜)而不加审讯地就地枪决了一大批人。负责农业的人民委员谈到过这方面的“悲惨景象”。(美国人在德国查获并部分公布的)斯摩棱斯克档案^②中提到在一些乡村中,农民一家一家地集体自杀的情况,成批农民为了逃避集体化而冒着最大的危险偷越波罗的海、波兰、罗马尼亚、甚至中国的边境。

接着发生了对富农的有计划的斗争。一九六三年发表的一

^① 原注:我故意使用这一提法。法共二十二大上曾十分正确地赞扬了共产主义道德,而这一提法在这里包含着对人民群众的尊重的全部意义。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军队入侵至莫斯科附近的新摩棱斯克城,将该城保存的自十月革命以来的全部档案,包括重要的国家机密档案全部劫回德国。战后,这批档案落入美国之手,成为西方研究苏联的重要依据。现在,新摩棱斯克档案已成为一专用名词。

篇苏联文章认为，只有约三分之一受“斗争”措施之害的家庭可以被看作是属于富农阶层的。开始时，把富农分成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罚：立即关进监狱；流放到西伯利亚边缘地区；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但不流放，而且几年的时间里把他们暂时安顿在集体农庄以外的贫瘠土地上。

这些措施本身已相当粗暴，而在当地执行时实际上又被有意加重了。这是由于随着农业生活的彻底瓦解而造成的饥荒不断发展，一些表面上宽大的措施，如重新安顿在开垦地上，往往变成让人饿死；这也是由于斯大林支持的集权不尊重党选举产生的机构——在那里，事实经常被歪曲——而决心对一切反对派采取强硬措施。

搬迁人员并不是都死掉了，有些人甚至在边远地区适应了当地生活。但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并不令人羡慕，满载“富农”的列车在农村中名副其实地取得了“死亡列车”的绰号。可以估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全家都搬迁），儿童死亡率特别高。我们在这里没有篇幅算细账，但可以估计搬迁人员大约有七百万至一千万（由于缺乏官方材料，我是根据不同的作者的计算作出这一估计的，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四百万人，受害特深的乌克兰四百万人，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各共和国可能是一百万人）。

除了下令枪决一些人之外，还要加上由于营养不良，被成批地扔进没有食品的火车以及安顿在不宜耕种的土地上，缺乏必要的物资和较暖的服装等原因而造成的死亡，估计死亡率不低于受害者中的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

从这一观点来看——尽管这是同样十分异乎寻常的，可以认为，在人民内务委员会监督下的常设营中对劳动重新组织。

即使食品和服装的供应不足，对某些人来说也意味着一种进步。

然而，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由于总的对流放的组织工作中的某种改进，搬迁人员在安顿过程中的死亡减少了。同样，战后全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被重新安置于中亚细亚，他们似乎并没有大量死亡。

一九三三年后，从整体来说，党施加了压力，以便放松对“富农的斗争”。看来，尤其是基洛夫^①在政治局内为集体农庄的农民进行了辩护。此外，希特勒的上台，使恢复阶级的联盟成为必要。对农民的镇压那时便停止了。

让我们对某些人口统计向我们提供的数字进行核实：人口下降（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九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人口下降，官方的数字是压低了的），一九四一年在校学生中不同年龄的班级差别（十一岁的班级和七岁的班级）。暂时可作如下的估计：

——仅仅饥荒造成了四百万至五百万人死亡。

——镇压及其后果大概造成了四百万人死亡，其中一大部分是由于苏联社会极度混乱所造成，而不是有意的。

五百万农民在自己重新安置下来的新的土地上，在绝对贫困的情况下幸存下来了。

最后，一九三四年前后，在拘留营的二百万人中，农民约占百分之九十（一九二八年是三万人，几乎全是刑事犯）。

尽管我们缺乏苏联的直接材料，但这些大概的数字也能使人估量出苏联农村所经历的历史性悲剧的规模。

^① S.M.基洛夫（1886—1934），一九三零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三四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兼组织局委员，一九三四年遇刺身死。

城市镇压的开始

为了对第二次镇压事件进行估量，必须追溯一下历史。早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在农村执行什么政策的问题，就曾在党内引起激烈的争论。主张温和的集体化政策的人——斯大林领导的多数派，他们无疑从那时起已不再支持自己曾公开提出的论据——和主张更坚定，即更粗暴的工业政策的人（托洛茨基是这一政策的主要代言人）之间的分歧几乎使党发生了分裂。

一九二七年十五大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导致了共产党第一次大批开除党员，很快就轮到托洛茨基。被清除出党的人被迫移居在外地，托洛茨基甚至被驱逐出苏联国境；由于他的声望太高，无法考虑将他逮捕。奇怪的是，由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危机，党需要加强团结，因而把意识到形势严重的几乎全部原托洛茨基分子重新吸收到党内。

政治局内讨论集体化时，从“右”翼反对斯大林的人失去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布哈林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但当时还没有对反对总书记的人采取措施。

但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已经对苏联城市中可能成为富农同盟者的那些人采取了一些非法行动。斯大林害怕大多数不是党员的知识分子干部同农村自发的反对运动汇合在一起。此外，某些措施的目的是在满足一些工人至上主义流派的要求，并采取了一些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措施，以便使工会领导人在共产党内孤立起来，他们因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而成为布哈林的主要支持者。

正是由于这一政策而导致对大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采取大规模开除的措施，解散了原来的科学院，增加了马列主义必修课，计划委员会被瓦解，一些被控重建了所谓孟什维克反对中心的非党的知名经济学家惨遭杀害（一九三一年，格罗曼、巴扎洛夫、康德拉季耶夫），对一些无故被指控从事经济破坏活动的工程师进行审讯，以便使其他人俯首帖耳。

一九二八年，在乌克兰对沙赫特煤矿工程师进行审讯时，一些胆大妄为的警察首次使用了酷刑逼供。这种行为在几年前是不可设想的。这次审判的检察官维辛斯基因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很快地闻名于全世界。

在集体化达到高潮时，曾对一些“专家”进行了多次审讯，其中有的在当时是秘密进行的。

计有，

——一九三零年八月，十来名细菌学家被指控传播瘟疫；

——一九三一年二月，几个知名教授受审，其罪名是反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塔尔列、利哈乔夫、普拉托诺夫、巴克鲁希奈，他们在数年后获释（塔尔列是在一九三五年经赫里欧干预才获释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四十八名食品工业的厂长受审；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十五名集体农庄负责人（其中三十五人被枪决）和三十五名农业高级官员受审讯。

相反，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关于所谓“工业党”的审讯，是完全公开进行的，每个人都被判刑，其中包括老布尔什维克拉姆金，并有五人被判死刑，但都未执行。拉姆金后来又恢复了战时的职务。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的城市镇压与农村的恐怖情景无法相

比，被杀害的人数总共不到一百万人。但是它对苏维埃机构中讨论自由的程度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党对政治演讲的控制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无疑，城市群众因感到自己是处于被围困的堡垒而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这也限制了镇压的规模。

此外，特别在“工业党”案件的问题上，看来人们对斯大林施加了很大压力，以便阻止审判进行到底：不判死刑，被告人数量限于八人，而开始时有二千人被捕。

这里涉及到中央委员会所起的作用：看来早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关于集体化恐怖情况越来越具体的消息，使人们对集体化重新讨论，并作部分的自我批评。随着斯大林及积极赞成血腥手段的人物——卡岗诺维奇^①、叶若夫、麦赫利斯的某种程度的孤立，原来的左翼和右翼反对派重新被吸收到党的机构，党的团结得到了恢复。有一个人——国内最大的工人城市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被害，体现了反对派力量的上升。看来这是斯大林的警察干的，这件事发出了苏联从未经历过的最大恐怖浪潮的信号。原因很简单。集体化的恐怖程度与共产党的目标，以及大多数党员的感情是不可调和的，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想维护党和当时还处于比较软弱和孤立地位的工人阶级的团结。

因此，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较大成就而局势开始稳定下来，重新恢复一九二八年以前贯彻的列宁主义基本准则的问题提出来了。

这一愿望与政治警察的无限特权发生了矛盾。一九二二年

^① L.M.卡岗诺维奇，前苏共主席团委员，一九五七年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一起被开除出党。

党只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愿望就可以立即停止契卡的特权。可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中央委员会面临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构的恶性膨胀。尽管一九三四年春季召开的十七大重申了党内许多列宁主义准则，并使过度行为的主要负责人遭到孤立，但令人忧虑的政治警察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造成悲剧的一切条件具备了：一百三十一名中央委员中的九十八人与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一起用自己的生命为斯大林所执行的政策付出了代价。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主要是为这些人平反的。

恐怖的第二阶段

一九三五年开始的恐怖的第二阶段所打击的目标很不同，根本没有涉及到农村。它同上一个阶段的不同还在于它在行动上配合的，所以更加不可饶恕。如果说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三年很大部分受害者更多是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的彻底崩溃而不是由于有意屠杀居民所造成的，那么，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的大恐怖运动则是旨在消灭大批共产党干部在国家民主生活退化过程中进行的抵抗。对那些最坚决反对国家暴力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隐蔽的。基洛夫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说他是托派阴谋杀害的，这样就可把托洛茨基的亲密伙伴统统公开枪决。政府首脑古比雪夫的突然去世，看来也很可能不是自然的原因。最后关于高尔基的死亡，阿拉贡^①曾在十五年前写的《死亡》一文中提到过当时可能谋害的背景。

^① 阿拉贡，法国著名作家。一九五零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五四年转为中央委员。

据初步分析，这并不是任意打击的盲目镇压。看来，在公开承认的受害者中间，党员占绝大多数，这一点索尔尼仁琴在他写的《古拉格群岛》中故意缄口不谈。在军人和知识分子中间，与共产主义运动联系最密切的人受害最深。

人们错误地设想，知识分子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的镇压中是受害特别严重的阶层。我并不支持相反的论点，这样做完全是荒谬的。我只想指出，那些不参加或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大知识分子，只要他们谨慎行事，往往未受到镇压。

相反，如果一个作家或教授参加党的生活，当镇压临到中央委员时，一般说这会导致他立即被枪决或逮捕。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著名语言学家波利瓦诺夫——他作为东方人民大学的教员，曾启发许多亚洲的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创始人特列季亚科夫——他是布萊希特的朋友、拉普（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全部领导人；阿维尔巴赫、卡加烈夫、基尔顺、波兰共产党诗人雅泽尔斯基、导演迈耶霍尔德等人的情况都是如此。

但是，这次镇压也接连打击了一些知名人物，他们仅仅因为与党的某些方面有联系而有了罪，例如伊萨克·巴贝尔（他与军界联系密切）、鲍里斯·皮利涅克或帕维尔·瓦西里耶夫（他由于写了一首歌颂布哈林的短诗《俄罗斯农民的觉悟》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红军中也是同样的情况。从沙皇的旧军队出身的军官和将领远不如出身共产党或曾打过游击的军官那样担忧。况且，在估计军人受镇压的情况时，还要考虑到希特勒分子的挑畔，因为纳粹分子为了削弱苏联的国防，已成功地使斯大林相信，参

谋部在阴谋推翻他。现在看来，斯大林要坚决清除一切与反对派有联系的共产党员，这是肯定无疑的，但这与敌人的挑衅无关。后来被捕的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所有军人和政委，几乎都曾反对过斯大林第一次逮捕布哈林的阴谋。事实表明，红军中几乎所有有才能的领导人都是在一九三九年被清除的。某些人（如罗科索夫斯基^①或戈尔巴托夫^②），曾在一九四一年被匆忙地从拘留地释放出来，以便在军界领导机构中取代那些曾由于一定程度上参与谋杀而被提升的将领，其中有著名的将军弗拉索夫^③，他曾是斯大林的宠儿。他于一九四一年匆匆忙忙投靠了德国人。后来斯大林把索尔仁尼琴看作是弗拉索夫第二个有力的辩护人。

至于马利诺夫斯基^④元帅，仅仅因为被任命去西班牙才侥幸未遭其同伴的命运。斯大林对红军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一九五三年以后军队领导人支持尼·赫鲁晓夫的政策。

必须指出，与党内清洗联系在一起，还有对共产国际机构的极端野蛮的镇压，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匈牙利领导人如贝拉·库恩、波兰党的几乎全部领导成员、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总书记、共产国际的几个完整的工作部门，甚至一些西方共产党人均被流放、枪决或遭受酷刑的折磨。陶里亚蒂的姻弟保罗·罗博蒂被关了近三年。可悲的是，这决不是个别的事例。

① 罗科索夫斯基(1896—1968)，苏籍波兰人，苏联元帅、波兰元帅，曾任苏联陆军总司令、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

② 戈尔巴托夫(1891—1973)，大将，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战后曾任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

③ 弗拉索夫，苏军中将，卫国战争中被俘后投降德国人，战争结束时被苏军捕获处决。

④ 马利诺夫斯基(1898—1967)，苏联元帅，曾任苏国防部长。

最后，还须提到大量的无名受害者，他们甚至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名字留入史册，但仍然需要作一估计：数以千计的工人，中层干部，他们往往是共产党员或是群众组织中的积极分子，一般遭到与自己的直接领导人（直至相当于我们这里的党委书记）同样的命运。这些中层苏联人由于批评了劳动组织的这方面或那方面的问题，质问了厂长、经理（苏联工人的直爽一直是很突出的）而突然落入了政治警察人员的手中。在苏联人民心灵中留下可怕印象的三年中，在日常政治生活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全面倒退的现象。

有数字的总结

我们应对这一镇压时期作一个大体的、有数字的总结，苏联人用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领叶若夫的名字来称呼这一时期，一旦他的任务完成，斯大林便于一九三九年把他搞掉了。

首先要说明，没有一个数字是可靠的。估计一下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监狱的容量便可想象当时的情景。人们知道在一九三七年整整一年中，这些监狱没有空闲过。人们也知道，这种情况对人口的影响相当大，因而一九三九年未曾公布人口统计数字。

党员人数的统计是有意义的：从一九三四年十五大（基洛夫路线在会上取胜）的二百八十一万七千人（包括预备党员）降为一九三九年十七大的一百五十八万六千人，其中四十万新党员。如果考虑到一部分基层被清洗者由于政治原因（不参加党的活动或酗酒）而未受害，如果把被捕者限于被开除出党者的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则逮捕的人数——其中各级领导受害的

规模特大——达八十五万。

有人估计，被拘留者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比例为一与五之比（即党员占百分之二十，而在人口中党员的比例为百分之一）。

这样可以估算出，先后被捕人数约为四百万。

根据这些情况，西方作家显然大大夸张了被告者的死亡率。鉴于镇压机构时紧时松，可以说更多的是一种经常的监督，而少数才是蓄意屠杀；许多人先后被关进监狱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恫吓，还谈不上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相反，对政治负责人的判刑要重得多，因为他们是危险的。当然，在那个时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在全面降低（经常处决主要被告的妻子、成年的子女和亲属以及堆积如山的尸体都证实了这种情况）。

估计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间枪决了四十万至五十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当然也有许多小的刑事犯（走私犯等）在十分艰难的时候被枪决，借以杀一儆百。

最后，还有许多人被迫在不同的拘留地进行强度很不同的劳动改造，因为这方面也缺乏苏联公布的数字，我只能提供一些最低的数字，这是由于被事实所确认而又为西方专家因明显的原因所低估的拘留处于某种“优先”地位；这样，在这一时期末的一九五三年，估计约有七百万人（包括刑事犯）被拘留。他们的处境很不相同，有的被迫在西伯利亚荒芜地区定居，有的被慢慢地消灭（如科累马）。七百万这个数字比一九三九年高，这是由于被指控与纳粹德国私通的少数民族（波罗的海地区人、日尔曼人、乌克兰人、鞑靼人、高加索和伏尔加人等）被大量的流放。一般说，这些人不真正属于刑事拘留，而是一种彻底迁移，这实际上完全是对法律的藐视。在解放时，那些被当作二等公民受到怀疑的前战俘，以及曾在纳粹占领的城市中生活

的居民，人们也找过他们的麻烦。

所以，对各种不同类别的人（特别是刑事犯由于政策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外界的隔离，总的说来似乎大多数都幸存下来了），很难确切统计死亡率。此外，死亡率也是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而变的，战争年代由于粮食几乎全部为前线所消耗，死亡率随着全国人口比例也有相应的增长。要提出可靠数字是有些徒劳的，必须根据事实来估计：如果到一九五三年平均估算四百万人，“自然”死亡率每年为8%（这个数字是从在德国的法国战俘的死亡率差不多的统计数字中推算出来的，因而这里对科累马——沃尔库塔式的拘留后果是低估的），那么死亡人数（也是偏低的）就达六百万人。这样，最低的估计，三十年代两次大镇压中死亡的苏联人是四百万加六百万，等于一千万人。

当然，每个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不论是富农还是黑市的走私犯，是贫农还是诗人或将军。但是应该说，如果考虑到苏联高级干部、科技、军事和知识分子干部首先受害这一事实，那么，苏联流血的后果比初步统计数字所表明的情况更为严重。

无疑，在这里我并不试图说明只有对无名的农民和工人的“真正”镇压才是有理由的，我只是要使读者能衡量知识界、科技、军事和经济活动方面所遭损害的规模^①。

如果不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生命力和苏联各族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活力，那就无法说明这个沾满自己优秀子女的鲜血的社会如何能对希特勒的毁灭机器取得难以设想的胜利。几年中，新一代的干部取代了前辈，使苏联取得了一九四五年的胜

^① 原注：当时的气氛在特里丰诺夫的新著《滨河街公寓》中描绘得很清楚，该书阐述了那年头一个官员家庭的回忆。

利；生产能力特别强大的军事工业使军队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巨大规模的游击运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地在德国人防线的后面开展起来的。

在评价这个确实不平凡的国家的历史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上面讲到的大规模镇压与群众主要不是对斯大林而是对十分平等、进步和前途光明的社会的支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每个人都认为要维护这样的社会，即使需以生命为代价。

此外，这一矛盾的后果在当时仍然继续表现出来，因为斯大林的机器与共产党干部的民主愿望之间的对抗，尽管形式上有明显的缓和，但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又重新发生了，这次受打击的领导人是列宁格勒人民抵抗运动的鼓动者，他们确信一九五二年有什么险恶的阴谋，特别是清洗后马上提升到高级领导岗位的计划委员会负责人沃兹涅先斯基，他曾以辛勤的劳动出色地完成了战争时期的全部动员工作。他还年轻，不熟悉总书记身边人员的习惯，他曾不幸地在五十年代初激烈地为他的同事辩护，并提出推动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措施。斯大林在他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曾显然不指名地驳斥了这些措施。

人们现在可以理解，赫鲁晓夫是依靠了什么力量在一九五六年二十大实现了罗伊·麦德维杰夫^①称之为共产党对斯大林集团的胜利的。至于这一运动今天已告结束，则又另作别论。

二、一些看法

我们在上面提出的许多事实贯穿着全书。但我们一开始就

^①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持不同政见者，现流亡国外。著有《面对历史的审判》、《论社会主义民主》等。

提出来，决不是为了毫无意义地回顾已经过去的历史，而是因为必须知道这些可怕的事情，才能理解现代历史，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这些事情并不是社会主义，但却无可否认地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的。

在试图对这一时期的屠杀作了总结之后，我们要研究这些人被杀害的背景、后果，及其影响。

在这方面，必须注意，有一种提法已经远远超出字义的范围。我们在本书中尽量避免用“斯大林主义”这一提法，而尽量只是在指斯大林掌握最高权力时期，或指斯大林个人的思想或行动时才用“斯大林的”这个形容词。

我们认为这些字的含义狭窄，并把极为复杂的现实完全简单化了。一方面，他们把一系列的现象说成是一个人的影响，尽管意思倒来倒去，仍坚持宣扬个人作用，而这恰恰是那个年代的主要特点之一。另一方面，它们使人感到这是一套完整的理论，足以说明整个时期的情况，并且把反希特勒斗争的高涨和胜利阶段同时也打上了错误和恐怖的烙印。

最后，占统治地位的舆论利用“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的”这一概念，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同本身反对这种观点的看法混为一谈，因而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提高了警惕。

我们对“斯大林现象”之类的提法也不满意。在我们看来，这种提法是把我们认为与社会主义历史现实紧密结合的情况人为地割裂开来，说成本身或多或少是外部的、固定的现象。

但我们也提不出肯定的提法或概念，读者会注意到我们在提法上的差异和犹豫不决。我们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这方面存在的困难，进一步的探索，或者认真回顾历史也许会最后解决这一难题。

“古拉格”这一提法也使人感到有同样的问题。“古拉格”是一种代号，是由俄语“劳动改造营总局”缩写组成的，该机构直至一九五六年负责改造营的管理工作。索尔仁尼琴懂得这几个字奇怪地、令人忧虑地结合在一起而给人造成的感觉。报刊舆论在这方面持续、协调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这几个字便成为普通西方人对社会主义世界及其发展和现状的自然和不同的看法。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象“日丹诺夫主义”^①等提法作为提示或标志是有价值的，但如果要作为完整的概念或详尽的描绘，那就值得商榷了。

总之，我们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到处适用的字眼或现成的提法，这是为了避免简单化的公式来代替对实际情况的研究。

这点讲清楚了，让我们言归正传。

死亡、拘留、流放、有时是屠杀、整批整批的被灭绝，使用这些统治手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当今的现实向我们证明，它们并没从现代世界中消失，应该说人类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卷入这类行动，那怕是十分轻微，愤怒便增长起来了，而且性质也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资产阶级及其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当然这种宣传也起很大作用，而是这种宣传确实是以群众的自然感情为基础的。如果这些事实使人们愤慨，这是因为，虽然在其它制度下遇到这些事情并对之进行斗争是正常的，但这些事实却与各国人民合情

^①“日丹诺夫主义”，安·亚·日丹诺夫（1896—1948）曾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主管思想文化工作。战后，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广泛的斗争，谴责了一批作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等为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一九五六年后，这些受谴责的人都恢复了名誉。日丹诺夫有关思想文化问题的观点有时被称为“日丹诺夫主义”。

合理地对社会主义所持的概念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在本书中突出社会主义历史的这一方面，必须了解这些，才能避免重复类似的做法。了解，这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描述，而且要懂得这些是如何产生的，会导致什么结果，其目的何在。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只能提供一些素材，因为档案都封闭了，对当事人的历史研究无法进行，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假设，供大家讨论。

我们特别要指出，大量的死亡只是一整套理论概念、行动和政治目的中的一种手段，其消极后果应予全面的批判。但這些死亡自然造成了一些恐惧、消极及教条主义懒散的现象。在一切都集中于斯大林个人，以致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迷信思想和行动的体系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随着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应为三月——译注）五日去世，情况突然变了。在这以后的数月中，好象发条断了似的，幸存者（用此词不算太重）终于发现他们曾经历了何种生活。专横的拘留和枪决停止了，平反开始了，政治思想方面进行了纠偏。但是，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某些根源和思想仍然存在，一些人已安置了，一些制度和习惯仍在社会上盛行，这些不会很快消失。必须注意到，对全面的纠正反而没有作必要的充分解释，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这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旧势力的局部回潮或残余影响的继续存在。过去太快地被一笔勾销了，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过去消除。这种沉默无可置疑地成为苏联本身思想混乱的原因。如果我们仿效这种做法，我们将为那种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法国共产主义运动说成不可避免地要重复类似错误的活动提供方便。

我们坦率地说，在我们这些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人看来，

这种沉默是令人忧虑的。对苏联本身来说，也是令人忧虑的，经常求助于法院、警察、新闻检查或流放来解决政治问题，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弱点，它不仅使社会主义的形象暗淡，而且部分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把目前的情况与一九五三年以前的情况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和不诚实的。我们将在此说明已发生的一切变化，但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即：任何决裂不管如何彻底都包含着连续性。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对问题的看法可能是不完整的。

至于我们，我们知道法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通过上帝的法令而避免走类似的弯路。尽管社会主义会放任自流或者并不能完全避免这些做法，但这却不能使我们背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就是依靠在血泊中进行掠夺而生存并发展的；由尚未完全形成的社会主义从旧世界继承下来的这些做法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将使这些错误成为不可能；我们只是设法通过我们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我们试图对这些错误所做的明晰的分析来保证做到这点。

如果要设法了解这一系列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现象是怎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的，就不能满足于把一切归咎于斯大林简单化做法，尽管他粗暴（这是列宁的原话）、猜疑、后期成了迫害狂。这也不是一场个人或派别之间的权力之争。这种比较普遍的说法的严重缺点是没有考虑当时国内面临真正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及其解决办法，当时存在着对立的意见；为了贯彻这种或那种意见，就必须在权力机构中拥有必要的影响。无可否认的个人野心只是所发生的冲突中的一个因素。

那么，人们能否对究竟如何形成一个真正制度一事得出自己的看法？当然用“制度”这词并不意味着事先已有预定的计

划然后阴险地加以贯彻，看来似乎是一种环环相扣的连锁反应。

应该设想一下苏联最初四十来年的景况：形势很乱，紧迫的任务不间断地一个个压上来。必须完成大量工作，加速地推动历史运动前进。这一切只有依靠被革命所带动起来的人民群众才能实现。

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依然充满过去的痕迹。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社会主义要创造一切，建设一切，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

难道人们不曾设法寻找一条捷径来较快地建设一个新制度，使其能生存下去，并为此而依靠在群众中盛行的思想意识、制度和习惯？

于是便形成了一种逻辑，而根据这一逻辑严格进行和实践又在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产生了自己的理论。这样形成的制度的杠杆，包括其因果在内，就叫做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教条主义、镇压和官僚主义。

个人迷信确实曾是制度的主要手段。它是逐渐形成的。它把一九二二年后成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变成党所做、所说和所愿的一切的体现。有意思地让人称自己为各族人民父亲的人成了永远正确的象征，传播科学的理论家，一切道德的范例。一切是在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切都转经过他，任何事情只有经他决定才生效。如果他不是历史上的、至少也是他那时代的最高天才。

这种个人迷信无疑也借助于列宁在群众中的巨大威望。在对列宁的真正宗教般的迷信，包括对他的讲话、行动，以至他芬劳的遗体的崇敬正在形成的同时，活的继承人进入了宝座。

如果不加上政治含义，这种宗教迷信的程度将是难以理解的，党内和人民中的政治斗争逐渐采取享有极大个人威望的托洛茨基和代表党、从而成为前进的体现的斯大林之间决斗的形式。斯大林后来成为党的化身，一切功劳都归他；克服困难，反对不公平现象和外界敌对行动，都得靠他。

在这方面，人们不能不对下列事实提出疑问，即：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把政权、党和人民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曾经是或者现在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有时在极大程度上，成为政治生活，往往也是精神生活的主要动力。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某经济在传统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中，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仿效苏联，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是在唯一现有的社会主义强烈影响下迈出第一步的。但是，这种解释不是以帮助人们理解过去人类集团那种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一个人的——即使他是圣人、拥有神权、国家的救星或拿破仑式的民族有生力量的旗手——那种老的传统为何如此三番五次的和系统地被利用。

在一些初期主要务农的国家中，首先是苏联，个人以及通过个人进行联系的传统作用无疑曾起了重大作用。一个新的思想（即先锋队、党以及自下而上各级代表党讲话的责任心和推动作用）与这种传统一旦相遇，便加强了这种传统并与它结合起来。

人们不是在那里找到了在文化十分落后的群众中快速灌输为实现民族和社会目标所必需的主导思想的手段吗？这些思想将有效地传播开来，但也冒着把群众的创造和决定的政治权力交托给党和党的领袖的极大危险。

与努力发展文化并团结劳动人民参加管理——它使一些民主机构从而产生并富有生气——相反，这些做法加强了对政治、

思想、文化，甚至个人生活的典型的教条主义观点。

教条主义一旦盛行起来，将把理论变成一套公式和秘方。它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十分丰富的经验中派生出来，不能完全取而代之。但是，流传着一种马列主义科学性的观点，认为马列主义是机械的逻辑体系，一切都能从前提中加以推论。这就事实上导致一种唯意志论，一切取决于对前提本身的武断解释和所使用的逻辑方法。

这种闭关自守与真正的善恶二元论邪说结合在一起，把在资产阶级敌人的范畴内搞的一切都说成是错误的，从而忘掉了阶级斗争也在这范畴内进行，以及资本主义也需要客观的科学材料。这就造成了思想上的孤立（并不低估对苏联进行思想封锁的重大责任），限制或取消了讨论，导致了思想上的闭关自守、某种退化。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制度，在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只有党、它的领导机构或领袖才能提出或肯定新生事物。在理论上的后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辩证观点的重曲。

这方面的后果决不是用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各国党、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各自的理论活动的发展中进行了抵制，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或多或少受到教条主义现象的影响。至于由此所造成的理论上的损失，举一例便可使人们对此有一点概念。

在苏联，对社会分析的中心观点（在以下几章中我们还要谈到这点），根据某种结构主义思想，难道不是互不矛盾的共存？城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被统治者与国家之间的平衡是主要的命题，问题是要缩小差距，而不是克服矛盾。这就导致（个人、经济、文化等）诸如“协调发展”之类的观点，这些观点不

是促进对问题的了解，而是成为这方面的障碍。还须指出，这些主题是经验一元论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的直接延续，正如人们所知，列宁曾认为这些看法必须强烈地加以反对。

但是，事物并不按照认为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发展没有矛盾的那种直线的观点发展的。只有指导政治、思想生活的铁板一块的理论概念才与这种观点相吻合。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矛盾，它远没有完全消失。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正在我们所处的时期传播，在决定存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历史运动的原因以及个人活动的条件等方面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学校、报刊、文化网和党过去和现在仍然使人们生活在部分虚假或至少是被歪曲了的世界之中。象劳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这样一些决定性的因素在那里所占的地位是其它制度所没有的。但是大量的现实情况，甚至一些事件或人物完全消失了，或者只从与直接的官方思想相符合的角度表现出来。

人们难道不会怀疑，是否在一定时刻，党不再信任人民，因而不对人民讲真话；斯大林或其他一些人不再信任党，因而不再由党民主地作出决定。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带来了人民对党失去信心的巨大危险。

本章的第一部分正是倾向于上述这种解释。这难道不是比用个人的恶习和恶意或认为一切政权永远必然要进行压迫的那种解释更符合历史事实吗？

这些假设否定了那种把集中营和屠杀简单地说成是某一个政权必须对敌视它的人民进行大规模镇压的解释。相反，人民没有那种遭受政权大量镇压的感觉。最触目惊心的事件，就是审判或撤换领导往往无人过问，甚至得到人民的赞同。这种在

今天看来也是难于理解的情况，叫人如何解释？

的确，当时上面是表现了有组织地进行恐怖的压力决心，这种决心既不属于血腥的疯狂，也不是在困难面前的狗急跳墙。但肯定，那是在混乱之中发生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三十年代的情景。当时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使用这些形容词并不过分。对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但那也是日常生活极端困难、几乎无法容忍的年代，当然犯了一些错误，还有封锁和天灾，但尤其必须集中一切手段、力量，发挥人的一切能力来保证成功。人们也正是那样做的。

生活本身所要求的这种极端的紧张状况，被党所拥有并提出的概念进一步夸大了。许多共产党的干部由于他们有被隔离和孤立之感而使他们感到赋予他们的是一种特殊的重任。他们在党内，似乎是被围困的苏维埃堡垒中的被围困的堡垒。这种情况难以使人趋向于温和的人道主义。

党员群众中难道不是滋长了这样的思想，即在任何情况下党都是必须加以保护的工具和武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是支撑整个社会的顶梁柱？顶梁周围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可能完蛋。

在这种情况下，提到领袖就能帮助人们保持或恢复战胜困难的信心。

把党当作唯一的、全能的工具这种学说，还是由在地下斗争时期布尔什维克所形成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它导致这样的思想，即：一切都是为了党，任何人必要时都应该为党而牺牲。这难道不就是牺牲精神的实质？否则，这种精神便是不可理解的。它曾使许多干部，甚至最负责的头都为了使党不致被削弱

而放弃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甘愿自己受谴责。

无疑，还有这样的思想，即：既然革命已经结束了人类过去的历史，那么，从今以后历史就会前进，一切都会朝良好的方向发展。这种乐观主义的历史宿命论使党不管如何都成为历史进步的必要工具。它使牺牲成为崇高品德。

这是对历史运动辩证法的十足的歪曲，它导致一种对党的迷信。它同人民群众中的个人迷信一样，并与之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安分守己和逆来顺受，认为这样才是现实的态度。否则，如何理解那么多无产阶级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会参与某些做法这一事实呢？这些做法如果不是在党内符合某种思想、某种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外界的关系——世界被看成是统一和面向未来的，那么本来是不可能盛行的。

另外一些因素助长了混乱。

劳动改造营起初在原则上拒绝成为一种监狱，拒绝通过劳动来把革命前后涣散时期人数如此众多的罪犯和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重新纳入社会的主张。劳动营本来是应该让那些在营中生活的人参加社会主义大工地的劳动而恢复自己的人的尊严。在这个问题上，马克西姆·高尔基曾赞成这种做法，而现在又去指责他有意把不人道的镇压掩盖起来，这是卑鄙的，尤其是因为这些指责来自不久前还曾那么热情地赞扬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在猪圈的劳动而得到“再教育”的那些人。在这方面还须补充说明，劳动营里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同普通的工地没有实质的差别，都缺乏设备和给养。

群众过去进行阶级斗争的极端强硬的手段，也许还有对帝俄时期各族人民历史上发生的极端残酷行为的历史回忆，无疑掩盖了专断措施，以及无效的新的强硬手段和残酷行为这一事

实。另一方面，在欧洲和世界的范围内，笼罩着法西斯和希特勒主义白色恐怖的气氛。

当时确实存在着不安定的气氛，一种用国内、特别是国外敌人明显的颠覆活动来挑起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的不安定的气氛。斯大林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即：阶级敌人的影响越是削弱，人数越是减少，他们越是采取阴险的斗争手段。所谓敌人力量愈削弱它就愈疯狂，因而更加危险。热诚可能掩盖着背叛，因此谁也不可信，到处出现了不安。正如在一切侦察活动中的情况一样，用真真假假的手法造成的混乱来搞乱线索，转移视线。人们弄不清楚拳头是从哪里打过来的，也不知道是在打谁。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归罪于斯大林。很少人怀疑这一事实，也无法肯定谁会在某一时刻掌握事实。

无论如何，秘密警察和镇压机构压倒了所有其它的国家机构，甚至压倒了党本身，正如苏共在一九五六年所说明的那样。其结果，我们在上面已经阐明。

还必须研究这样的看法，即：粗暴镇压是不是官僚主义必然的执政方式，官僚主义是否利用镇压来维持其政权，而社会主义是否必然导致官僚政权。

我们暂时在这方面只提一些看法，因为在第三章和第五章，我们将回过头来再谈这些问题，我们将指出苏联政权不能被说成是官僚主义执政的政权。

苏联存在官僚主义，这是大家谈论最多的一个共同点。苏联报刊也天天大谈特谈——顺便提一下，这与反共报刊不谋而合了，——以便把这个不断出现的怪物轻易地当作苏联一切缺点和困难的替罪羊。

难道还需指出，官僚阶层和官僚主义思想的存在是与国家

权力的行使分不开的？此外，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官僚主义作为政权的手段是特别厉害的，它与贵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往往是其组成部分。革命后，官僚主义又很快恢复起来了，这也曾是列宁感到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官僚主义阶层是保守的、墨守成规的阶层。它有点象生产者和最高权力机构之间形象歪曲的银幕。尽管它无法把自己的政治目的强加于前者或后者，它确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关系的实际情况模糊不清。

官僚主义阶层既是斯大林政策的工具，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他镇压的受害者之一。认为斯大林一面要使其顺从，给以大小特权，一面又对它进行威胁，这种看法并不完全错。但是，让我们重申一下，任何解释只要不超脱政权和行使政权的范畴，便是肤浅的，最终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们更倾向于把问题倒过来提，并认为民主的功能的发展除了其它效果外，还将使反对官僚主义弊病的必要斗争更加有效。在斯大林时期，这种功能受到了限制、阻碍，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否定，而官僚主义的作用相应地增加了。

提出以上看法的目的，是设法在那些可怕事实的不可忍受的现实后面，找出能足以说明问题的根源和情况。这种探索不能与苏联社会发展的研究分割开来，因而归根结底要研究苏联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情况。这些将在以下几章中详谈。

第三章 社会结构的几个特点

在我们的祖父辈谈到革命的时候，他们常常说这是“社会”革命。确实，制度的变革首先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革。

就这一点而言，苏联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城市的发展。一九一三年，城市人口只占百分之十八，今天已占百分之六十二。尽管由于种种灾难和战争造成了居民的死亡，但是人口还是从一亿六千万增加到了二亿六千万，这意味着，城市人口几乎增加了五倍，而农村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

生活在乡下的人并不一定就等于农民。农村里有学校、医院、作坊、小型企业、行政机构等等。早先，农民本身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而现在仅占全国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到本世纪末，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工业化和脑力劳动、服务行业的发展。

统计数字表明，工人阶级从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六发展到百分之六十一·六，即从占人口的七分之一变为整整五分之三。一九七六年，工人有七千三百万（农民有二千七百万）。

从事不同专业的知识分子，最初只有几十万人，现在已经接近二千五百万人。

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是个转折点，在那个阶段，城市人口赶上了农村人口，工人阶级达到了就业人口的半数。应该指出，苏联的理论家们正是把那几年作为进入所谓发达社会

主义阶段的标志。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赫鲁晓夫式的狂热，开始了经济改革的讨论，从而进入了向各方面进行探索的阶段。从那时起，工人阶级的人数继续大幅度地增长，然而增长速度已渐渐减慢。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仍然以遥遥领先的速度在持续地增长。

根据初步分析和统计所提出的全部资料来看，上述变化同其他任何现代国家的变化大体上一致。然而，两种变化之间实际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一，苏联的变化速度很快。第二，这些变化是根据一个明确的方案来实现的。这个方案不仅包括了由于生产性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引起的比例和结构上的改变，而且还特别包括了各个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的变化。第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的影响具有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在社会结构的统计数字中反映不出来，而这些阶级不仅从苏联的统计数字中而且从苏联的现实生活中一概消失了。

总之，整体运动是由许多极其复杂的个体运动汇合而成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发生了结构上和职能上的变化；换言之，无论是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就促使我们对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它们的相似和相异之处，对由此而造成的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紧张关系在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上层建筑的演变过程中的表现，作一番比较细致的分析。

工 人

从苏联工人阶级——也就是说，在物质生产中从事某一项

生产劳动的领工资的劳动者——的组成来看，它首先包括大型工业企业的工人，他们是这个阶级的核心。但是也有许多小企业，如食品工业、木材、纺织、建筑以及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修缮和保养业等。国营农场还有一千一百万具有工人地位的劳动者，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农民。

从工人阶级在全国各民族中的分布情况来看，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俄罗斯以及在象阿塞拜疆那样在历史上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本民族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工人甚至在乌克兰也曾经是革命的先锋，尤其是在中亚细亚等地区，随着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俄罗斯工人不断来到那里，他们在这些地方也是革命的先锋。加之，由于当地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人阶级，当封建主义或更原始的微型政权向新的苏维埃政权结构进行历史性的跃进时，俄罗斯工人往往是被剥削阶层的盟友。

工业化和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策使工人阶级在上述地区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在最初阶段，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提拔民族干部的政策，因此工业部门中的高级干部大部分是从当地人，包括从非技术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在全部技术工人中，斯拉夫人多于当地人。总的情况是朝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

最近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工人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情况：四十年前，俄罗斯族工人人数是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族工人人数的五倍，乌兹别克族工人人数的三倍，白俄罗斯族工人人数的两倍。如今，这种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俄罗斯族工人人数与其他民族的工人人数相比，至多只多两倍（如摩尔达维亚和土库曼），吉尔吉斯族、格鲁吉亚族和塔吉克族工人人数，只比俄罗斯族工人人数少百分之四十，鞑靼族、亚美尼亚族和波罗

的海沿岸民族只少百分之十。

当然，从内容上看，差别还要更复杂一些，在乌兹别克的俄罗斯工人同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工人，不完全是一码事。不管在什么地区，只要是在大型企业或加盟共和国一级的重要的建设工地上，那就会形成一个民族的混杂体。在诸如开发西伯利亚或其他新的地区的尖端部门中——那里的技术往往是最先进的，——技术骨干和思想进步分子都是从苏联各地遴选来的。在这些部门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某些区别已逐渐消失，而这种消失的过程与各民族聚居地区及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的情况大相径庭。在后者，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水平一方面普遍趋于一致，但另一方面，民族个性化的现象却很明显。比如，不同民族的男女互相通婚和同时使用两种语言的事例，尽管全国各地都在逐渐增加，但在上述尖端部门中，这种事例比各民族聚居地区和各民族加盟共和国更多。

工人阶级的专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由于工种、部门和地区不同，情况也不一样。例如，在纺织业中，有的地方如爱沙尼亚，往往一些小型工厂的自动化程度极高，而许多大型企业一般在技术上都不太先进。在以妇女为主要劳动力的工厂中，技术进步及公众生活则很少受到重视。在同一个城市里，在以男子为主的工厂——诸如先进的冶金工业——中，工人阶级的教育、组织水平以及同各级政权机构对话的能力就大不一样。

总的来看，非技术性的劳动相对来说还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纯粹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率是经过很长时间才下降到不到半数的，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个比例并未发生很大变化。

的确，这部分人中包括一定数量的技术熟练的校准工、修理

工和钳工。但是工具车间不得不经常去修理和制造零配件，而这些零配件，只要很好地安排各个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计划性，完全可以成批生产，而且可以使成本大大降低，因此，这些技术熟练的“手工”工人成了影响工业劳动总生产率的负担。

非技术性劳动之所以那么多，一个原因是许多企业设备陈旧。尽管使用了众多的方法来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生产的需要，不允许把技术上过时的生产停顿下来。顺便提一句，必须让机器转动的压力，在整个苏联的生活中是一个相当令人担忧的问题；人们不是花时间去改革那些在技术领域内、在劳动的组织方面、在社会生活乃至公共生活的组织方面有待改革的事情，而是倾向于将老的技术、老的结构和老的思想方法一成不变的保留下去，一直到无法使用为止。

流水作业往往是那些在现代化或十分先进的工厂中工作的青年人的必经之地，与流水作业相比，非技术性工种则更是清洁工和所谓“辅助工”——技术工人在体力上的帮手——或那些产品检验员、仓库保管员、搬运工、开电梯工、看门人的必经之地，在我们这里，这些人都列入职员队伍。这类职业的大量存在，一方面避免了失业，但同时又使人感到这多少是个负担，以及生产还组织得不尽理想。

上述情况会使人们产生某种消极情绪，使人们在劳动中持某种得过且过的态度。然而，它同时也成为人口大量流动的根源。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苏联工人根本不是过去所了解的那样，被拴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相反，他们可以轻易地改换住处，调动工作单位，工作地点，乃至他们的工种。这方面的情况同战时、同斯大林时代大不一样，那时人口的流动性是受到控制和极为有限的。这种劳动力的巨大流动涉及到的主要是非

技术工人。在规模小、技术差的落后企业里，技术水平最低的工人，晋级的可能性也最小。因此，换一个条件较好、工资较高、提高技术的希望也较大的工作，对他们更有利。工人们，特别是青年工人，他们寻觅各种机会以求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并且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

在大企业里，一般来讲，晋级和提高技术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在那里设有进修课、进修班、夜校、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而他们的水平往往很高，——有参加各级职业培训的可能性。

人员在大企业里流动性较小，但是组织得比较严密。这种流动常成为所谓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因素。可以说，在企业内部也体现到了这种流动。工人们有的升为干部、技术领导、管理人员和政工干部，有的继续当工人，由于他们的工龄和晋升同企业是联系一起的，因此他们已和企业融为一体。他们同一些常设机构和工人组织往往关系更深，如：共产主义劳动大队、竞赛班组、经验交流小组、提高专业或试验小组，或者一些既是职业性的，又是家属可参加的机构，如当地家喻户晓的“工人”之家^①。

一个年轻工人的前途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到大规模的勘探基地、工业发展基地、油田或遥远的北方去工作，是因为那里有高工资和巨额奖金在吸引着他，他可以去那边“赚卢布”。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区，人员的更换进行得很快。在别处，往往是那些乡下来的男女青年来到工地，成为他们所建造的工厂或工厂的一员：大学生或熟练工人。

① 一种半官方的工人福利机构。

社会分化也可以因为每个人被企业或社会生活吸收的程度不同而造成，如某些人多少感到自己与发展有直接关系，他们在提高业务能力、教育水平、责任心和参加管理的热情等方面比较自觉。此外，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比较有利于他们在上述各个方面的发展。

总之，劳动力的流动造成了相互矛盾的后果。如果把它作为提高技术水平的手段来看，那么它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但同时它又会阻碍个人和企业本身的进步。这正是新政权所面临的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令人感到棘手的矛盾之一，为了充分就业所采取的强制性手段，必然容易造成相互矛盾的效果。由此，劳动者争得了施加压力的手段，他们可以利用目前这种类型的发展所产生的对劳动的需求，然而，施加压力对他们本身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一方面，流动性体现了推动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一定时期内对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否定，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要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困难的。

从整个历史来看，苏联工人阶级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在长时期内，农民始终是工人的主要来源。他们自发来到城市，有的是有组织的招工的结果，有的由于农村生活困难。而农村的发展从属于工业的发展，由于时期的不同而时快时慢。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以及农村生活、劳动条件的某些改善，近来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大大减少，但在青年人，特别是在女青年中，人口外流的现象仍很严重，他们在乡下很难找到能满足他们目前要求的技术性工作。

由此可见，城市里许多工人同农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原先就来自农村，或者在乡下有亲属，或者还在乡村保存一块自留地。有一个新现象值得提出来，当然还不是普遍的，

但它也许正反映了时代的社会特征，有些工人住在郊区，稍有空闲便在花园里种自留地。这种回到大地上去的倾向也许出于生态学方面的考虑，或是因为食品方面的需要，但是它产生了另一类型的愿望，这与多数人要求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或管理和领导工作的愿望截然不同。

总而言之，现在工人阶级已成为多数，来自农民的部分也越来越小，而越来越多是来自本阶级的人员。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社会变化。过去，工人阶级的文化基础、生活习惯、精神状态、乃至参加政治的思想方法都同农村的现实十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可是现在，在有些工人身上，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一个世界正在消失。也许这种看法有所夸大，却很符合实际。与此同时，这个新兴的工人阶级比较自觉地提出了恢复其应有地位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在思想上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成果。

农 民

但农民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居住条件、农村聚居区的原则、种植、畜牧、耕地的管理、个人的前途、与城市在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知识水平、生活方式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这一演变共分三个明显的时期：一九一七年和分配土地运动时期；一九二九年——一九三零年和合作化运动时期，合作化运动一劳永逸地将农业生产组织到大集体中去了；一九六五年和农村经济的起步时期。通过这一起步，农村开始克服长期形成的落后状态，过去，尽管也有某些进步，但与全国总的发展相比，还是落后的。

以上只是一般概况。乌兹别克斯坦那些以种棉、种果树为

主的富裕农村、库班地区盛产小麦的肥沃土地，同俄罗斯中部贫瘠古老的土地相比，差距是多么大啊！有时，一个管理得当的集体农庄同经营不善的邻庄相比，悬殊又多明显！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适合本乡本土的那种农村生活的传统同下述现实发生矛盾：农村人口外流的凄惨景象，经常是无能的行政管理、既是人们希望的、又使人们害怕的那些引进的农业技术和机器、以及从工人城市照搬到农村的学校等，这些矛盾多么令人痛苦！

今天，苏联的庄稼汉比城里人年龄要大。在十个参加劳动的集体农庄庄员里面，有七个已达到退休年龄，而在工资收入者（工人和职员）中，每十个就业人员中只有两人达到退休年龄。在农村人口中，集体农庄庄员，换句话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仍然是人数最多的，约占五分之二。国营农场领工资的劳动者大概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三分之一是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

但是，这种划分可能使人看不清一种双重的变化。

一方面，两者逐渐接近。尽管国营农场劳动者具有工人的地位，但他们的生活仍处于农民的水平。自从在集体农庄中开始施行一系列社会法律，并建立了有保证的按月付酬的制度以后，集体农庄庄员同国营农场工人的差别也就越来越小了，而且他们的工资也几乎达到了工人的水平。农村的运输工人、建筑工人、手工业工人、村镇的服务人员、邮电工人等往往就是过去的农民。他们常常轮流着时而做“工”，时而务农，因而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除此之外，同一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从事的社会职业，一般也不同，从而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年青人的文化水平总的来说大致均衡。

另一方面，技术、文化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都在不同程度

上影响了农村各个阶层。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进步，又造成分化。历史上首批国营农场工人和机器站、拖拉机站的工人形成了一个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掌握机器的工人、司机和机械师组成的阶层。目前，这个阶层以青年为主（特别是男青年，尽管也有女的，但极为例外）。青年的人数在国营农场的职工中占百分之四十，但在集体农庄的庄员中还不到百分之二十。然而，与此同时，在国营农场里，农业和畜牧业的纯体力劳动还占百分之五十，在集体农庄里还占百分之七十。这种情况同青年们的文化水平和他们的要求，城市里的条件相比，是不协调的。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担任行政管理 and 干部培养、农业科技、兽医及其他科研活动，这是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的。

解决的办法要从多方面去寻找。最有希望的是发展农工联合企业以及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大规模的饲养中心；此外，也必须通过这些方式去满足食品生产的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些企业如同工地一般，能培养出一支既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又是比较整齐的队伍。另一个方面，也使农村的多种经营结合起来：农业现代化、建立中小工业——其中一部分可以是季节性的，发展文化和交通网，改善公路交通，使农村与城市中心联系起来，改善居住条件。

自留地和家养牲畜不再被认为是旧制度的残余，也不再单纯被看作是对粮食总来源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自留地和家养牲畜已成为农村生活中正常的组成部分；多种家庭副业的内容（尤其是对于老人来说）以及收入的固定来源（尽管这种来源在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在一户集体农庄庄员的家庭收入中，来自参加集体农庄劳动所得的部分占百分之四十三，来自自留地劳动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六，

来自社会补助占百分之二十一，来自家庭成员在农业劳动之外所得收入占百分之八。

总之，要建立人们所希望的平衡是困难的，昨天形成的不平衡需要人们今天来付出代价。在富裕的地区，农村人口过剩，这丝毫不能促进发展。在贫穷的地区，需要青年人去使用现代化机械，化学设施，进行现代化组织工作——这些设施目前已有许多。可是对他们来说，城市更富于吸引力，更何况城市同样需要善于钻研技术的劳动力。

知识分子

苏联关于知识分子的统计数字是含混不清的，这一点恰好暴露出人数增长速度最快的这一阶层的社会状况是相当复杂的。

好几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统计时交叉重叠在一起。一类是“职员”，他们同工人一起，构成广义的“工人阶级”，它还包括我们称之为商业系统和办公室里的职员、官员和知识分子。另一类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它包括工程师、技术员、教学人员、医务和研究人员、从事商业和通讯的工作人员、艺术家、文化人、会计和计划工作者。再一类是“完成了高等教育和中等技术专业教育、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工作的人员”。据一九七七年的统计，第一类有三千二百万人，第二类有三千七百万人，第三类有二千五百万人。

在这三类人中，最大多数的是技术界的知识分子，生产领域中的工程师、技术员以及管理人员。其次是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知识分子，最后才是大批的低级官员。

担任一定职务的行政官员，国家企业、党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人数不多，约二百万左右，不到全国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这批人的绝对数字增长不明显，因而他们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显著地下降，特别同第二次大战前和战争一结束那几年对比，尤为如此。相反，与行政职务相比，知识分子中担任技术领导职务的人数增加了，首先是在企业内部。

知识分子阶层中有很大大一部分人来自工人阶级。甚至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也很少有人来自旧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这些旧知识分子已经融化到群众之中，他们的后代往往都已变成了工人。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或者是通过教学途径，或者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提拔来保证的。他们分别在各级担任技术或政治领导职务。

一般地说，军队也是培养和提拔人才的场所。它负责造就一部分未来的知识分子。当然，军队还有它自己的、具有专长的知识分子。

但是，近年来，中等教育的普及提出了一个如何安排青年一代的问题，是立即吸收他们就业，还是让他们进入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培训中心或高等院校学习。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在苏联高等教育中，综合性大学的比例是很小的（只占十分之一），绝大多数是直接为就业作准备的专科院校。这些院校，有些实行全日制，对于已有职业的成年人，则实行夜校和函授制，此外，在相当于法国高中的这些学校学习之后，学生还可选学别的专业，或者接受专业化很强的高等技术教育，或接受短期的职业教育，学习这些科目有无中等学校的毕业文凭均可。

每个人如何根据社会的需要，本人的爱好和学习成绩向上

述不同的方向发展，从而保证社会平等，这始终是人们讨论、试验和改革的题目。

在苏联，要求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多得多。例如，在法国，一部分青年人从一开始就对往上爬完全丧失了信心。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寻找职业使人们失去了对提高技术水平的需要和愿望，进一步接受“培养”的道路很难缓和这一矛盾。可是在苏联，情况正好相反，希望提高技术水平的要求经久不衰，想到大企业去工作的愿望使青年人产生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的愿望。

革命成功以后，各阶层的人都强烈要求能受到高等教育，因此脑力劳动格外被人重视，有些工作的工资也高得出奇。目前，情况有些变化，就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受到的教育而言，发生了“过剩”现象，也就是超过了工作的需要。因此，某些高等专业化的体力劳动部门又吃香起来。此外，由于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部门的吸引力就更大，而且那里的报酬也往往比低级的脑力劳动要高。

总之，普遍存在一种要求受高等教育、高等技术教育的愿望，因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占据领导岗位。然而，比较而言，这种可能性总是愈来愈小。与此同时，某些体力劳动的工作却打开了相当诱人的新前景。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不存在社会分化？有没有独享高等教育的特权阶层呢？

尽管对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身没有完整的统计，但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调查报告和许多文章可以使人对这个问题的概念。

首先应该提到，长期以来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一直是坚决纠正由于社会出身的原因而造成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使每

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革命成功以后，在贵族、教会人士和资本家的后代面前，筑起了一道障碍。一旦这些限制失去了目标以后（一九三六年），障碍就被拆除，剩下的只是通过经常变换的手段，借助于一整套措施使出身于工人阶级以及农民家庭的青年人能优先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总的来说，效果是显著的，因为人人机会均等。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然而，社会的演变，在青年人的愿望中反映得十分灵敏，这种演变也反映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即不同类型的青年其实际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也不相同，更不必说教育内容和青年人的出路了。

根据一九七五年前后的统计，大体上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三分之一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工人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十分之一来自集体农庄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一半以上来自知识界（知识分子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在学生学习期间，这个比例的变化不大（须知，有五分之四的学生能自始至终学完课程毕业），但知识分子的比例总还是在逐步地增加。

当然，这又得视情况不同而言。综合性大学学生的社会成份与培养文学、艺术、师范人才的专业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学生的社会成份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两类学校中，工人子弟显然居多。其次，从整个晋升的阶梯来看，可以从生产部门直接进入受教育部门以及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岗位。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军队，军队往往是个过渡阶段，从农村来的人经过军队向高级专业化部门转移。

七十年代初，中等教育尚未向全体青年普及，就以走向高等教育为主要方向。加之，脑力劳动享有崇高的地位，这就造成

大量青年找不到出路，或者往往还无充分准备就被迫改行。因而，职业和技术教育得到了发展。这种教育的水平原则上都是一样的，它的方向是从事与生产和服务行业有关的职业。欢迎这种教育的主要是工农子弟。这样，又产生了高等院校中工人子女过少的危险。目前正通过成立大学预科班，由企业付给助学金等措施来消除这一危险。

教育的多样化也因地区的不同而各异。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到工厂当工人的吸引力就比较大，甚至对于知识分子的后代也不例外。

事实上，那种来自不同社会出身和不同职业的人互相渗透的现象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在苏联，每当举行家庭会议时，人们会发现，家庭成员中有从事各种社会职业、担任各种工作的人，如农民、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国家官员，很少有例外。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反映社会流动性的现象涉及全国人口中数量很大的一部分人，也反映大门是向成千上万人敞开着。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阶层只是靠自己关起门来在内部扩大队伍，因此就说他们垄断了领导岗位。

但同时，也必须注意，目前存在某种“沼泽派”^①。在城市中，由数万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中间阶层：如低级教员、大批行政官员、职员，以及工作不多实际上等于无业的青年。他们是群众的一员，可是他们的前途飘忽不定，他们的希望很快就遭到破灭，最后只好走上渺小的个人奋斗之路。他们的天地中既有抽象的理想，高尚的人道主

^①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在国民议会中的中间派，又称“沼泽派”。

义，又有面对现实和变化时所感到的恐惧和憎恶。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不是一支有能力带来必要进步的社会力量。

有特权阶层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经常考虑，谁在行使权力，是否存在一个比别人掌握更多的权力的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

教育是提高群众社会地位的主要方法。但是，社会地位的提高并不等于担任了领导职务。反过来说，若要担任领导职务必须完成高等教育。正在晋升中的人们不能不系统地进修。党内有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网；它是为党的负责干部开放的，但同时也向那些在国家机关、大企业、大单位中担任或即将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或非党干部敞开大门。有时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本人能力大小如何，必须有一定的大学资历才能担任相应的职务。常见的弊病还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弊病使民主原则不能得到正常的贯彻。

党和国家机关、企业及高级研究机构等某些高级领导人拥有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物质利益；有专设商店为他们提供量多、价廉、物美的商品；一整套第一流的治疗设备和休闲娱乐场所；他们享受漂亮的住宅、汽车、以及去国外旅游的方便条件等等。早先实行过的额外工资补贴虽然已被赫鲁晓夫取消，但其他的优厚待遇依然保持不变。

必须指出，上述特权与我们这里的亿万富翁所拥有的特权，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与在亿万富翁豢养下的寄生阶层的特权也不能相比。因为，后者之所以能过奢侈淫逸的生活，完全是靠了前者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苏联曾经历过一个艰苦奋斗的

时期，那时，生活用品极端匮乏，人们就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发给每个负责人极低的工资。对当时来说，那种做法是必要的，这可保证那些负责人——一般来说也都是些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得以从事他们的工作。后来，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上述作法以某种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此就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造成了差距，有时，这种差距还相当大。应该说，这种待遇在过去和现在往往都是以不分昼夜的、负担极其沉重的工作为代价的。

此外，这些特权同个人拥有财产而带来的特权根本不能相比。拥有这些特权的人不掌握任何财产。他们不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有些人那样掌握着大托拉斯。在苏联，他们没有所有权。总之，优厚的待遇和职务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靠它去积累个人财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有谁的行为不正派，也至多搞点小规模的非法交易而已）。谁失去职务就失去一切。

然而，到了一定的时候，掌握职权的人就可以施加压力，以保全他们自己的职位和特权。在客观上怎么会不出现死保乌纱帽，官官相护和照顾子女的倾向呢？事实上，苏联的报纸和官方文件没有一天不在揭露这类丑事。可是现在的政治生活方式和群众对领导人实行的所谓监督能够完全避免发生这类丑事吗？能不让它们继续发展下去吗？

大体上是在三十年代中段这个关键的时期，形成了这样一类人，对于他们来说，行使某一级的职权几乎已经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最高权力当局掌握着施加压力的两种手段：如果上述负责人在它面前失宠，他们就会面临两种威胁，或者被清除出去，同时失去所享有的全部利益，或者连性命也丧失。腐蚀和镇压的双重压力同政治上的忠诚、对工作无条件的服从是联

系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这个阶层。所以，不能简单地
说，它是个官僚主义的或“斯大林主义”的阶层。

此外，在领导人内部产生的许多矛盾证明，仅仅用生活方面庸俗的社会学是无法解释党内发生的政治斗争为什么要采取那样的形式。如果说派别的考虑和利害不同是主要原因的话，人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多年来领导阶层中的思想分歧和冲突会发展到采用消灭对方肉体的手段。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把自己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曾经进行过艰苦的战斗，特别是打过仗。但是，这个阶层根本谈不上是清一色的，也并不是因为有共同的切身利益而团结起来。这个阶层反映了苏联社会本身的矛盾。

目前，干部晋升的正式手续中包括一项必须递交“专业技术训练合格证书”的制度。任命或推选某人担任领导职务，以及大部分行政机构中的高级职务，包括技术职务，都必须有这种证书。这种十分类似于法国的“训练合格者名单”的法律工具，造成了金字塔式的层层依附。处在最低层的人通过他对上层事事依顺的行为来企盼晋升。这些依附关系通过不同程序，被公众舆论的干预或被相互间的监督缓和。从原则上讲，这些依附关系是为党和国家的总政策服务的，人们可以感觉到它们造成斜门歪道的危险。

上述情况说明，一个人造的、不加掩饰的圈子是存在的。它包括各种类别的负责人。生产方面的、党的、苏维埃政权方面的，国家机关的，各种团体的负责人都应该算进这个独一无二的圈子中。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将他们捏合在一块，而且是因为他们公认的任务是要实施党和国家的统一政策，要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为这一政策的协调一致的促进派。

所谓“要害部门职务”是这个制度的支柱。这些要害部门有关的职务，如果没有工会、苏维埃的支持，谁也不可能被任命或被选上，其中最重要的，还必须要有党的同意。因此，所谓“要害部门职务”是一连串职务的代名词，数目相当多，而不是人们常以为的人员的名单。虽则如此，但谁只要进入属于“要害部门”职务的这个圈子，就很少有人脱离它。

他（她）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我们虽然提及“她们”，但是妇女担任领导的只是在基层较多，愈往上，比例愈小）。

革命胜利初期，领导工作以及由于干部叛逃而空缺的技术领导工作，都由工人党员来担任，他们边干边学。后来，才渐渐形成今天这样完整的领导职务逐级递补制度。在大镇压时期，许多干部被杀掉了，他们的工作暂时由那些技术、业务或知识水平不高的人来代替，而这些人之所被选中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绝对忠诚可靠。尽管后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所造成的后果，至今仍未消除，在一些企业和科室中担任领导工作的是所谓可靠的“实干家”，他们接受教育较晚，又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有时完不成自己的任务。然而，他们越是业务水平低，待人越是专制，而且还牢牢地占据着相当一部分职位。

如今，干部晋升的方式已完全不同。一般讲，高级干部都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这就难免使他们同那些通过边干边学培养出来的领导人之间关系紧张。这些工人，常常还有些高级工程师（不光是在生产中）所以能脱颖而出，因为他们在技术或政治上自有一套，他们无论是对下级还是对上级各部门、各机构，素来以要求严格著称，享有一定威望，因此被选中担任领导职务。

在此必须提及，许多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认为，如果让苏联企业的领导人自由行动，他们可以成为出色的资本主义商人，但是他们现在备受束缚，失去行动自由，成了可恶的官僚主义的牺牲品。这种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凡是经常接触苏联大企业领导干部的人都了解，这些人的权力很大，而且他们的影响往往超出企业的范围，他们这些人加在一起形成一个由政治负责人组成的举足轻重的集团。

如果再继续往阶梯的上端前进，就会在政府各部门里发现一个承担技术性职务的高级干部的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也起很重要的仲裁作用。作出实际决定的机构，是全国的各级党委和部长会议。当然，最后还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说了算。

上述这些人员，是原已进入领导阶层的成员，根据他们想引进新人的观点，把他们逐一吸收，以求使他们认为正确并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后继有人。

没有任何人天生就有权进入这个领导阶层。也不能因为某人拥有别人没有的财产、生产资料、在社会上有权势就可以进入领导阶层。家庭或社会出身也不能对此发生影响。

诚然，个别例外是存在的。如有人利用亲戚、朋友或同乡关系，但即使如此，也只是为了搞到一张文凭，找到一个工作或职务，很少是为了当领导。也许裙带风在某些加盟共和国或某个时期比较盛行，但是这种现象完全是次要的。

培养高级干部有专门的学院，如国际关系学院，它专门培养外交官以及从事外贸和国际新闻的高级干部。这个输送干部的基地有它自己的传统和社会关系，从而形成自成一体的小天地。不过，这也是特殊情况。

但一般来说，一个人能进入领导阶层，是因为他善于有效

地贯彻现行政策。

从外部进行广泛选拔后产生的干部，组成一个相当严密的阶层来行使这负担沉重、拥有特权的权力，这就产生了种种弊端。我们正是全面考虑了上述情况，才来估量这些弊端的。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阶级？

这些人是否足以形成一个阶级？有没有剥削？有没有人们经常在文章中写到的分配剩余价值，使社会上一大批人得到好处的问题？

如果存在剥削，那就意味着有一个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另一个阶级则掌握了生产资料并进行再生产，也就是说可以增加生产资料，以致于由此而产生的大量财富源源不绝地流进这个阶级的口袋。

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苏联厂长，也没有看到过一群厂长把他们的金钱变成资本，出售生产资料，把出售的产品据为己有。除去少数寄生现象之外，上述情况是不存在的。没有剥削，也就是说，没有因为掌握生产资料而使一个阶级能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

但是存在另外一批人，叫官僚阶层，也就是说，使用社会生产资料时必须通过这些入，他们集中了全国人民采取决定和接纳创议的手段，但这不是一个有产阶级。

现在，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中心：苏联革命是否是用一个剥削阶级取代了另一个剥削阶级？这场革命是否使事物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至于了解苏联是否有相当大的变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承认没有新的有产阶级，而只有一个集中了主要决定手段的社会阶层，那么当人们发现苏联社会主义有那么多困难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官僚阶层是否对收入有影响，换句话说，即对劳动者在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分配中的地位是否有影响。如果这个阶层不把产品据为己有，如果它不把产品作为私人财产再生产的手段，那又作什么用呢？

在目前阶段，由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财富与他们是分离的，它们已被征收，或者说是异化了。这笔财富的命运如何呢？可以说，它是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渠道中被冻结和浪费了。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军火生产。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它使前景更为渺茫，分散了资金，妨碍社会问题得到迅速解决。由于生产财富被转移，所以社会总经费受到影响，以致解决问题更加困难。

军费开支造成的浪费只不过是使已有的情况更加严重而已，而严重的情况并非它所造成。在发展必要的现代化的大量武器以保持同帝国主义抗衡之前，为了解决供应和发展企业，已经开始了加速积累的持久斗争，早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工业膨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过程已经开始。所以，军费开支不能对此负责，它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苏联理论家认为，这部分异化的财富进入总开支中去了，当然，从这一点来看，情况同资本主义制度不一样。可是，确切地说，征收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积累，除去一部分社会费用的支出外，它完全是使过去的劳动具体变成属于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尽管他们并不掌握。具体地讲，他们不能说“因为我们不需要这部机器，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它生产出来”，既然机器已经生产出来了，就应该使它

在现有社会主义企业的体制下获得利润。

所以，问题不在于了解这样做是好还是坏；问题在于事情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由谁决定”这一问题后来变成了这样的问题：根据什么问题 and 需要、通过什么机构、在什么背景下作出的？

目前的结构必然会产生紧张。同物质短缺作斗争、改善供应、增加设备是一个始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个工厂因缺少机器而影响生产，就必须由另一个新工厂提供，而这个新工厂的建成又刺激了新的需要。一系列在内部出现的紧张状态促进了积累，反映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劳动者还无法控制这种积累运动，因为现有的结构体制不允许他们去驾驭它。因而一旦资金积累被转移至某一社会阶级的手中，就无法加以制止，社会也难以找到什么方法去克服这种事实上的异化。

党

在整个苏联社会中，存在一个领导集团。要成为这个集团的一员，原则上必须是党员，即使不是党员，也必须是特殊人物。可以答应他们不直接参与政治工作，但他们对党的工作必须采取合作的态度，并参加一些决策性的会议，他们实际上是潜在的党员。

党的社会成份是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党员在整个国家的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因为，社会成份受严格控制，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动向。与其说是一个人自己加入党组织，还不如说是党根据一定的政治条件和他本人的表现及社会出身，吸收其入党。

在斯大林时代的后期，苏联共产党约有一半党员是由“知识分子和职员”这一阶层组成的。自那以后，吸收党员工作的重点一贯是在工人中间。一九七七年初，一千六百万苏联共产党员中百分之四十二是工人，百分之十三点五是集体农庄庄员，百分之四十四点五是“知识分子和职员”。而在一九七六年吸收的党员中，百分之五十八点五是工人，百分之十点五是集体农庄庄员，百分之四点五是机关干部，百分之二十五是知识分子，百分之一点五是大学生。

当然，如果要真正了解这个党的实际情况，还需要对上述数字进行十分详细的分析。例如，女党员愈来愈多，每年约占新党员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各民族党员的比例有同各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趋于一致的倾向。在文化和专业方面，党员的水平大大高于居民的平均水平。在尖端部门和先进的行业中，党的力量更强些；因此，在集体农庄中，开机器的大部分都是党员。党员在工人中只占百分之十三，而在科技战线上得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中却占百分之六十五。

这样的社会成份自然对党有影响，更主要的是，党可以借这一点在不同的阶层中做工作。党员基本上是党在社会上的代表。

可是绝对不能因此就认为，党存在于社会之外，党的社会作用仅限于进行领导。

不错，一部分居民甚至连理解什么叫执行国内政策都有困难，他们委托那些所谓“先锋”去管理国家大事。在反对各种缺点和隔阂的斗争中，他们不仅看到共产党员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也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和教育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许多劳动者头脑中固有的思想和看法。他们产生这些思想和看法

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要求对当前形势进行分析、思考和做出反应。

即使党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家的职能，党也仍然同劳动者的活动，国家的发展保持着具体而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党是在群众发展生产力的活动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因为，在重要的生产部门，工人阶级的专业水平更高，他们更加先进，组织性更强，因而，党的作用也更大。

虽然如此，工人阶级在团结社会上各种力量，采取共同行动，解决和克服所遇到的矛盾的过程中，并不是事事都能达到目的的。这并不取决于工人阶级本身有无主观愿望，因为，尽管它作出了努力，尽管它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重要手段，但问题并不总是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有时，问题还会加剧，例如在民主这样一个政治性问题上就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工人阶级没有清楚地看到应增加它的手段，更加发挥它本来应该发挥的那种经济和社会作用。

举个例子来说，在生产出现下降情况的时候，似乎不是着力从不同的利害冲突中去检查原因，不是寻找各方都赞同的解决办法，而是将责任推给工人阶级中那些技术水平较低、工作不甚稳定的另一部分人头上。政治上的这种弊病难道不会导致人们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吗？

在这方面不好预先做出估计。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到目前形势中有两个主要情况：一个是，工人阶级的人数比过去更多，也更有组织了；另一个是，整个苏联社会需要民主才能前进。要民主不是要冲突或分裂，而是由工人阶级进行必要的改革，是为社会主义的进步而将现有的社会力量团结起来。

能否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在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革命的社会中，农村占有极大的比重，以及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带来的后果，是造成许多困难和冲突的原因，其中有些冲突是通过暴力解决的。现在，工人阶级有能力站在社会的前列担负起全部领导工作，它也愿意这样做。但是，人们有这样一个印象：社会每前进一步所遇到的习惯势力的抵抗，都受到同工人阶级处于比较对立地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有可能与原先的农民阶级结成同盟去反对工人阶级。这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是产生某种民族主义，特别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苏联在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候，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它明显遇到的困难的原因吗？

第四章 经济中的动力和障碍

许多关心社会主义，特别是关心法国社会主义前途的民主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效果及其经验产生疑问：经过了六十年以后，苏联经济有何成就？问题在哪里？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什么？为什么取得那么多进步，却又有那么多的障碍？能不能解开这个谜？

本章试图对几个最常见的问题作出回答，这既不是图表，也不是研究成果，仅仅是一些很不全面的想法。

这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右派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其中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散布一种十分简单化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干活也拿钱的经济。这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奖励懒惰和散漫的经济的“官化经济”^①的说法，从前就流行过。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工人不干活而照样拿钱，这就造成了通货膨胀。既然出现通货膨胀，有了钱买不到需要的商品，于是就要排长队，生活就发生困难。工人生活困难，就不想干活。

此外，所有永远不知满足的工人都有不干活的坏脾气。这样，就得有人来反对这种恶习：要么是“自由”社会中的资本家，要么是“官僚主义”社会中党的官员。

^① 滥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用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工作。

于是，一切均靠恐吓来保障，因而使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驯服的经济”，“听从指挥的经济”。那些按上级眼色行事的“不负责任的官员们”在工作中只是消极地执行命令。这样自然就会产生浪费等现象。

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举行议会选举时，人们用同样的理由来散布对左翼共同施政纲领的恐惧。特别是雷蒙·巴尔^①和米歇尔·罗卡尔^②，在他们看来，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是国家经济所无法承担的损失。

而苏联是一个取得了第一流成就的经济强国，它目前遇到了某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困难。但根据我们对法国前途的看法，我们认为，确实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但其责任不应由工人来承担，而应该是他们的对立面，因为工人的特权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经济或在其他方面，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民主。

这一点尚未为大家所认识。我们愿意尽量加以阐明。

社会主义经济的起点

苏联的社会制度是否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确实有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变化？是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否就是真正的变化？这些问题在法国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苏联的生活中，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① 作者写此书时，雷蒙·巴尔任法国政府总理。

^② 米歇尔·罗卡尔是法国社会党少数派领导人之一。一九八一年法国总统选举后，密特朗当选总统，罗卡尔任现政府计划与领土整治国务部长。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几个月起，在困难最严重、战争最激烈的日子里，苏联的经济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从此以后，不会再出现象沙皇统治时期那些垄断资本家和商人所做的那样，为了尽快地掠夺利润而浪费资源，关闭或停办企业，以及投机倒把。人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生产一切商品，利用一切资源，动员所有人都来工作，把一切能利用的都利用起来，杜绝一切浪费现象。

从那时起，开辟了一条通往新社会的道路：这是一个逐渐使任何劳动都能发挥其价值的社会，换言之，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劳动者迟早都将发挥他的作用。在这个社会里，再也不允许有产者向穷人进行敲诈勒索。

苏联经济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能不能说，苏联从那时起已经完完全全实现了社会主义呢？不能。可是，那也不再是旧的制度了。

社会主义经济受到了阻碍

然而，在斯大林时代……，假如法国已改变了社会制度，我们是否会受到威胁？

这里有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让我们先回答关于斯大林时代的问题。

在苏联，政治和社会的衰退产生了罪恶和专制，阐明造成这种衰退的客观环境和历史原因是并非不可能的。

庞大落后的农民队伍（生产率低、收入少、在社会上和文化方面备受歧视、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首先对工人阶级的结构和组织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得大批没有技术、不稳定、容易

受工团主义蒙骗、对民主毫不关心的劳动力涌进工业部门和重点工程。

此外，由于农民群众本身在经济上、文化上一贯落后，所以他们对于全国整个经济生活也有严重影响，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

从总的方面来讲，生产的发展是缓慢的，它与技术进步所具有的严格性形成鲜明对照，劳动力流向重点工程，在那里，为工业生产作准备的体力劳动占优势；在矿山、冶金等部门的固定资本中维持和优先推广粗笨的技术，所有这些情况都扩大了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同大量劳动力之间的鸿沟，这些劳动力缺乏真正的创造性，他们只是用笨重的劳动来为迅速和长期的积累尽自己的力量。

在苏联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客观条件形成了社会主义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力量逐渐削弱，并且不时地损害劳动者的权利，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法国不可能有这些条件。因此，害怕在法国实现社会主义以后会对人们敲诈勒索，无异于对当前真正面临的问题视而不见。

然而，苏联发生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在考虑，如果法国也执行这样一种倒退政策，如同德斯坦和斯托莱卢^①所执行的那种政策，它会给社会造成怎样的损失；人们也在考虑，当那些宗派主义者发表工人阶级不需要发展生产力的谬论时，他们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① 斯托莱卢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一年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法国总统时期的政府国务秘书。

对于在苏联社会中使用专制手段，工人阶级是没有责任的。相反，正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手段以及它的政治、经济作用受到了限制，所以才出现那种情况。历史的发展说明了，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加强，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滥用专制手段的倾向受到了严重打击。

最 巩 固 的 成 果

历史是残酷无情的。但是，有一个变化被保留了下来。

在目前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是一个人人都进行有意义的劳动的社会。就这点而言，社会主义是同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是同所有商品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之前的所有剥削社会的彻底决裂。

这个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是很具体的。总的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生活水平至少是象样的，他们不必吃了上餐愁下餐。在企业中，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很有限，社会各阶层之间工资差别也并不大。

但是，主要问题也许还不是这些。

随着国家的发展，一个人数众多、技术熟练的工人阶级诞生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同，苏联工人可以依靠制度的真正力量，保证他们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收入，以使加强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苏联工人有能力使国家的发展不损害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就拿现阶段来说，这一点还是清楚的。尽管目前经济方面存在问题，但是谁也不能采取一项旨在停止社会进步的政策。

可以说，工人归根到底已经掌握了新的、重要的斗争手段

来发展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已证实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阶级。

向高效率推进

苏联拥有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

许多读者看了反映钢、水泥等的产量的增加数字统计后会说：“你的数字说明不了问题！”他们还会说，判断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不能根据钢的吨数，云云。

的确，我们也不打算从苏联经济增长的数字中一一去分析，哪些东西在浪费和污染中受损失了。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此，而是要说明这个社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各种变化、进步和民主化的强大力量，贯穿着苏联的整个经济领域。

这一事实的最有力的证据，要到苏联经济领域中的所有改革中去寻找。

人们往往把情况说成是，似乎这一运动仅仅局限于一九六五年的“改革”，以及自那以后对改革的实施。这样的看法忽视了改革的深度。

事实是，六十年代以来，在苏联经济中，改革、新措施或变化从未间断。

简单地列举一下这些变化就可以看出其意义。

极其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对待企业经济效果的问题，不是象过去那样，只根据行政领导认为完成的产品来计算，而现在是根据出售的产品来计算。因此，必须生产能赚钱的产品，是为使用者生产，而不再是为了达到计划部门为满足总额的需要

而给各企业规定的某种相应的数量而生产。

为了加速经济现代化，鼓励企业集中，方法是建立工业“联合企业”，即包括一个大的为主的工厂，加上其他一些企业，往往还有一些科研、技术和教学机构。开始时，集中几百个企业，随后扩大到全国的主要企业。而集中本身的主要目的是，依靠内部互相联系的、具有足够数量的工业联合企业，以达到原料来源和交货的稳定，使企业集团内部的投资合理化，调整技术政策和引进新技术。归纳起来就是：满足需要、节约资金、利于革新。

人们努力改进企业管理，使之少点行政气味而更具有经济价值、减少强加给企业的指标，改变其结构。为了提高效率，不仅将利润作为管理的指标，而且把奖金同企业盈利的情况联系起来（问题比较复杂，只能部分地联系起来）。工资总额的计划不规定很死，便于企业根据生产率提高不断给予奖励。

人们努力改进企业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刺激企业节约生产资料。对于那些长期得到国家优先照顾的企业，则要通过征收生产基金税来减少它们的经济收益。

从企业的折旧基金和一部分利润中，抽出属于国家计划之外的、相当于平均投资百分之五的追加投资，交给企业自由掌握，便于企业发挥更大的积极性。

国家还放宽了获得贷款的条件，使企业在为现代化投资和购买原料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简化了生产中的行政结构，以减少企业之间的行政来往手续，明确各自的责任，加强工作效率。目标是根据情况，把庞大的行政层次压缩到两级至三级（包括企业内部，或者一般地讲，指企业合并后产生的工业部门内部）。

鼓励以合同为基础制订计划，以便消除计划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根据这个精神，尽量把生产品种限制在计划之中，即按企业之间所订的合同，具体落实如何交货，如何使大批产品达到应有的质量要求。

鼓励企业之间在订合同之前，先行联系。尤其鼓励在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和销售网之间进行联系，这样才能既打击官僚主义，又防止产品质量低劣和积压滞销。

人们努力改革价格政策，尽力控制一系列生产资料的价格，使生产“重”产品（原料、燃料、设备等）的部门能赚钱，同时，控制生产资料的价格（如车床、电气设备等）。这些都是为了克服部门之间利润率的不平衡现象，减少在价格和国家津贴问题上的混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烦琐的手续。

向民主化推进

苏联当局锐意改革报酬制度。一种旨在更好地鼓励生产成绩优异者的颁发奖金的基金制度业已建立。应该说，工人的奖金更多的是采用年终奖的形式（他们还拿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金，对于能够如期完成指标，或推广新产品、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名列前茅的工人予以奖励）。干部的奖金差别更大一些（如果工作成绩不佳则予以取消），它的目的在于使干部更关心企业，推动企业能真正地在经济上很好地运转。

计划民主化的倾向有几种表现，如出现工人的“个人计划”，他们保证在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主动改进生产工具、提高效率；在改进计划的时候，这种倾向还表现在工人对使经济更为合理化作出贡献的才干。

其他的例子还有，如在一些车间里，把工人的报酬和节约原料的多少结合起来考虑，其效果就很好。所谓“超产”运动曾经在全国广泛开展。某些产业系统或某些企业，在自愿超额完成上级规定的计划数字的基础上，还提出一些相应的组织措施（其中特别是原料和资金方面的协调供应）。

对如何实现管理民主化方面，人们进行了切实的试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建筑业和其它行业中，出现了某种称为兹洛宾包工队^①的自治企业。它们在招聘工人、组织生产、使用劳动工具、执行纪律、付给报酬等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从这方面来讲，在事先规定的生产定额范围内，由于生产效率高而带来的好处，可以使工人受益。与其他企业相比，这类企业生产效率更高。

总的来说，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个人作用上升的倾向。

众所周知，苏联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提倡向打破生产纪录的工人学习。现在则强调，每个人的劳动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得到合理的承认。劳动的报酬形式应该越来越考虑每个人不同的工种、效果和效率。

过去那些简单化的观点本来是想在生产不断社会化的基础上，让个人的劳动融化在整体劳动之中，成为其中默默无闻的一小部分，所以，那种突出个人劳动的思想与上述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但事实上，提高对个人贡献的承认却又是劳动社会化的一种进步。

此外，要求提高销售的产品质量，是广大群众的愿望，应

^① 苏联某兹洛宾包工队发明的工作方法，以此队名命名。其方法是，由包工队按经济核算制同上级单位签订合同，在保质保量，节约和提前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把工程规定的造价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额做为奖金发给工人，既鼓励了工人的积极性，又降低了成本。此方法被推广。

该予以满足，而产品质量低劣的现象也已愈来愈使社会不能容忍。

社会文化设施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不适用，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这些设施利用率很低，不能吸引省内工业中心的劳动者。这些中心往往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劳动者大量涌向已经人满为患的大城市。在建立社会文化设施时所采取的政策不是从日益增长的居民的需求来考虑，而是依据对生产投资的预测，因而造成这种不良后果。目前，国家正在调整公共费用的开支。问题是要减少那些过于集中的产品分配点，以便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改善劳动者的境况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解决劳动和需要、劳动和产品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些迫切的需要

所有这些改革的尝试，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包括有民主的内容。

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就是要使所有有关部门都能更有效地运转，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这些改革同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用国家的资金来帮助私人垄断资本去追逐利润，采取欺小扶大的歧视政策，是明显对立的。所以，改革的性质本身确定：改革是在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范围内进行的。

这些改革，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目的都是减少或消除官僚主义，使管理和计划化更加精简有效，从而使它们更易于被劳动者接受。

如果仔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措施和尝试极其雄辩

地说明了苏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达到的水平，也证明了苏联的未来充满了潜力。它们还反映了一系列社会历史问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如何接近的问题，推广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的问题，生产发展如何与社会需要相结合的问题，克服商品交换所产生的矛盾的问题，等等。

障碍是如何出现的？

上述措施并非象人们有时风闻的那样，只是一纸空文，它们是付诸实行了的。只不过执行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有的是完全付诸实现，有的则只在进行试点。

然而，试验说明，实际情况的变化同人们预期要达到的要求，距离很大。虽然那些最糟糕的行政弊病有所克服（如减少了领导干部中副手的人数，更多任用技术负责人），但是原本打算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依然如故。不仅如此，随着国家的发展，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往往是采取措施，不见效果，或贯彻不力，或同样的问题在另一种形式下重复出现，“在基层中进行的运动”遇到了障碍和实际的矛盾。

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可帮助我们澄清问题。

实际上，改革的尝试从一开始起，就有局限性，而且存在互相矛盾之处。鉴于这种尝试往往只是单方面的主观愿望，所以，遇到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就无法加以克服。

把这些半途而废的现象归结为一种不可克制的官僚主义的狂热，这是错误的，也是完全讲不通的。下面我们就要解释，事物的发展是如何遇到具体障碍的。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已经在建筑业中显示出良好效果的兹洛宾包工队，在一些地方得到了深入推广。为了保证工程的各个阶段都能协调一致地进行，兹洛宾包工队的流水作业线的确在逐步形成中。可是，不久，就出现了经济领域中其他环节跟不上来的现象，如材料的交货、供应以及工程配套等等。独立的包工队的利益立即同生产的其他环节的利益发生了矛盾。于是，独立的加工队的数量下降了。一方面，这些工作队开始了工作，又遇到了障碍，另一方面，它们的地位确定后，国家对它们的活动加强了监督，并通过企业领导任命负责人（不是经过选举）。包工队的职权纯属对内，它们的外部活动受到限制。

实际上，劳动者的主动权始终禁锢在“社会主义竞赛”的结构之内，不允许管理体制向民主的方向发展。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经济结构改革的例子，关于实行“谢基诺”^①管理方法的情况。

这种管理方法的内容是鼓励在某些企业中裁减人员，然后将部分工人调离工厂后节省下来的一部分工资，以各种奖金的形式发给留在厂里的人员。

毫无异议，这种方法若是在法国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中实行，一定会激起工人的愤怒，因为离厂人员的前途只能是失业。但在苏联则显然不是这种情况，调离的工人能另行安排工作。

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措施有其民主进步的一面：工人会对劳动组织的变化采取更密切合作的态度，也会从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得到实惠，从而增加他们对人员流动的控制权。

^① “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为苏联某先进企业。该企业创造出一种工作方法，被称为“谢基诺”管理方法，即采用一人兼顾几个工种的工作，用较少人员完成较多的工作，把裁减人员省下的工资的一部分以奖金形式发给留厂人员，以提高生产效率。

不过，这个措施从一开始起就是不彻底的。

由于它是在企业现有的范围内执行的，所以它只是解放了劳动力，而没有解放生产资料；留厂工人要开动更多的机器，增加其劳动强度，而不是提高生产率。离厂工人——他们的工作自然会得到安排——同时又对生产资料提出新的要求；当然又构成了对需求的压力。

留厂工人不能全部享受某一个生产项目所节省下来的工资；事物的进程规定了，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慢。因此，把节省下来的工资以奖金形式发给工人的做法，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相比之下，工人们更为随时可能改行而感到惴惴不安。

这种方法引进后试验了好几年。最终它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企业工人并不能从中受益。

节省下来的工资并未全部付给工人，因为一部分被用作购买不足原材料的费用了。

尤其是因为，苏联经济增长依靠的是企业不断地增加购买量，它和节省工资是对立的。企业最关心的是增加某生产资料，得到足够的工资总额和足够的工人来对付国家下达的不断提高的生产指标。企业并不执意要解放劳动力和削减工资总额。这种后退似乎是一种发展生产的障碍。但是，上述方法本身也不能真正提高生产。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为这样一个既不彻底，又注定要碰壁的方法进行试验呢？因为，一方面感到有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如果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则要求同经济、技术改革有关的全体劳动者一起来进行非常密切的协作。这就要求重新考虑管理的标准以及当前企业和国家所起的作用、扩大工人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各个方面，尤其是全体工人本身，是否已经作好准备去积极地负责进行这样的改革？人们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苏联工人“抵制进步”，而是社会结构要排斥这些不够严密，不足有成效的措施。

企业生产了可以出售的产品，就要将它们千方百计地销售出去。这样使许多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同时，企业也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尽可能多的收入；它们宁肯不顾顾客和消费品在供应上的需求，只生产赚钱的产品，不顾计划乃至合同，任意选择对企业有利和企业所熟悉的顾客。这样，“生意经”上的考虑就同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冲突。

企业之所以会这样去追求眼前的利益，增加它的收入，正是因为这个利益是同工人的劳动和利益不发生联系的。我们可以看到，苏联企业还追求一种与工人的利害不相干的货币方面的好处；而这正是追求利润的动力。其结果是制造了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质量低劣、供应不足。

曾经试图用每完成一定数量的利润，或提高利润率，就发放奖金的办法，去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但这个措施不能避免矛盾（特别是同工人的报酬会发生矛盾），也没有象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管理。

原因是苏联的企业不追求利润和资本的利率，它们关心的首先是增加它们的活动资金，即增加它们的费用，主要包括工资的费用，而工资的费用甚至还少于物质资料的费用。

虽然苏联企业只生产最赚钱的产品，但它们又不将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全部投放出去，也不充分扩大企业的生产资料。这样，企业就能永远维持顾客对产品和设备的需求，使自己在—一个密封的弧圈中不断旋转。

因此,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营业额的“增长”始终是企业行政领导追求的目标。原因是什么呢?这同企业本身的地位、所有制的类型以及社会关系有联系,而不是因为官僚主义思想作祟。

再举一个例子。简化行政手续的确可以避免官僚主义复杂性的弊病,但是,手续一经简化,由计划经济集中起来的需求则会对大企业施加更为直接的压力。从而使计划规定的产品的数量指标成为所有企业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的首要任务。这种需求紧迫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使政府内某些十分注意按时完成任务的部,加强了对企业生产成绩的监督,甚至于发展到天天听取这些企业的工作汇报。

目前的效率下降

采取上述措施就说明苏联经济迫切需要有新的变化和发展。同时表明,这些措施还不能针对苏联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产生广泛的作用。事实是,苏联的经济状况没有达到预期的改善。

尽管苏联的生产机构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企业的集中程度也有了提高,与技术进步的联系也有了改善,行政机构也确实得到了精简,但是总的生产效率却在不断地下降。

主要应该看到,经济效率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这反映在,与生产资金的支出相比,国民收入的总额减少了。近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

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供应仍有困难,有时因为材料和生产资料的长期积压,工人的就业不充分,困难就更加严重。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生产和建设项目半途而废的现象屡见不鲜。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倾向始终存在,价格混乱的现象也今

直未能纠正。

增加生产是企业日常管理中最重要的一项要求。但是现在，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生产的速度明显减弱。

在生产结构中，不平衡现象始终存在。特别严重的是，尽管国家已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但许多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仍跟不上整个经济的增长。

结果人们就看到一种倾向，在最近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速度放慢了。

但是不能认为苏联当前这些令人担忧的倾向是实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进行深刻的分析，这一点是不难说明的。

国家主义从何而来？

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摆脱了资本家的先进的工业社会中，是什么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给条件较优越的社会发展设下这种障碍呢？

有一段时期，继加尔勃拉脱^①和戴高乐关于人已机械化的演说之后，那些被《费加罗报》和《新观察》捧出来的时髦的理论家向我们反复地唠叨，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破坏民主，并创造技术优先论的是大批的生产。

但是后来，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思想，真正的自治思想在工人阶级和领工资劳动者的广大部门中，逐步深入人心。尽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危机，要求经济民主的呼声还是得到了

^① J·K·加尔勃拉脱，美国经济学家。

普遍的响应。因此，必须找到别的办法。目前，人们指责国家，把这个创世纪的国家说成是一切罪恶之源，而且认为，劳动的过分专业化，生产者和指挥生产者之间的鸿沟，好大喜功，生产率至上的倾向，官僚化和社会上的保守主义等都是国家的过错。

用这样的观点去估计国家的作用是一种误解。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任何细心的观察家都可以根据在苏联观察到的事实证明这一点。

不错，垄断的法国的国家是使社会生活向无法容忍的官僚化发展的工具。所以，还必须加以揭露，但不能把责任推到办公室里的职员的身上，而要追究推行政策的实际负责人。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化的真正原因显然是因为现政权执行垄断政策，为垄断资本追逐利润。我们认为，在国家和雇主们勾结下所产生的制度，一般来说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在苏联社会中，没有任何魔力可以赋予国家以非凡的权力。在这方面，国家只是贯彻政策的途径和使其得到实施的工具，而政策的基础则是生产。国家主义的根源不在国家本身。国家扎根于社会关系之中。如果我们的批评不仅针对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的、行政的、专横的形式，而且也针对那些同苏联社会保守势力有联系的官僚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就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系统了。通过批评，我们的头脑可以得到必要的武装。这样，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不是无休无止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而是去及时地拔除不管在思想上表现为何种形式的真正的官僚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根子。

苏维埃国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权威性的作用，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它的职责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处理苏联经济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那些生产集中的、又竭力想发展的大企业提出来的，仲裁起来颇为麻烦。国家本身面临着一系列勉为其难的事情，所以它只能采取不彻底的办法，解决其中一部分问题。在调拨原料或设备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对于价格、工资政策、土地整治问题的仲裁，也是这样。

在苏联政府机构中，政府的各部起着枢纽作用，一方面是来自企业的各种要求——这些企业从属于有关的某个部——而这些需要又使那些企业“发展起来”，使它们能在部一级互相较量；另一方面是由政府各级机构考虑，由国家委员会这样一些大的中央行政机构制定的各种措施。鉴于政府各部对需求起一种缓冲、调和的作用，故它们犹如一块屏障。

冲突主要是在政府机构内部解决，必要时，政治部门也可出面，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进行日常管理。

在制定计划的初期，企业求助于科学鉴定以避免技术上出现差错，后来，科学鉴定的功能渐渐变了，转而赋予行政手段解决困难的任务。

计划的作用，尤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首先是克服生产中出现的比例失调。尽管采取许多措施，但是对国家委员会来说，首要的问题还是如何满足资源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如何满足增加资源、增加生产的要求。实际上“集中计划化”面临的局面是先要解决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今后的问题。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强调“把生产搞得比过去好”作为企业的任务（所谓完成“超过现有水平”的计划）。

其他重要的国家工具，国家预算机构和银行系统也以各自的方式，去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

发展银行系统原则上可以节省向企业提供的预算基金，这些基金目前尚占企业投资基金的三分之一。借贷在原则上也能扩大企业自主活动的余地以及计划外的投资基金。

但是，由于目前的结构未变，所以企业扩大了自主投资的活动余地之后，由于它们热衷于扩大自身的能力，进一步分散力量和资金，从而影响效率，增加了原料供应上的新困难。为此，决定把很大一部分预算统一集中在国家手中。

在究竟是由银行支付投资还是由预算支付投资之间犹豫不决，实质上反映在扩大企业或一批企业的活动余地和加紧控制这两者之间的犹豫不决——前一种作法便于监督，但容易分散资金；后一种作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刹住任意分散资金的歪风，但同时会造成过分集中，出现比例失调的老问题。

因而，这远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行政权力集中还是权力下放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国家活动和企业活动中出现的整个矛盾。

在苏联的企业中，厂长是国家根据他们的能力、担任领导工作的资历（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政府内）任命的，只有厂长有最后决定权。

他们的权力之所以大，不仅因为他们在企业内享有特权，还因为他们掌握强大的手段，足以使各级行政机构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的活动目的很清楚，他们所领导的企业除了通过增加生产、增加货币收入，从而增加购买手段，以便长期存在下去，发展起来，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企业的压力推动国家的行动，生产中的交换风气也推动整个经济体制向增加生产资源，向积累生产资料发展。

所以，企业本身对滋长官僚主义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发展

类型首先限制了国营企业的自主权。

官僚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根源不在行政机构内部，也不在权力代表机构内部——它们只是起接力的作用。官僚主义的根源主要在生产体制之中。而这个体制自然取决于劳动者在这个体制中占据什么地位。

究竟是谁占有？

在我们这里有人说：苏联有阶级，有剥削阶级，也有被剥削阶级，所以有阶级斗争！由此出发，他们又说：“改革没有用。”这也就等于说：“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

根据这些简单化的论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解决苏联的问题，只要象过去驱逐资本家那样，把官僚主义者赶走就行了。这种看法未免离开了问题的症结吧。

现在来谈谈我们的看法。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苏联的经济问题。我们是否发现在苏联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呢？没有。相反：一，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的状况已经不容置疑。劳动者因此得到了工作的权利。二，生产资料不能私人买卖、私人经营。企业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无故关闭……既不能组织银行集团，也不能搞货币、金融和地产投机，等等。

肯定不存在有产阶级。因而，也没有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阶级。

但是，我们发现，社会财富通过以下形式被冻结起来了，收效甚微的生产资料的积累，过于昂贵的、利用率很低的机器，卖不出去的库存品，无用的商品以及中途下马的工程……

还有，工人创造的一部分财富被预先扣除和糟蹋，从而遭到剥夺。他们至今仍然处于出卖劳动力的地位。但有一点我们大家都可以肯定：造成苏联这种“雇佣现象”的，不是国家、官僚主义，也不是过细的劳动分工，或那些头头们，而是经济交换制度。

可是，究竟苏联工人向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呢？如果不是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又是谁占有呢？

事物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所有制还是公有制，是属于“全民所有”，并不属于“任何个人”（这在过去许多社会中也存在过），而国家的各级机构负责管理这些资料^①。

这一国有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还不是建立在管理中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自治和合作基础上的“集体”所有制。

这种所有制虽在形式上比较先进，但也遇到了长期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四处产生的、具有共同体类型的、不可分割的集体所有制所造成的困难。

管理这样一些不可分的整体使个人对劳动和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冷漠感。所以，在这个不可分的所有制范围内，苏联的企业虽各有相异，但它们面临的问题最终还是相同的。劳动者不是国家发展的活跃的真正主人翁。

把劳动者在经济方面默默无闻的情况继续在生产中维持下去的这种所有制，与社会的真实需要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它在生产率的发展中造成了混乱，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周期性

^① 原注：不管某些苏联经济学家怎样看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苏联国家没有真正掌握全部生产资料，它只是管理国家的财产。如果它真正掌握全部生产资料，那它就可以利用国家资本，剥削工人来填满国库。苏联经常遇到财政困难这一事实本身，就驳斥了苏联经济学家的上述见解。

的商品短缺和生产资料积压。它埋没了人的贡献，助长了生产上的浪费。

社会主义所有制还会发生变化

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企业国有化了，所有制改变了，生产提高了，可是，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因此说明，经济中的变革不够。

的确，在整个社会变革中，经济部分的内容远远不够充实，不能就此认为可以结束了。其实，经济变革和政治、文化变革是互为联系的，如果硬要将三者分开必然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但同时最好防止作下述两种带有结论性的解释：

——所有制变了，而且变化相当大，足以使其他方面（如人，机构等）也发生相应变化。

——所有制变了，但其他方面丝毫未变，或几乎未变。看其变否主要根据文化和机构这个“第二灵魂”而言。

上述两种对事物的看法完全是断章取义的。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的变化尚未完结。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制还不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所有制。将来，必须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规定，也为苏联的历史所规定。

这样是否意味着，只要对（经济）所有制改造工作补上一课就“足以”使万事皆顺了呢？这样做是不是经济主义呢？否。

我们的意思是，仅仅“增加民主”，“象对待村社和社会团体一样，给国营企业以同样多的民主权利”还不足以形成一个享有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改变社会关系。

发展不均等是社会落后的根源

在国有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范围内，企业的发展在经济上是默默无闻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发展不完全相同，这种发展容易使工人之间的眼前利益发生矛盾。

为了扩大技术力量而进行的投资常常不能如愿，间接地增加了许多技术性不强和可有可无的任务。这样，虽然花了同样多的钱，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却千差万别。

面对这种情况，劳动者必须保持和捍卫他们目前的地位，尽管并不容易。因为有了这个地位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如职业稳定、劳动时间和劳动节奏有一定限度等），也有希望通过民主化改善他们的境况。当然对于民主化在当前情况下究竟有什么好处，在不同情况下，会有很不一致的看法。

例如，技术水平最高的工人完全有理由要求按照他们出色的劳动成绩给予他们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优惠条件。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技术性较差的部门中，如建筑、运输、装卸，工人要求企业不随意减少他们的劳动报酬——不管这种劳动的技术要求如何低——因为他们的劳动很艰苦，在近期内又没有很大改变的希望。工人们的要求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很大一部分也得到了满足。因为技术落后的责任不能推到工人头上，何况目前他们的劳动还是需要的。

消费品是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但在许多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中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工资级别却很低，文化和卫生工作者亦然如此。所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未能相应地得到保障。这不仅损害了熟练工人而且也损害了人民的真正利益。

工人被剥夺了真正负责管理的权利，他们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而要使他们的共同利益得到重视则更为困难。

许多工人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他们无法起作用的外部现象，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成为法定不变的成果。

所以，目前的情况使他们看到，新的民主演变是危险的，它会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而目前形势恰好说明，民主演变是必要的，它可以为社会主义在社会成就方面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这样他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客观上存在包括先进工人在内的强大力量，促使人们维持企业和国家的现行的管理制度。

现在的问题是要使工人们组织和团结起来，共同掌握和管理生产；建立先进的管理方法，节约生产的物质手段，如机器、原料等。

如果苏联能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它就将走上当代社会进步的康庄大道。

苏联的例子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行使工人成为主要生产和交换资料的共同主人和管理者的自治方面（即非国家性的自治组织）是落后的，而这种落后状态是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主要障碍。反之，向自治方面迈进的每一步都能使社会主义得到巨大的进展。这就是苏联经济成功和失败的主要经验教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即使不同，但它们的经验也都证实了这一观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需要进
行斗争以争取更多的社会主义

政治上的真正困难是如何把工人动员起来，争取社会主义

社会协调一致地朝更民主的方向发展。工人的社会情况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对是否能朝民主方向发展的看法，自然也不相同。

苏联的经验证实了法国民主主义者在斗争中得到的教训，民主不是全体工人的自发要求。对民主的需要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民主是靠争取赢得的，并将不断发展。

苏联社会中包含有先锋力量，首先是先进的工人阶级，但在人民中也有社会、经济和思想方面落后的力量。

这并不意味着，情况就此一成不变，也不可说民主演变的道路前景暗淡。相反，我们发现存在强大的先进的社会力量，它们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使苏联社会取得新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并朝社会主义民主方向演进。

我们曾经指出，在苏联经济领域内，人们对民主化的要求极为深刻，其目的就是要说明，这种对民主化的要求反映了先进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化已日趋成熟。

所以，尽管经济上有严重困难，民主受到侵犯，但我们还是认为，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潜力以及社会进步的希望是巨大的。坚持认为苏联社会还不能发扬民主，难道不是低估苏联取得的真正成就和它的能力吗？难道不是觉得苏联要得到必要的进步更加困难了吗？

苏联的例子证实了法国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取得的经验，在生产进入现代化阶段后，社会上可能产生一股阻力，反对将各种类型的工人集中在一起。这种情况，加上经济上的根源，会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造困难。过时的所有制形式加剧了发展中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也是产生困难的因素之一。但是只要先进工人在政治上有团结广大工人进行必要改革的权利和

力量，这些阻力是可以克服的。

因此，指出经济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不是低估政治的作用；相反，当这些改革在政治上真正能动员全体工人时，经济改革才能真正得到全面实现。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对苏联经验的另一个教训就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一方面，在民主经济中，先锋党的作用不完全是进行具体管理和行政干预。同时，为了不断地进行必要的变革，使经济行动的主要社会内容更好地符合工人的社会利益和民主利益，通过日常的政治行动来团结人民是很重要的。

目前社会主义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哪一阶段？社会主义是已经诞生了，还是正在诞生？社会主义是否已经接近成熟了？苏联是已成形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

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七年以后，苏联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肯定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否认这一点是徒劳的，也是有害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加以说明。

驱逐资产阶级占有者，建立新的公有制形式，这都不是抽象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具体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生变化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和结构，以及当时社会力量所确定的政治目标。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最初几年的革命变化，开辟了社会、政治改革的道路。在这些改革中，也许还有些重要的内容至今尚

未实现。苏联社会演进的特点之一是：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个社会落后了，它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关于这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尽管苏联经历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它仍然要到五十年代中期才恢复到一九一三年的（平均）生活水平。

难道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在从事剥削的大资产阶级失去政权和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之间的那一段时间，称作“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互为重叠，同时并存，它们混合在一起，在互相渗透和抵触中互为影响？而人们在这个阶段的任务是对付那些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引起种种障碍的资本主义的痕迹、残余或现象？

如果我们把两项不同的历史任务混为一谈，实际上就会造成严重的混乱。一项任务是：通过团结人民力量，夺取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政治基础；从而为在政治上改造旧政权，把这个政权从剥削阶级手中解脱出来而斗争。另一项任务是：为工人本身的团结而斗争，以便让有组织的工人掌握生产和交换资料，去改造社会关系。

这两项历史任务显然是不同的。苏联和别的国家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那种认为第二项任务不过就是第一项任务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这样，他们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在一个已经没有资本家的现有社会范围内，劳动者们自身的团结。

对于以下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事物的两重性我们无法理解：一方面，苏联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历史，想在苏联寻找阶级敌人的残余来作为大肆打击的对象，那是在费心机的，也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自主、自觉的行动和他们的团结迟迟未能实现，可能会使制度的进步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在苏联和别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有发展前途的。

没有也不可能有通往社会主义的平坦大道，而通过简单地实现首批社会主义缔造者的理想也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事业。每个国家的人民有责任根据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采取独立的行动。

外部和内部条件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前的世界形势是否会严重影响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

谁也不会忘记，纳粹德国的侵略使苏联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我们也不会忘记冷战使人们付出的代价。

在我们这个时代，显然，军队和军费的开支会加重一个国家的负担，分散精力，但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

的确，苏联也面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它同帝国主义国家有直接的贸易来往（至于数量，那对苏联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也因为国际价格的波动，市场的混乱，许多不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尤其是货币和金融体制的危机，以及这场危机对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但是，一系列由于危机而产生的现象也反映了与社会主义相比，帝国主义的地位在下降。因为，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得到了加强。此外，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当成功地抵制了帝国主义从经济和金融方面侵犯它们的利益，限制了赤字和债务。所以，我们不能把造成主要困难的原因归咎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

与外部发生关系（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它们无时不在伺机侵犯）对所造成的困难部分地转变成为国内的不利条件。在投资方面，总的效率本来就不高，又加上进口设备方面遭到了挫折（如“成套设备”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大量购买农产品或化学制品在财政方面造成的弊病，同国内总的商品供应困难碰到了一块。

这样，国内发展的落后或多或少带来了和外部打交道中的某些困难。

苏联与帝国主义集团相反，进口商品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搞投机，也不是为了再出口，而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它对外部的依附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使国际垄断集团感到很不痛快。同时，苏联也未能免受危机的影响，这就证实，真正的独立是持久斗争的目标。

法国共产党的分析同那些反动的谣言毫无共同之处，那些谣言堕落到只知编造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什么反对人浮于事只是小人之举，反对官僚主义只是大官僚们蛊惑人心的宣传，工人们在生产中有犯罪感，断定法国人民在面目狰狞的苏联面前只有屈从的义务，等等。

我们不能把苏联的困难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混为一谈。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全世界各国愈来愈迫切地要求社会进步。反映这种要求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它们（无论是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工人阶级（在不同背景下）的实践是产生这种联系的根源。工人阶级要加强它的团结，把工人管理社

会生产资料作为它未来的远景，这一切都是以全世界工人共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

苏联的经验和法国各界人士的分析

我们的看法可能会使人觉得相当武断，因为我们在本书中所阐明的对苏联经济的观点，虽然大部分是以在苏联发生的事实和在苏联看到的分析为依据的，其中甚至包括在辩论、讨论、批评和许多评论中所听到的内容，但是却和许多苏联经济学家的观点并不吻合。

随着经济计划在苏联这种特殊条件下的不断实施，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变成了苏联一些专家和负责人的经济思想。

苏联在取得它特殊的历史经验的同时，自然要传播它那些独特的思想方法。可是，法国斗争的教训并未说明，我们必须接受别人那些不适合我们自己的实践的劝告和观点。这里涉及一系列概念，我们只能简略地列举一下。

例如，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混为一谈（根据是，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这种看法好象不是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概念中引出来的。还有，把国家作为管理一切的“主宰”、采取重要决定的唯一中心，这种看法似乎并没有推动当代正在逐渐形成的“人民自治管理”的思想。总的来说，由于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原来那种把社会主义的目标设计为一项单一的巨大企业，只有一个单一的躯壳和单一的前途的思想倾向，遭到了当前另一种倾向的反对，这种倾向赞成多样化，赞成互为补充和在一切活动中贯彻自愿参加的原则。

强调计划经济（秩序和理智的源泉）和市场经济（无政府主义和自发现象以及由此产生一切困难的源泉）之间存在根本对立的想法尚未被实践证实。

某些专家竟然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事物，似乎搞好管理和计划经济只有一个办法，“要么靠计划，要么靠市场”。切不能用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去看待事物。

事实上，单靠计划根本不可能解决主要困难。计划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只是一种借以缓和和拖延矛盾的权宜之计。行政管理工具一向是救助一种日益过时的经济制度的手段。与人们通常的许多看法相反，苏联的所谓“统一计划”部分，以及这种“统一计划”思想所具有的分配性质，是苏联“商品”关系的延长和得以生存下去的手段。由这些关系所形成的整个制度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前发展。

不能认为，形成了“基本规律”，有了一整套论点以后，如“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规律，或“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动力等问题作出回答。

有些实际的概念在苏联是流行已久的，如企业中的一长制（这是内战时就作出的决定）或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思想，但是我们看不出这些概念到底有些什么科学根据。

以苏联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总结法国自己的斗争经验，从中获得必要的思想工具，来及时分清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战斗中的各个阶段，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无论在哪里，一切事实都已证明，理论上的幻想，抽象的概念总是同面对现实问题时政治上的消极同时产生的。相反，明智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是一项先进行动的最有力的支持着。

第五章 政治生活面面观

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

亚历山大·阿德勒（简称：亚·阿）

弗朗西斯·科恩（简称：弗·科）

莫里斯·德卡约（简称：莫·德）

克劳德·弗里乌（简称：克·弗）

列昂·罗贝尔（简称：列·罗）^①

克·弗：对苏联的政治生活进行探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一方面，某些活动、某些侧面及其对政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事等方面的影响，都大有问题可研究。

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以及其他共产党之间最明显、最严重的分歧就是在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观念问题。

列·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有哪些方面看来是同我们的原则不一致的。所谓原则，我是指自由和民主生活的观念，以及象在苏联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组织形式。

克·弗：当我们谈到原则时，必须明确，我们的讨论不是要拿一种模式去反对另一种模式。我们不知道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究竟哪种政治生活方式最理想。可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其深刻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

^① 参加座谈会这五人都是本书作者，介绍见本书前面“作者说明”中的译注。

是通过苏联在经济上取得成就而得出来的。它趋向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参加企业管理、支配事物的权利，它还趋向于保证最大限度的自由，而且是多样化的、具体的自由。这些要在目前的政治生活和公民所处的环境下实现。

弗·科：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把所看到的事实摆一摆，然后再按照我们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社会情况，发表我们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看法。

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尽量不使讨论停留在光摆事实的水平上，而是对情况进行一些分析，作些解释，探讨今后的前途，不满足于列举事实，而要立足于历史和全局的观点。

列·罗：如果我们来研究一下究竟哪些确实是我们在考虑的问题，那我们大概首先就会指出，党政不分是个问题（尽管表面上是多元政治）。这是一种国家和政治上的机能失效现象。从原则上讲，现存的国家机构应该可以让全体人民积极参加政策的制订。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国家机构不允许群众，或很少允许群众对政治进行干预和改革。事实上，群众组织无非是转达外来思想的工具而已。

一 党 制

弗·科：这个问题的中心显然是清一色的问题。换句话说，由于消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出现了某种社会的一致性，因而，整个政治、文化、思想生活应该形成一个整体；至少，应该以统一的方式，在单一的场所（在此选拔和输出人才）来考虑这种生活。

与这种思想相适应的体制就是一党制。这种一党制在整个

苏联社会机体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它涉及的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恰恰向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政治问题。

列·罗：在苏联，党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党所具有的这种职能，并没有被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公认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远非如此。大家更普遍地认为，这种情况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造成的，既有其积极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弊病。

克·弗：在苏联，人们喜欢对你作这样的解释：实行一党制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其他别的党，倒不是因为对一党制有什么先入之见。不过，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有一党制的思想。

亚·阿：采纳一党制是自觉的、长远的选择，尤其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立场是很有分寸的。革命之前，列宁曾有过这样的观点，即：民粹主义思想。体现着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也是产生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的障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找不到适当的表现形式——一个真正的党——所以这种思想转向了工人运动。

此外，一九一七年前后，布尔什维克就知道善于用微妙的方式去分析资产阶级内部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这就说明，斯大林掌权后开始推行的那一套政党是阶级的代名词，把党看成阶级的党的理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强制人们所接受。

众所周知，从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诞生的共产党，在它的各级组织中都吸收过许多曾经多年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党人：如左翼孟什维克，最著名的有托洛茨基，但他还不是唯一的代表人物，革命的工会活动分子，如罗佑夫斯基，他是红

色工会国际的领袖，甚至还有象斯克雷尼克那样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中亚细亚，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左翼和在亚美尼亚，享切格的革命者都为党输送了第一批干部。一直到一九二五至二六年，这些来自各方面的人才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不健康的特征，相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力量。

总之，那些非共产党人虽然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经常同党发生思想和政治上的分歧，但他们都参加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至少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直如此。他们的思想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讨论的，所以对经济决策不无影响。

克·弗：党之所以拥有某种最高权力，是同它在苏联这样一个缺乏任何民主传统的国家中进行革命的最初年代里所起的作用有联系。而这一切又都发生在构成民众社会的所有有机部分统统彻底解体的时候。

党不得不把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做是为了维持这些方面，让它们生存下去，也是使它们能闯出一条新路子。这种权力（军事、经济、文化、伦理，以至卫生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堆积于一身，在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在短时期内是大有裨益的，但是要不了多久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权力的堆积首先是调动了少数优秀人物的积极性，他们准备去完成最艰难的任务，同时这些人又沉醉于自己所得到的高官显位。他们对集体利益的忠诚，他们的工作能力常常在使这么大一个国家摆脱混乱局面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情况只会助长严格的禁欲主义和宗教式的狂热，而且使人有一种“骑士社会的秩序”之感。

由于党是在集权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党就不可避免地吸引

了所有那些把党看成是取得权力必不可少的手段的人。

列·罗：这为专横和恐怖的镇压浪潮创造了不可小看的条件。

克·弗：由于党的这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职能长期保持不变，所以它影响了管理机构和民众社会在形势恢复正常后真正起到它们特殊和独立的作用；如经济、国家、工会和群众组织等，它们的政治生活始终虚有其名。

列·罗：这也就是为什么党能够在长期内把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党的忠实信徒和野心家）撮合在一起的原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党逐渐成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这样一来，党成为唯一的真正的政治场所，在那里，形形色色的立场和思想汇合在一起而又互不了解其真实面目。

另外，由于党始终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所以实用主义盛行。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刻讨论的机会极少，即使有，实际上也从不将问题讨论个水落石出。

克·弗：一党制也许是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解决苏联的民主问题肯定不是立即把党改造成一个社会民主党。然而现实情况是，单一党的存在已经发展到它使用了一些威胁到了苏联法制的执政手段。

人们的印象是，在连续不断的几个时代里，有一个超越法制之上的机构，它也许会成为历史的终结，它就是党。这种哲学使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正确思想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几乎把党神化了。

列·罗：由于想不出其他可供使用的机构，所以有时人们只好靠某些虚构来生活。例如，虚构什么党内所有人的观点绝对一致。我们都很清楚，在一个社会里，不可能有这类事情；

不可能没有思想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在哪里进行的呢？

克·弗：总而言之可以说，一切都是从一党制这个现实出发的。本来是可以有另一种做法：实行内部民主，为什么不能如此呢？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一时冲动，未加控制地强调一致、统一等。因此，人们可以说，多党制更适合于法国的国情。

换句话说，苏联的公式一方面当然有它的道理，也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它既有利也有弊，它给苏联的政治机构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矛盾能否定得了吗？

弗·科：现存政治结构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实行保密。每个人根据不同的等级可以接触不同的消息，级别越高掌握的消息越全。这些消息的来源各不相同，所以机密程度也就不同，它们分别称为绝密、机密、内部、公开等。这都足以证明人民与那些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人之间，缺乏充分的信任，也足以说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列·罗：在我们设想的民主政治中，人与人之间的通讯交往和互通情况至关重要。

克·弗：如果想把基本情况作一全面介绍，还必须着重说明人的工作条件，特别是从事脑力劳动、研究和创作的人员的工作条件问题。即使从传统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也说明这些工作目前正遭到严重的、不能容忍的损害。

列·罗：为了说明这一切，必须在解释的过程中，防止简单化地把那些头脑比较清醒、心地比较善良、消息比较灵通的

领导人同那些孤陋寡闻的群众进行直接对比。群众的政治态度、思想方法以及他们通常对问题的看法，可能成为我们所想象的充分的民主生活的障碍。

克·弗：其实，在掌权者和群众之间的思想非常一致。

群众对决策机构、经济机构（即阶级关系的机构）的承认是完全无条件的，从而致使各种权利、各种政策和政治讨论，由于缺少相应的机构和具体内容，而相当空洞。政策通过其本身的作用和集体的讨论将潜在的思想付诸行动，可是因为思想狭隘，政策的效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在一个时期中，文学正是在这种方式下被限制到只能对某种特定的政治前途表示赞成或反对。

莫·德：我觉得，可以用下述的方式去观察事物。

相当数量的机构筑成了十分先进，甚至极为彻底的象征代议制的民主大厦，这些机构是：通过全民投票和对议员行使罢免权形成的从上到下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工会组织，人民的监督机构，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文化网等。

可是，这幢徒有其名的大厦空空如也。我可以举例来加以说明。比如，直到目前为止，每当这些机构面临重大历史关头，或者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如当前所出现的困难），并看不出它们能有什么作为，它们无法为适当地改变现状起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目前这种发展形式所提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超出了这些代议制机构的活动范围，因而，往往使这些机构面对的是一系列既成的事实。

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利害冲突而产生的。代议制机构的性质明确地规定了它们不能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御

底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问题被推给行政机构——政府各部、国家各委员会等。它们在处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所谓行政协商只是使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吃亏，因为用这种办法解决问题时不照顾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还常常留个尾巴，以致为了使工作进行下去，必须付出一定的社会开支作为代价。

克·弗：上述政策有一定的哲学思想为依据。按照这种哲学思想，尽管利害的对抗不是阶级的对抗，但确实是存在的；这种哲学思想不承认这种利害的对抗已经达到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规模，而认为它们只是些偶发的事故。

这种否定内部矛盾的哲学认为，革命消除了社会整体中的冲突，从而也就消除了政治矛盾。因此，不再需要一般的机构和组织去对付和解决矛盾。

列·罗：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民就是受管辖的人。

克·弗：但是公民们往往接受这种制度，这不是消极心理，而是出自他们的信念。一些人相信，历史就是摆布他们的一架庞大机器。另一些人则真正相信，甚至坚信，经过革命，反映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困难阶段的矛盾已经烟消云散。

苏联老百姓有一种贪图“太平”的心理，他们在同我们谈话时，这一点表露得十分明显：“你们有点落后了，你们现在还搞什么辩论、党派，还说有什么矛盾，这些政治问题，在我们这里都已不存在了，这是我们的一大进步呀。”这些话听起来是怪舒服的。

了解苏联公民头脑里的这种人生哲学，对于掌握整个机制是重要的，因为这不单纯是个公民和政权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指导从上层领导到基层群众的行动的，正是那种认为一次革命就中止了历史发展的天真想法。

国家·党·阶级关系

弗·科：的确，苏联社会不是一个人民同政权直接发生关系的社会。

问题在于群众对政治介入到何种程度，以及这种介入需要何种思想和制度方面的条件，换句话说，社会矛盾在政治上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些矛盾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是存在的，它们影响着人的行为，然后又将这些行为全面或局部地上升为理论。

至此，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究竟有哪些阶级和社会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苏联的制度不单纯是为了贯彻某些原则或建立一个理想社会才形成的；它还要转动一部异常复杂的一直在运行的机器。可能在介绍那些成绩时，方式上不够辩证，似乎这些成绩具有永恒和普遍的价值。以前，有一种惯性的力量，即尽管那些措施和做法已经从动力变成了障碍，但由于人们不得不接受它们，所以一概变成了规则和规律，从此就万古不朽。

克·弗：实际上，我们提到的政治机制决非出自偶然，本身是不错的，也不可恶。这种政治机制所依据的是一套自我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派生出其他与此相关的理论。

莫·德：依我看，没有必要纠缠在人民和政权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上。如果要谈人民和政权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主要就是要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工人阶级内部的情况。

更确切地说，在人民内部有哪些思想和政治上的分歧？矛

盾的根源是什么？先锋队和其他群众相比，它依靠什么作为基础？一种政策、一个结构、一个运动，依靠什么样的客观倾向？

在苏联，为实现先锋队的目标而进行的战斗不可能是一场以消灭一个在经济、社会、政治上进行统治和压迫的阶级为目标的阶级斗争。这场战斗的目的是实现新型的人民之间的团结，形成新型的政治思想结构，总之，是在社会主义内部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阶段。

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在政治和历史上一劳永逸地万古不变了。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目前之所以给人以一成不变的印象，是由于受了某些相当简单化的教条的影响。我们发现的第一个教条是关于国家应为经济管理和政治行动的主体，国家是人民统一团结的表现；因为人民被看作是无法区分的集体，所以是清一色的，缺乏内部的交流。

让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国家是随着剥削社会的出现而诞生的，至今已有很长历史。它是一种用强制手段进行调节的工具。它模仿现存的社会，根据社会再生产的要求把公民分为听话和不听话的两种，并使社会为再生产付出代价。国家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在发挥它进行自身调节的能力时，具有一定限度的表现。

当我们说国家是注定要消亡时，就是说，社会必定要超越迄今为止它一直所依靠的用以进行调节的国家形式。在社会主义阶段，以及在将来的过渡社会形式中，国家注定要随着社会自我组织形式的发展和工人觉悟的提高而逐渐消亡。

政党的作用，特别是先锋党的作用不能与国家的作用同日而语。

党的真谛应该是和人民群众永远保持接触，反映群众中发

展着的深刻的社会运动,尤其要扩大这些运动的最积极的效果。如果它是一个真正的先锋党,它就会依靠社会上广大的阶层和集团,把它们作为共同利益和实行政治思想团结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克服矛盾的道路。

可是在苏联,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党融合在一起了。党所从事的活动带有国家性质。最上层的党的机构有权作出决定,这些决定演变成为义务,党的机构垄断了全国的干预权。与这些义务相适应的手段就是依靠对公民进行划分,把公民分成听话者和不听话者,由此就产生了强制。

在基层企业中,党的主要活动是,一旦在管理上出现困难,党就要向工人提供选择,要么克服困难进行改革,要么加倍努力,继续维持现存的制度和企业管理方法,以达到预定的指标。

列·罗:党的主要活动是鼓舞人们的干劲,去实现预定的目标。严格地讲,没有什么政治斗争,要说有的话,也只是为了说服人们去从事应该从事的工作,如此而已。

弗·科:当你问一个企业里的苏共党员(不要忘记每个企业都有党组织),党的目的和党的最重要的活动是什么时,你得到的总是同样的答复:生产。对此,你怎能不感到惊讶呢。

莫·德:生产几乎淹没了党,把党变成了一种手段。

克·弗:若是这样,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量的发展了。

弗·科:社会主义要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倒是确凿无疑的。在这一点上,具体的历史现实起着巨大的作用。于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发展,如果没有工业化,就将一事无成。工业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消费资料和国家所需的设备,也为了国际的需要,等等。工业化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这便又要求发展文化。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

所以，一方面想要一个工人阶级，而另一方面又几乎没有这个阶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的矛盾，必须加快速度，从广大的农民中发展出一个工人阶级来。

亚·阿：关于这方面，有一个重要情况需要注意：从产量上讲，苏联是首先也是唯一实现了本世纪，乃至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工业革命的国家。而且最主要的还在于，苏联所进行的工业革命不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那样引起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大规模的贫困化。

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掀起的强大的工业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工人阶级联合的最基本形式，使工人的死亡率猛然上升（尤其是在法国，从一八四零年至一八七零年，这一点非常突出）。但是，在苏联，即使是在最困难时期，情况也同过去所出现的截然相反。

不错，苏联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这一点绝对不能忽视。但是，一个国家依靠经过考验未被征服的工人阶级，成功地实现了它的工业化，这毕竟是个创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业化啊！它是一个全面的，触及所有部门的工业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以来，苏联已经完全消灭了失业，执行几个五年计划的结果，使名义工资不断提高。我知道，实际工资是多少受到点影响的。不过，十九世纪各国工业化的实例说明，那里的情况正相反，愈是处在大规模积累资本时期，名义工资愈是下降，而劳动后备军却趋于增加。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五年左右，即揭开了帝国主义时代序幕的大萧条时期，正是这样。因而，苏联的发展是一种新的类型。

问题在于，工人阶级能否起到与这一发展相适应的作用。对此可做如下初步回答：工人阶级的进步曾经给当代的人们留

下深刻印象，使许多西方人甚至一些非共产党人士对于苏联的进步和镇压也都采取了接受的态度。但是，这种进步的代价是，原先的阶级联盟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危机。而危机又为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实行警察镇压，实际上取消共产党领导作用准备了土壤。

弗·科：现实就是由这些迫切的问题、成就以及这些成就本身所产生的新矛盾所构成的。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情况，恐怕也就抓住了要害，就能逐年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有的已制定了法律，有的则已形成了思想和理论。

怀疑的根源

克·弗：事物发展到极端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些临时的任务渐渐变成了指导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指导国家和党之间微妙关系的理论基础。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革命的基础比较薄弱，也就是说，在革命赖以发展的政治格局中，代议制的政治生活不够成熟。

在历史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似乎总是互相衔接的。可是，在苏联，这两个革命不是衔接，而是交织在一起。

当时，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对一些民主机构所进行的批评是很中肯的。资产阶级民主生活不仅有它的局限性，而且是一种伪装，因此，人们——其中尤其是列宁——对它进行激烈的批评是完全合理的。

列·罗：当我观察苏联社会的起点时，有一件事始终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我所所谓的“非常状态”。

革命是在战争这样的悲剧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它有先天

的脆弱性。当时有一个思想萦绕在人们的脑际：要注意巴黎公社的教训。许多人头脑里想着这点，首先是列宁，马雅可夫斯基也想到了：坚持的时间要比巴黎公社长。

对当时出现的“公社”，必须以特殊的手段加以捍卫。因为人们设想，这些政权有可能被外来的干涉或内战所吞噬。这种非常措施对以后苏联社会的发展影响很深。六十年以后的政权机构和工作方法仍然受那个“非常状态”的影响，这就很成问题。

弗·科：在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中也出现过这种“非常状态”，如古巴、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国虽然形式不同，但实际上也是如此。在上述国家中，有些问题都是一样的，连解决问题或力图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一样，其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它们都出现过“非常状态”。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因为：这些革命都发生在那些从“理论”上讲（似乎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理论），不是最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的国家……而另一些从“理论”上讲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的国家又面临着我们目前所不幸经历着的困难！

克·弗：马克思之所以更期待在这些国家而不是在另一些国家出现革命的过程，是由于他认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重要的是使每个公民在历史上、政治上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历史的发展证明，事物并非那么简单，政治上的某种早熟会导致人们对变革的某种拘谨。而锁链倒在别的地方断裂了。

过去的俄国缺少实行民主的经验。当时只有一些很简单的政权机构的雏形。因而，即使依靠制宪会议或其他形式来实行政治民主，这样的民主也是极为有限和暧昧的。如果走向极为

温和的议会民主，那在当时的实际条件下将是一种倒退——这就是对政治非常时期的一种回答。

看到象布洛克^①那样的诗人，不但能理解对资产阶级议会道路的批判，而且能亲身激烈地去揭露这条道路（真叫人惊愕不已）。通过这种批判便看到了在当时的俄罗斯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列·罗，在保守的圈子内，特别是在文学界，这类人物还大有人在。比如，陀斯妥也夫斯基就曾经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进行过猛烈的抨击。

亚·阿，对制宪会议的揭露有许多是对的，但是我个人并不想把话说得太绝对。当时，肯定是犯了一些错误。以加米涅夫和托姆斯基为首的某些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赞成把制宪会议改成“全国会议”。也许将来人们会说，苏维埃政权的做法过于粗暴（其实，苏维埃政权本身也有过犹豫，因为制宪会议的选举本来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自己组织的），它在内战爆发前夕，忽略了联盟的某些可能性。

同样，占领格鲁吉亚以后，列宁赞成与当地的孟什维克寻求妥协，把他们争取到联合政府中来。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间昙花一现的远东共和国发生的问题也属于这种情况。我所以提出来，只是想说明，必然会有些历史发展的问题要作为悬案来看待……

克·弗，六十年以后，人们的印象是，这一切都变成对任何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固定的怀疑。不论是在权力圈子内还是在群众之中，这种怀疑到处被散布，因而形成了严重的障碍。

^① 布洛克（1880—1921），俄国诗人。

这种僵化的态度虽然不是任何时候都完全行得通，但至少在某些时期还是很流行的，它还产生了一种很错误的思想，即在象我们法国这样的社会，想要通过群众斗争发扬民主的作用，使民主在各个领域内成为一项总的政策，并在通过民主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占有它自己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苏联社会的内部障碍之一，因为出现这个障碍，就不可能使民主有任何向其它新的职能发展和成长的余地。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苏联难以理解在别的环境下，特别是其他国家共产党所从事的斗争。这些共产党从本国经验出发，赞赏群众斗争对发挥民主机构作用所起的巨大影响。过去由于人民和资产阶级力量悬殊，所以旧的民主机构都是些空架子。随着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些民主机构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前途。

亚·阿：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只要苏联党是在尚有一定程度的民主生活的多党制环境下进行斗争，它就完全支持关于各国可以走符合本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过这样的话）而且还提出广泛的阶级联盟的概念，反对西方（德国、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自发的宗派主义。只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新经济政策末期发生政治危机后，它才改变态度，开始鼓励西方共产党闭关自守。

今天，这些词汇自然又照搬不误了。

克·弗：不错，现在可以这样认为，真正要想解决问题也许只能是大力号召实行民主。

列·罗：不过，真要实行民主还得有必要的手段，特别是要有足够数量的经过培养能够贯彻民主的人。

克·弗：假设没有其他办法，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这种生

产主义的做法，或者叫经济主义的做法，实际上，它已经被绝对地、永久地树立为社会主义的总的哲学观了。

巨大的民主潜力

弗·科：这种做法的另一面是努力发展人民群众倡议的新的民主形式。即使这些形式到后来，特别是内战以后，有些僵化或消沉，但它们在革命时期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至今它们还一直存在。曾经作出很大努力来创建一系列旨在广泛推动工人积极性的机制、机构和思想方式。群众本身对于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如何不适应解决问题的需要有深切的体会。

列·罗：自从一九零五年以来，有一项出自群众的革新，那就是苏维埃。

苏维埃的中心思想是群众性的工人民主。这是一件已传遍全世界的大事，而且并非出于偶然。这场革命一发生，立即举世瞩目，或者说，引起了全球的注意，因为它使群众直接登上了历史舞台。

弗·科：在人民阵线时期，群众的游行队伍曾高呼：“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列·罗：因为那时人们知道，在苏维埃政治实践中出现了彻底的革新。这场革命发挥了巨大的民主潜力。

只是后来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加上人的因素的限制，某些选择终于使得民主未能自由地发挥作用，去改革经济和政治。

弗·科：社会主义竞赛作为号召人民发挥首创精神的一种形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且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莫·德：我认为这是发挥群众积极性的方法。

弗·科：我觉得社会主义竞赛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的确起了有效动员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把一些问题，如生产、管理，甚至于制定计划都交给大家，这样便同群众进行了接触。但同时，竞赛还有你刚才所说的“发挥”的一面，就是说，它把工人的积极性引导到国家和党的总目标方面去。这些情况就促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党和国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目的是如何确定的。

克·弗：可以说，在一项政治目标与群众之间，有一个起桥梁作用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根据任务的历史紧迫性，通过必要的动员来进行工作的。有时面临重大的任务，需要鼓舞斗志，国家就充分利用这种情况。但这种遇事就实行全国总动员的做法有其局限性，久而久之，这种机器不灵了，而且由于它拘泥于对某一任务进行就事论事的解释，必然冲淡了那些具有一定广度的、重要的政治计划以及社会问题。

对有关代议制民主的各种问题所以会采取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是有一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即认为，代议制民主已由其他已经存在并正在实行的某种制度以某种方式所代替。如果今天我们要设想未来的远景，也许我们可以从苏维埃各级领导机构，各种民间团体的职能今后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方面去考虑，去研究符合苏联生活的特殊的发展。

这些机构和团体的首要职能过去和现在都是联系来自外部的计划和政治意志的桥梁，而整个社会共同体实际上并不参与其事，它只是不断地竭尽全力地去贯彻执行。

例如，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五年计划，提前一年，这是群众发扬首创精神，实现其意志和努力的結果，但是，群众也仅仅

在完成来自外部的计划这一类事情上被动员起来。

弗·科：一般地讲，人民是赞成计划的，尤其是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他们是赞成的。

克·弗：也许，现在一般也还是赞成的。假定有人对一个苏联人说：“衡量你们国家的建设是否取得成功，关键要看你们的商店里是否增加了商品”，他听了一定会想，这要取决于生产是不是上得去，所以就自然同他个人联系了起来。

莫·德：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人民是赞成的。

首先因为人民包括好几个不同的部分。工人阶级中有落后的部分，也有成为社会的负担的一部分职员。（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反，苏联的有些职员的社会福利比工人还要差。）每一部分人的内部又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始终存在着，远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不应忽视事物的两重性。

一方面，认为苏联社会一成不变，这种主观想象是错误的。证据是，在受现政权领导的机构和组织中，可以发现真正的群众运动的痕迹。如在共产主义劳动小组，劳动竞赛，制定个人计划，交流经验，成立发明者协会和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①等活动中就有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国家正在进行引导。

的确，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人们享有相当广泛的具体的自由，如选择工作的自由，争取晋级的自由。但是，通往真正结社或政治斗争自由的道路实际上又被堵塞了。

在这种情况下，动员群众的政策无非就是要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引导到现存的机构，特别是生产中被批准成立的那些起

^① 原注：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的职能是备战和民防。该会拥有大量会员。

桥梁作用的组织中去，如那些并没有真正的代表性的定期召开的生产会议，或者是我上面已讲到的那些名目繁多的其他组织。

这些机构具有下述政治职能的社会基础，通过额外的努力，去保证维护社会各不同部门、不同类别成员的地位。

这一切都是从社会实际出发的。劳动者个人力所能及的行动，同发展中的整个机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致使要求人们积极参加社会改革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人们民主地参加社会改革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在一个生产资料社会化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还未完全成为现实的社会中，情况更是如此。目前，出现一种趋于消极维持现状，维持现有地位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苏联社会那些条件最差、最落后的阶层中尤为明显。

最近一个时期，有过一系列改革的尝试，如精简生产中的各级行政机构，目的是为了减轻官僚主义的负担，还有在工厂中实行人事方面的计划等等。为什么这些很有意义的改革，经过一阵高潮之后，统统都消声匿迹了呢？因为，如果把这些试验进行下去，并加以推广，就会使改革更加普遍化。而这些改革不仅对现存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的低效率提出怀疑，而且，它们也受到人民群众中各个不同部分出于自身的利害而进行抵制。为了克服各种阻力，必须发展一个更深入、更全面、更自觉的民主运动。可是直至目前为止，这个运动尚未到来。

亚·阿，我认为还应该认真估量一下工会的巨大作用。从列宁领导的时期结束起，工会组织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苏联埃各级机构的数量。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中所处的地位是极全矛盾的。

奇怪的是，尽管在斯大林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但在工厂

中到处都出现一种工人的行会组织，它们以最初级的形式保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人们一方面真诚而又模糊地接受社会主义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天天在捍卫他们的利益，他们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捍卫自身的利益表现在以下方面：劳动的节奏不强，缺勤率很高，主张取消按技术水平来区分的工资级别、统一增加工人名义工资的平均主义。

在上述各个方面，工会是坚决捍卫工人利益的，但同时，它又不断号召工人去完成计划指标，这就使它的职权范围发生了混乱。这种现象——在中期内仍会继续存在——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无产阶级在工联主义阶段的领导权，其后果也延缓了其他社会阶层进行改革的速度。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在损害同其他阶级所建立的必要的联盟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就迫使那些软弱的社会阶层融化到无产阶级中去或者迫使它们自成体系，不要社会主义的改造。

后来，其他倾向使这种阶级行会主义遇到阻力，如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逐渐高涨起来的爱国主义的动员运动。这就出现了两种政治热情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状况：一方面是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突出表现的巨大政治热情，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麻木不仁的表现。

紧张状态和利害冲突

弗·科：我们不想把行使民主的效用理想化——历史也未提供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可以设想，通过广泛地发扬民主生活，利害冲突是能够得到克服的。我们正是打算从这个角度去绘制我们的社会主义蓝图。

的确，从客观上讲，必须让不同的利益表现出来，因而，它们在某些时刻会发生矛盾和斗争；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因为属于不同的民族、地区而形成的不同集团之间就有不同的利益。但是，也有必要通过解决这些冲突，使它们团结起来，这就需要有一个进行统一的因素。到目前为止，国家就起着这种作用，它通过一党制进行鼓动和组织。

为了能够取消这种“恢复”、“引导”或来自上面的其他做法，必须由另一种真正能反映一定时期整个矛盾的组织形式来代替；而不是简单地让矛盾任意发展或割断它们之间的某些联系。这样，就涉及到马克思所赋予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问题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治问题。

列·罗：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时代特别令人感兴趣。在那个时期，发生过许多群众性的大运动和大辩论。开垦处女地、发动共产主义劳动大队，掌握国家某些职权的运动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还成立了维持公共秩序的小组，连儿童也参加进去了。回到早期革命形式的风气，即所谓恢复列宁主义准则，也是在那时盛行起来的，此外，“同志审判会”^①也恢复了活动。

群众中间掀起了高潮，他们渴望新形式、新机构、新的团体，以便更好地解决某些问题。

当时有许多共产主义劳动大队，我就看到过学生们出色地完成了十年的学习后，整年级整年级毅然决然地表示：我们盖房子去。当时，开始了改善住房的运动，这些青少年热情高涨，他们说：我们要亲自动手，把事情办得好上加好。

^① “同志审判会”是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组织。赫鲁晓夫上台后，把它变成管制群众的工具。按规定，凡五十人以上单位均可成立，须有官方专政机构代表参加。全苏有二十多万个“同志审判会”。它处理法院不受理的较小案件。

后来，事情在许多方面陷入了困境：党和国家的领导想控制这个运动；这就和那些热情的青年人的利益、职业上及别的方面的利害发生了冲突；此外，青年人没有家室，他们过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而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家庭人口众多的建筑工人则有不同体会，诸如此类的问题数不胜数。

克·弗：当某种类型的阶级斗争被消灭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这样的观点：社会上各个阶层和集团内的矛盾都是偶然的、暂时的、甚至是个别的现象，一些小问题只需在办公室内就能解决。

政治上的中心任务是使社会更加清一色。其实，清一色是个理想，但它却被认为已经实现了。

人们的印象是：承认苏联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承认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紧张状态是无关紧要的。相反，重视这些紧张状态，就是怀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然而，由于一提起一九一七年仍能广泛地引起激情，所以人们不会怀疑。

其实，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认为，在社会现象的实质内容中不许存在矛盾。可是，在苏联的生活中，似乎矛盾已经被先验地排除了。在寻找许多阻力的根源时，人们总是陷入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看法，即苏联历史时期总有个过程。这种看法是最顽固、最普遍的教条，因而实质上也是最有害的教条。

的确，只是简单地消除所有这些紧张状态和利害冲突，也不是一个办法。还必须在这种自发性和统一愿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要实现这一条，先鋒党的主观能动性是关键，但是这不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排除多种形式的矛盾和紧张状态。

民主的发展不是必然的，而是艰难的

列·罗：“清一色”这种提法在三十年代就占主导地位。

克·弗：是的，那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交接时期。

苏联的史料把多元化看成一定时期内可以容忍的一种形态。这在一九二五年关于文学的著名决议中是个重要的内容。此外，这个决议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各种思想——如布哈林和其他自称自由派的思想——统一的结果，而后来这些思想又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承认在一定时期内，精神生活中存在某种多元论是合理的。一旦发生朝清一色方向发展的社会变化，就有理由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政策。

这些观点在一九二五年的决议中讲得很清楚，只不过在所谓斯大林时代，决议是以某种方式执行罢了。起初，可以说是用一纸法令来代替这个问题的历史发展。这个法令声称，一个历史阶段已经彻底完成，而另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了。但是，现实生活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情况要复杂得多。

在二十年代末期，列宁格勒大学进行选举时还有不同的候选人名单。有的名单上列着很古怪的名字，有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名单。在文学方面，直至一九三二年，还有农民作家和农民的杂志，它们反映了属于多样化社会学的不同思潮。

亚·阿：后来，这种发展中止了。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以后，又具备了新的政治条件，它使某些方面敞开了大门，另一些方面则半开半掩。到了一定时候，又决定把大门或多或少地

关了起来。从这方面来看，有两个阶段无疑是决定性的，一九六五年二十三大的前夕，《真理报》的领导班子换了；一九六八年捷克危机之后，关于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造的辩论被制止了。

克·弗，的确，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交接时期，苏联社会发生过朝比较清一色方面发展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个过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可是，人们并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的发展本身是有些曲折的这一现实，而是自上而下地决定，宣称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成。这就是三十年代有名的所谓“巩固”苏维埃政权时期。

列·罗，作为前面已提到的非常状态的补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越来越强调的问题是如何加快历史进程，使其超速向前，也就是高速度超越阶段的问题。

克·弗，在说明这些阶段的特点时，一些提法是十分简单化的。要是有冲突，那就是善与恶，善与优之间的冲突。善与优之间的对立，这种提法历史地讲本来是可行的，但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就显得幼稚。因为现在的善与过去的善相比，并不是优，但从绝对角度讲，它本身已是善了。然而，与更为绝对的优进行比较，就成了问题，因为无论是善还是优都是与现实相当脱节的。

但同时，现实生活仍在发展着，而且应该说，发展的方向不总是同那些武断的历史分期所声称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只不过现实生活有所不同而已。它的内容以及变化要丰富和复杂得多。

亚·阿，也许我们把所谓的斯大林时代想象得过于反常了，原因是由于我们对当时的宣传，包括消极的方面，一概信以为

真。

有人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经济发展中的具体物质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举重工业为例。大家都说，在苏联，重工业占优先地位。苏联的经济研究资料表明，苏联经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虽然受到镇压运动的影响，但还是完成了任务，从而体现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后来，在乌拉尔，工业体制又迅速得到转变，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苏联经济全速发展了军火工业，从而拯救了国家。这一切当然不能仅仅归功于重工业，而是由于在整个工业化时期，已经建立起来了完整的中、小企业的体制。这些企业吸收了一大批多余的农村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又相当灵活地分配了资源。如果当时墨守成规，死背教条的话，苏联经济早就崩溃了。

在斯大林时代，对于这种体现在工业经济中非计划化的极大的灵活性，官方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是从不予以称颂的，可是这种灵活性却很说明问题。

对大吹特吹的所谓“物价稳定”现象，也可作同样的分析。实际上，被失败的价格政策掩盖了的有限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根据凯恩斯^①提出的短期方案，在二十年内将对老企业的投资定期转移到更为集中的企业中去了。

如果人们少关心一点意识形态而多考虑一点现实，人们就将发现，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所取得的经济胜利是建立在某种“计划下放”，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极大的资金流动的基础上的。

^①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创立了以国家干预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凯恩斯经济学”。——编者注

这一切，惯于批评苏联的人是不会接受的，斯大林当然更是如此。因为，在三十年代的苏联存在着被当局任意戏弄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在战争动员时期，按照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每个人的智慧重又得到发挥。苏联的历史是一部悲剧，在悲剧的发展过程中，矛盾着的意志互相冲突，但是，这当然决不是由上帝决定的命运在单调平淡地展示它的始末。

文化方面的情况尤其如此。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这一期间的作品，几乎相当于一九五六年以后苏联所创作的有价值的作品的总和，但是它们都被锁进了抽屉。康托罗维奇^①在数学经济方面的主要论文是在一九三八年左右发表的，其他论文则是在一九三九年就已写成，准备发表。

一些类似埃亨鲍姆^②的学者，那个时期一直在教书，波克洛夫斯基则写了文学传记，丘可夫斯基^③为儿童创作了童话，卡维林^④写了报道文学。因此，不能说苏联的文化落后。苏联文化是很先进的，以兰道^⑤为首的全体物理学家已迅速地建起了杰出的原子工业。苏联文化的先进性还表现在哲学、符号学、巴赫廷^⑥的语言学和著名的格利凡德^⑦的数学等学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划时代的文学巨著，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⑧。

在政治方面，有一九三六年的宪法，它是由布哈林和拉狄

① 列·维·康托罗维奇（1921—），苏联数学家和经济学家。

② 帕·本·埃亨鲍姆（1886—1959），苏联文艺学家、文学博士。

③ 科·伊·丘可夫斯基（1882—1968），苏联作家、文艺学家、文学博士。

④ 维·亚·卡维林（1902—），苏联作家。

⑤ 列·达·兰道（1908—1988），苏联理论物理学家。

⑥ 米·米·巴赫廷（1895—1976），苏联文艺学家、艺术理论家。

⑦ 伊·莫·格利凡德（1913—），苏联数学家。

⑧ 米·阿·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作家，除著《大师和玛格丽特》外，还有长篇小说、剧本《外逸》等。

克起草的，用来作为建立最起码的民主准则的战斗工具，它是根据实际政治斗争的需要设计的，但在当时，却无法执行。

可以认为，一九五二年优秀的经济学家，国务活动家沃兹涅先斯基的被害，是反对那些想发挥战时经济改革成果的人的结果。

所以，在苏联，没有任何反民主的天命，只有斗争。

斯大林在某些时候，例如在战争期间，颇为奇怪地放松过在某些领域内的控制。战后，他曾召见维诺格拉多夫，要后者写一些语言学方面的普及读物来抨击马尔的信奉者。

为什么赫鲁晓夫在三个月内就能够采取措施，一下子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之前已是人所共知，并经过了多次讨论。但是从前的政治领导决定把事情压下来，一九五二年斯大林的论点就反映了这个意图。

因此，一方面有粗暴和血腥的迫害，另一方面又在进行辩论，两者同时并存。事情之所以没有进展，是因为在政治上缺乏解决问题的愿望。换句话说，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并不是不可抵抗的。而斯大林死后，尽管还有人说他阴魂不散，但影响毕竟小多了。

弗·科：刚才谈到三十年代时，用了两个词：加速和专制。这两个词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和特征。

建设速度的确加快了，这是个基本事实，也是当时的苏联政权、国家能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专制”的意思是说，一切决定都是根据自称是科学的思想作出的，这种思想自认为，可以不经研究就制定出各种蓝图，然后，只要交给人们去执行就行了。

克·弗：按照这种思想，社会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迟早会彻底消灭某些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思想是科学的和直线发展的。

弗·科：三十年代最主要的是，人们思想上认为，苏联正在向彻底的社会化过渡，生产关系已经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了，因为所有制已经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国有化的速度与抽象的理论设想相比，加快了。生产和交换资料迅速转移到集体（实际上是国家）的手里。因此，一九二九年就实现了土地集体化。

政治、思想和文化都一概依附于上述经济和社会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取决于人们企图超越一个历史阶段的愿望。因此就出现了国有化——五年计划——集体化这几个相互衔接的过程。在所有苏联的文件，包括教科书和统计资料中都这样写道：一旦“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百分之九十九”，人们就进入了社会主义。

二十五年以后，人们发现苏联并没有如愿以偿地进入早先所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而社会还在演变，还在继续发展。于是，人们又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叫“发达的社会主义”。从一九六零年起，苏联进入了这个新阶段。

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集体化

列·罗：集体化必然涉及与群众的某些关系。为了改造农民，就要通过强力手段消灭农民的上层。

克·弗：好象曾经公布过法令，规定不允许那些在过渡时期得到宽容的中间阶层再存在下去。不仅如此，凡是处于中间

状态的、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都要断然处理。正如马雅可夫斯基在一句诗中所写的，这是“中间状态的末日”。人们把中间阶层分为两半：一半争取到正确方面来，另一半清除出去。

建设速度的加快，在农村，造成了人们低估问题的复杂性的后果。农民群众中的中间分子问题长期成为无人关心的问题，但后来终于大刀阔斧地把它作为引起怨言的根源，用一连串镇压的手段加以处理了。

莫·德：早在一九二一年，列宁就说过，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家里建立一个工人政府无异于赌博。他预言，这样会产生严重的骚乱。事实果真如此。

对于二十年代的问题，许多当事人认为，那是城乡之间的矛盾。如果让事情任意发展下去，乡村富农们就要否定在城市中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小私有资本的精明鬼会发展成为大魔鬼。

整个国家的发展，并未被城市，尤其是未被飞速发展的国营工业所左右。国营工业遭遇到严重的障碍，其中包括非国营系统的竞争。但是国营部门迅速得到了改革，它逐渐集中，并或多或少自发地形成为计划经济的基础。

可以说，那时人们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农村可能出现的危险上，而没有清醒地看到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新问题。直至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期间问题才得到解决，建立了新的经济机构。其中大部分运转了很长时间。而今天苏联的经济机构正是从那时直接沿袭下来的。

苏联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经济基础，使它的工业技术赶上了世界水平，如现代化的机床制造业和现代化的工艺技术。当时，苏联拥有一支先进的、迅速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

但同时，在农村执行的政策使城乡差别日益扩大，集体农

庄和拖拉机农机站分家，实际上剥夺了广大农民在经济上的主动权。这多少也正是要追求的目的，因为人们把以前遇到的困难都归咎于广大的农民。然而，这并不能提高农民的觉悟。再说，农民之中情况也各不相同，如在拖拉机农机站工作的工人也是农民，但他们同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上的农民就有很大距离。

因此，一方面是先进的城市工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外流，在落后的农村地区，生活负担逐渐加重，生产效率低，报酬少，这就造成了下列现象：农村对国家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压力，从而成为紧张状态的根源。

克·弗：我认为，从一九二九年起，人们的思想上也存在某种恐惧。我们不能过分责怪党的政策，党曾力图采取损失较少的政策。混淆中农和参与剥削的富农的倾向，只是一种判断上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而受到伤害的农民，几乎把矛头对准了工人阶级的政党。由于党在估计其实际的社会关系时发生了偏差，从而激起了农民的各种反抗。为了镇压反抗，党又走上了极端。这样，整个社会受到了打击，而党有点感觉到自己被广大农民所厌恶。由此出发，各类政治现象都互相联系在一起。

亚·阿：话虽如此，但农民的这种后退并没有导致对集体农庄的否定。即使在德国占领期间，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农民自发起来要求解散集体农庄的事件。

克·弗：的确，对于集体化的好处，农民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只是他们在政治上拒绝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与社会之间有一道很深的裂缝。共产党员感觉到了这一点，那时在党员中自杀之风盛行。于是，人们提到了应该执行宪法，参与制订宪

法的人本可以把当时的辩论更深入地进行下去，但是他们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感到，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处境十分不妙。

总之，把农村各个阶层的人混杂在一起是个错误——这一点现在看得更清楚了——而这个混杂的过程和情况本身十分复杂。这个错误也许可以理解，但是对于群众的思想来说，其政治后果是严重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后果决定了时代的政治轮廓。

斯大林，思想上的妥协？

列·罗：我认为，在斯大林身上体现着一种以某种方式同上述社会裂缝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上的妥协，这种妥协将外部的思想大量地吸收到社会主义思想中去，同时还采纳了农民群众的许多思想。

莫·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利于平均主义、原始的反等级形式的出现，其结果反而鼓励了“国家是救星”和“逆来顺受”等思想的产生，以及“领导人被说成是间谍”案件的受理。

亚·阿：斯大林不单纯是唯意志论者，他还是个长期接受过去的事实而不加以改造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斯大林时代的确有过联盟，但比列宁时期的水平低多了。列宁时期的联盟的内容是团结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采纳他们的民主愿望，在一定时候，将这一切同工人的民主形式结合起来。列宁提到过一种世界性的民主文化，在那种文化中融汇了农民的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和工人的民主主义，后者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

可是后来，情况怎样了呢？

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决定了对于生产过程必须采取集中领导的形式(领导人要负个人的责任)，而生产力没有充分社会化的结果造成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较大的工资差距。

还存在其他一些更为重大的矛盾。例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及由于派生出来的脑力劳动组织的形式，不能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而简单地予以推翻，尽管基础研究，实用研究和经济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发展。一部分理论工作还不能根据社会需要搞计划化，其研究成果也不能预测。再者，进行脑力劳动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内部条件，这些内部条件规定：基础研究(起码在理论部分)必须占主导地位，它要超过实用研究。在所有基础科学领域内，不管在那个方面，凡是涉及理论，都不能搞计划，也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贯彻特雷迪亚可夫的口号，把作家变成“灵魂的工程师”。

然而，这些劳动技术分工的形式带来了劳动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又再产生，或可能大量地再产生独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阶层。这些矛盾无疑是非积极的，因为它们推迟了在社会主义中出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形式并延长了过渡。但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们不应把矛盾简单地看成是新与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形式，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采用对抗性方式来解决问題。

虽然斯大林的观点也承认有矛盾，但其错误是一出现矛盾，就把它归结为一场反对阶级敌人的对抗性斗争。虽然他的观点也承认统一，但使其绝对化，以至禁止人们去考虑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会发生历史的演变，甚至会打破统一。

因此斯大林的观点极为忽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劳动社

会分化的新形式。斯大林不是尽可能地把脑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探寻方法以克服劳动的社会分化，而是以阶级的某种有组织出现加剧现存的各种矛盾。之后，面对这种解决方法表现出的既是乌托邦的，又是宗派主义的性质，他在摇摆不定中被动地重新接受盟友，又不对盟友进行改造。

人们在另一时期，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也看到过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出继续寻求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唯意志论，另一方面又退回到社会现实和结成联盟所必须的那些社会阶层中来。集体农庄庄员总的说来是维护他们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的，斯大林又让他们保持了完整的传统爱国主义，又重新实行旧的教育制度等。这就是妥协。对同盟者不进行改造，而是原封不动地接受它。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采取的一面进行镇压，一面进行妥协的政策，加强了这些非无产阶级集团的社会意识，促进了他们在客观上与工人阶级的分离。

弗·科：难道不应该自问一下，在所有这些时期里，我们常说的那种镇压起到了什么作用？是不是镇压？镇压什么？这不仅仅是恶魔在唆使斯大林，或唆使张三、李四，对好人，对革命者的价值进行真正的屠杀和摧残。

特别是，人们是否可认为，一九三七年使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的恐怖具有这样的意义，即，在另一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党，不再是一个符合新时期需要的党了。虽然新的领导人往往还是那些老的布尔什维克。流放和处决的实质难道不是以另外一个党来代替这个党吗？即使人们不完全这样想，但历史性的压力难道不是已使过去建立的这个党一方面不能为人们要求它承担的任务服务，另一方面拒绝承担

这些任务了吗？

克·弗：首先我认为，那些给苏联各个方面的现实造成极大损失的流血事件，那种对政治干部，技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灭绝性做法，之所以达到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是因为对国家机构的职能，也许还有对党的职能缺少（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进行民主监督的措施。这类事情是发生在转折时期，此外，令人憎恶的事情尽管越来越少，但在今天苏联的现实中仍可看到。

这与对民主的作用认识不够有联系，而我们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总之，一九三七年不仅发生了镇压，而且这种镇压也被接受了。国家接受了这种镇压，因为这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事情，党接受了这种镇压，因为党的干部确实出现社会分化，这些干部来自其他阶层，只有其它方面的经验，或者根本没有经验。除此之外，又出现了一些相当微妙的蛊惑人心的宣传现象。有人以列宁的名义来发动了一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这场斗争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吧。“起哄者”在自发的幌子下，从一次会议窜到另一次会议，吼叫着迫使正在发育的反对派沉默下来，那种蛊惑人心的反官僚主义的做法为后来的领导人相继下台鸣锣开道了。斯大林正式安插在工农检察院的一些派别用蛊惑人心的方法拉拢了大批青年和基层干部。这种蛊惑人心的做法还吸引了五年计划初随大流入党的大批青年群众。这种蛊惑人心的做法还能激发人们实现某些伟大的经济任务的热情。这种热情使人看不清党的生活中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

列·罗：那些靠文化革命——被理解为民主革命——而上台的新干部，同样又从清除原当权的干部中得到了好处。同时，

由于他们自以为代表了革命的新高潮，他们对现象的评价显然是错误的。这是那一时期最令人忧虑的方面之一。因为，尽管有后来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但那些严重的后果直至今天还阴魂不散。

克·弗：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的动机有吻合之处。必须从头到尾、从其社会根源来研究这一阶段。单纯从政治逻辑来研究，或者单纯从权力之争的角度来研究，是不能触及问题的要害的。

列·罗：从那时以来，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流传着一些既非马克思主义的也非社会主义的提法，那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克·弗：在知识和科学领域内，一种特有的教条主义的断章取义做法开始猖獗起来。历史只被看成是进步现象和反动现象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恰米尔^①这样一个人物，在三年时间里都被视为是一个进步人物、一个民族斗争的战士，三年之后，又被说成是英国——土耳其帝国主义的一个奸细。对阿瓦库姆^②则时而把他说成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时而又把他说成是一个可怕的反动派。

列·罗：从那时以来，人们常使用的一种如：“我们的和不是我们的”，即是说，某人是我们的人或是敌人之类的说法，对上述精神状态也发生作用。

克·弗：例如高尔基刚从国外回来，就受到西伯利亚一家刊物的指责。该刊就高尔基问题开辟了一个讨论栏——这是完全合法的。党对此采取了两项措施：封闭这家刊物，印发党的文件，说这种攻击是卑劣的，因为“高尔基是我们的人”。这说

^① 原注：十九世纪在高加索进行争取达格斯坦独立斗争、反对沙皇的英雄。
^② 阿瓦库姆，高加索革命民主主义者，曾参加高加索革命斗争。

明了一切。

由教条主义和摩尼教义^①构成的大河，是由许多源远流长的小溪汇集而成的。苏联生活的整个纬纱，从上至下，从头到尾，几乎都是编织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广为传播、有连贯性并且是牢固的思想，因而克服起来尤为困难。

这说明，当局势出现有利于进行真正变革的时候，当人民真正要求革新的时候，这种思想最终就陷入了困境。如果人们仅仅把它缩小到专制主义或恐怖的简单的概念中来，就无法理解了。

强制、镇压发挥过它们的作用，但有的时期，强制、镇压也曾被大大放松过，但并不因此就能使整个政治社会体制过渡到具有另一种结构的阶段。在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而且其本身包含了新的萌芽和新的可能性的时候，就更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当前是一个停滞和踏步不前阶段。

二 十 大

列·罗：还必须说，苏联人所经历的唯一政治生活实践产生了下述令人吃惊的现象，那就是在二十大以后的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认为，要使事情发生变化，就意味着必须把政权工具夺到手。

克·弗：即使可以设想，发动一场“宫廷政变”，这也不足以使结构、精神状态发生重大的变化。在社会力量的影响下，发生巨大变化的客观因素（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方面的客观

^① 指绝对化的思想方法。

因素)都已具备,但它们并不能改变苏联社会本身的这种关系。

列·罗:这样就能更确切地估价二十大的作用了。二十大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它进行得不彻底。这不仅是因为二十大对应采取的措施缺乏必要的认识,而且因为二十大在党同干部和群众中没有必要的支持者。

克·弗:二十大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举一次总带点唯意志论因素的代表大会,即使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央的、纲领性的、并且有深远意义的,也是无法推动或改变事态的。

列·罗:在二十大上,有一个“回到列宁主义准则上来”的问题。不是革新,而是恢复准则。恢复的问题涉及许多方面:经济生活以及和它有关的国民经济委员会^①等,文化生活,实际上又回到最初的一些形式上,不过,并不是为了进行深思熟虑,而只是为了重复一遍。

弗·科:从这里可以看到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和强烈的要同过去被切断的历史源泉重新联结起来的愿望;另一方面,是一种不太明智的想法,即认为可以抹掉整整一个历史阶段,从零开始重新再来,似乎过去什么也未发生过。

二十大对大体上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零年开始的这一时期作了一个新的解释。重新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又退回到四十一世纪以前,既未联系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也未联系当前现实问题。

克·弗: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历史运动是向前发展的。列·罗: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把它称为治疗方

^① 原注:国民经济委员会,是革命后使用的名称。

法，给集中营中的那些人，给被禁的那些著作恢复名誉等。这些不可不注意到啊！

弗·科：这种恢复名誉的做法，难道不正好同受老一辈人影响的那部分为数很多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致了吗？这些老一辈的人又恢复了他们的青春，他们认为自己将能结束一个时期，然后在他们过去的幻想和过去的经历的基础上重新迈开步伐。

但青年人很难能理解这一点。在青年人中，二十大的冲击加强了他们对二十大以前的事情的否定趋势。人们向他们介绍的二十年代的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即使冠以“列宁主义”的称号，对他们中的相当多数的人来说，也不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认为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方面，甚至寄托在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美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唯技术论上，甚至寄托在民族主义上。事实上，希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生活得更好的这种合理的愿望同苏联当前的实力也是相符合的。

持不同政见者

对在希望、思潮和理解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也许能使人对持不同政见这类现象有一个正确评价。这是一种有意义的附加现象，而不是促使事情发生变化所采取的手段，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竟·弗：首先，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不同政见带有我们在苏联社会中的机构本身所见到的那种普遍的自光短浅性。持不同政见者对现实的看法带有论战性，而且由于尖酸刻薄使事

物本末倒置，但对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合理的看法一面，同苏联当局和苏联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

这不妨碍他们反映和揭发苏联在民主问题上的真正的缺陷和弊病。

弗·科：他们既是揭发者，又是受害者。

克·弗：他们所遭遇的正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该容忍的东西。

列·罗：我们不妨说，他们是问题的揭发者，而不是推波助澜者。

弗·科：但不管怎样，对各种不同分歧意见进行过火镇压的本身可能就反映出某种害怕心理，即害怕这些分歧同其他的不满汇集起来。

克·弗：“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同整个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赞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惊人的看法。

列·罗：他们也过激地使用我们的和不是我们的这一说法。

克·弗：他们对象法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发展的评价还保留着似乎是六十年前的那些过时的批评的痕迹。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持反民主主义的观点，他们同那些非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对预见社会的具体发展和预见这种发展对政治改革产生的影响，都表现了同样的无能为力。

至于其他的对立形式，不应见木不见林。某些对现状不满者属于一个严重脱离工人阶级的知识界（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这一点不应掩盖如下事实：在劳动场所正在出现某种成熟的现象。人们对有更好的组织结构的社会实践正在进行探讨，通过这种实践苏联社会运动才会有更可靠的前途。

弗·科：同时，持不同政见者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他

们援引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有时甚至呼吁资本主义世界敌视苏联的力量或者苏联感觉是敌视他们的力量来声援和干预。无疑，因为苏联当局意识到那种做法使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意见在舆论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所以就采取了流放或取消国籍的措施，通过这些具体措施将他们同苏联大家庭分开。

显然，因为反对派持有另一种观点，从而出现重大的分歧，因此不能把“持不同政见者”看成是铁板一块的。

未来的道路

列·罗：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我们觉得通往未来的道路没有向持不同政见者或某个有组织的反对集团敞开，那么，群众怎么还能毫无顾虑地参与今天的政治生活呢？

克·弗：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引起争论的焦点之一。

今天，除了这个或那个独断专行的事件外，国家的做法普遍软化下来，公民实际上有了更大的可能保持自己的个性。正是这种内部的缓和，使人可以期待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会出现深刻的变化。

首先，必须指出，尽管经历了各种变迁，工人阶级在国家机器，在企业管理中——不包括人们在其他方面可能想到的形式——所发挥的作用是在任何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不能比拟的，这是一个现实。

亚·阿：确实，苏联从未有过这样强大的工人阶级，它在社会现实中如此举足轻重，以至使总的方针、经济发展本身的战略不能不因此发生变化。因此，工会的民主问题又突出来了。

克·弗：确实，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在工会生活中，由于工会行使职能更加活跃，原先只考虑眼前利益的稍显短浅的目光是可以扩大到政治和体制方面上来的。此外，人们看到出现逐步扩大权利的趋势。

这种具体民主的前进常常以意外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出现劳动纪律松懈的状态，又如在商业方面，由于机构的不足而出现某种重叠的同类市场。

亚·阿：这不是新问题。随着工人阶级作用日益增长，问题又达到新的尖锐程度，一些潜力显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按照笛卡儿^①的说法：不关心国家大事是最低水平的自由，那么，经常缺勤、劳动纪律涣散、生产率低等，难道不正是低水平的社会主义的表现吗？从这种低水平过渡到较高水平的问题，难道不正是苏联民主的形式吗？

克·弗：现在，统治的教化还没有达到有利于人们实行更大的干预、发挥主动性和进行参与的地步，较普遍的现象是，人们宁肯处于某种局外的状态。

这种双重的现象事实上表现了对制度的发展缺乏信心。它不是十分敌视的表现，只是带点讽刺或冷漠的态度，但它同公民的进步参与是根本对立的。

这是在一般人中间的情况。但是，在知识水平很高的阶层中，面对一些独断专行的现象，人们也可看到团结原则的后退。对待政治前途，采取某种日益冷淡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亦构成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压力。

^① R·笛卡儿(1569—1650)，法国著名哲学家，他在思想对存在的逻辑层面上是二元论者。在认识论上，他是唯理论的创始人。著有《方法论》、《哲学原理》等著作。

弗·科：正是这种现象常常给人造成一种苏联人不关心政治的印象。但是这种以某种方式拒绝参与政治的态度，事实上本身不就很政治化吗？

在我们看来这些弯路造成人力上的巨大浪费，这些人力是苏联社会所缺少的。如果把苏联公民仅仅看成是一些小卒子，那可就是盲目的和太自以为是的了，因为我们并不了解那些情况和所使用的政治语言同我们相类似的人们。有一种既不是完全被预制出来的和受人操纵的，也不是私下产生的公众舆论，它通过各种渠道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最终影响到决策。正是因为它较少涉及政权的重大问题，因而它的活动场所就愈加自由。由于思想的一致性（我们遇到过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所以它一直有较大的影响。

克·弗：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能够干预当前苏联社会的人物中，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批自称为社会学家的名作家。他们的纲领是试图通过文化渠道，正视社会生活中的细节，包括观察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然而，他们意识到肩负的使命要重要得多。

因此，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通过客观地、不带感情地、详尽地和毫不惧怕地写出社会的矛盾，社会的机制，就能帮助公民认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拥有的地位。

列·罗：社会各阶层都有爱学习的人，他们对社会学之类的研究，不管是报道、文章、研究论文或文学著作表现出的巨大兴趣是令人吃惊的。这就是某种形式的政治觉悟。

亚·阿：不仅是社会学，还有社会心理学也有了全面的发展。列昂捷夫^①的心理学著作，各种政治之外的学科，实际上

^① 阿·尼·列昂捷夫(1903—1979)，苏联心理学家。

也都是阐述政治问题的。

某些经济辩论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反响。例如，围绕着康托罗维奇的观点(特定的客观估价)进行的辩论，触及到一些基本的问题，如生产力的发展，官僚主义的经济代价，等等。

克·弗：问题是要看清楚，这个社会是怎样运转的。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在这里，不能有随心所欲的揭露，不会有某种神灵出现，从上面来解决问题，也不可能来自基层的自发“革命”。

弗·科：多年以来，地方性和区域性生活表现活跃是很突出的。这也是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的表现。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了，解决了不少问题。即使人们认为对全国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的时候，在地方或地区一级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不管怎样，这对整体也会产生影响。

克·弗：这就是通过点滴的工作进行的一种再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看不到总的前景，有时会导致人们把自己关闭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打开了，如地方生活，就会重新刺激人们通过他身边发生的事情干预社会生活、甚至干预政治。这些机会的形式越来越多样，而且越来越经常了。

在俄罗斯人这个大范围内发生的事，只被看成是地方小事，而在另一个民族的小范围内就可能成为更具有政治性的事情。在加盟共和国一级(它已具有集中制的性质了)，这类事情可使人们获得更多一些的总体经验。这里，苏联情况的多样性(及其辽阔的土地)都能发挥历史的作用。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能给民族活动(这些活动在过去是尽量避免或根本不存在的)提供活动的可能性，大大促进其发展的一种制度。这是经过在过去部分地否定每个民族自身的价值的阶段而发展起来的，不

过，现在这个阶段早已结束了。

莫·德：我认为把先锋力量真正的团结起来，才是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应该让这些力量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让他们围绕一个更真实的政治内容组织起来，而当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所以，又提出了党的问题。改革，这不仅仅是解放某些力量，而且要积极地把力量组织起来去进行改革。

可是，目前，人们经常把造成困难的责任推到工人头上，指责他们无纪律、旷工、懒惰，甚至骂他们酗酒。实际上还是那种把工人看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说造成困难人人有份，但又无法落实到任何一个人的头上。同时，这种思想实际上会造成分裂。

克·弗：人们并没有指责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指责的是那些不具代表性、不典型的分子。

弗·科：或者说是批评那些外来的资产阶级的残余和影响，批评那些“不正当的交往”，但不批评当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身。

莫·德：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态度就是采取开除的做法，斗争不是求得团结。

问题是要创造条件，从消极的态度转向积极的态度，以便克服这些矛盾。

克·弗：这需要在精神上和在结构上同时出现非常复杂的变化，只能采取需要较长时间的一些形式，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列·罗：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一年）刚一结束，人们就揭露了所谓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或列宁主义准则斯带来的恶果，其实这就是缺乏民主。从那以后，人们就很少继续朝较为民主的做法作出有效的努力。

克·弗：相反地，深入社会细胞中去的苏联生活，在经济发展、缓和的影响下，在对现代世界进行的人们日益能接受的文化和新闻传播的影响下，以及在个人觉悟的要求下，使独断专行的做法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这是通过消极的抵制，甚至通过表示断然的反对态度才达到的，因为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劳动者意识到他们的整体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还存在明显的阻力，但不能说这是一个僵化了的社会。

弗·科：从小人物由于觉得与己无关而不关心国家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不满，到代表大会要求加强民主的决议，到新宪法里制定的某些条款等，各方面无不流露出必须进行改革的想法。

但是，动力来自何方？从上面来？还是从下面来？动力只能同时来自上下两面。集中制的统治已达到这种地步，以至一切事情都要由上层来决定。但是，如果上层不能反映下层的要求，发挥下层的才干，那就一事无成。

期待发生某种民主的改变，那是荒谬的。但是，怎能不看到在阻力、停滞不前、下禁令和判刑的后面出现的动荡不定、对立、甚至爆发冲突的形势呢？

如果要解释为什么领导班子里还是那些老年人在位，那么人们难道没有看到这正是老年人对作出决定所表现的犹豫和退缩的结果吗？如果说有斗争，又仅仅把这些斗争说成是个人或派别之争，那就不好理解了。因为这实际上是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

也许在苏联进行统治的特点是对当前进行变革表现出某种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害怕劳动人民大量发挥主动性可能造成组织混乱的结果。但是没有劳动人民的主动性，要进行变

革那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不考虑让这种担心让位于一项相信人民的政策呢？这一政策就是，让人民面对真正的现实，允许人民把责任担负起来。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为正文或注释的开头部分）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为正文或注释的中间部分）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为正文或注释的结尾部分）

第六章 文化与思想意识

一、文化历险

文化的历险确是苏联历史上最令人深思的一个方面。它无疑是这样的场所，人们可以在这里最全面地同时看到文化有多大的雄心、有多大的创作能力，乃至，它最严重的矛盾有多么深。

十月革命后六十年，一再发生的事件表明，苏联政权和文化人之间始终存在着根本的不和。禁止出版或禁止演出、强制迁居、剥夺国籍、任意进行删节的书报审查、言论审讯之类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最近发生的关于索尔仁尼琴和罗斯特罗波维奇^①的插曲只不过是其中最显眼的标志而已。这些插曲涉及所有基本的创作领域：文学、舞蹈、音乐、批评、电影。受冲击的不仅是那些对政权可能持保留态度或批评态度的人（这一点丝毫不足以说明政权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而且冲击到那些在政治上一贯完全忠诚的人或者甚至被官方认为是苏联文化的名人，如维克多·涅克拉索夫^②。因此，几年以来人们看到了智慧财富的真正失血。虽

^① 罗斯特罗波维奇(1927—) 苏联著名大提琴家和指挥家。一九七四年移居美国，一九七八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②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1911—)，苏联作家。其名著《在斯大林格勒的战线上》曾获斯大林奖金。以后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一九六三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七四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同年移居法国。

然并不是所有出走的人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但出走的人数量是可观的。举例来说，在文学方面，允许在苏联印刷和发行的著作只是苏联境内实际作品中愈来愈小的一部分，其余的作品只能在国外出版（有时甚至由官方出售，但拒绝在本国出版¹）。这样在苏联境外刊印的俄语文学作品改变了地位：它不再只是有意移居国外的人或怀有敌意的侨民的事情，而且也是非自愿的流放者或居住在苏联但被迫保持沉默的作家的事情。文化管制当局越来越指责实际文化与法定文化之间的脱节。

这显然不是偶然的毛病，而是文化管理上整个思想和专断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造成的，它导致了苏联精神生活的普遍变态。这种状况在二十大以后也没有改善，而是完全相反。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其灾难性的后果并非始自昨日。整个苏联历史充满了严重损害文化的插曲，尤其是在三十年代末盲目镇压大浪潮中对知识分子大肆屠杀（接着是对他们的著作大加谴责）和一九四九年对被控以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如世界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的非家的疯狂迫害运动。现在，关于什么“掀起的泥浆飞溅”或“伐木时扬起了一些木屑呀”之类解释可以休矣。苏维埃政权文化政策的整整一个侧面——即垄断和专制的整个方针——产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结果，尤其是同社会主义的使命、利益和成就本身是根本相矛盾的。

文化革命

与此同时，苏联革命的活力在文化领域中引起了空前广泛、新颖和重要的量变和质变。人们知道，光是对这个文化革命的总结就足以使俄国和全世界从高尔基到罗曼·罗兰或杜·保罗·萨

特^①等人马上着了迷，而这些人对苏联革命的目标和方法是最有保留的。一群开明的知识分子最初对布尔什维克的粗暴作法觉得厌恶。后来，他们发现苏联文化革命蕴藏着巨大的人道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们的反感才由于出现了兴趣、好奇心和同情心而有所减轻。

首先，这是传播文化成就的宏图大业，它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件事是，对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仍处在最黑暗的无知状态的大量人民进行速成和全面的识字教育，建立了彻底民主的教学制度，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网去促进群众对文化和艺术活动的兴趣和爱好，其中包括图书馆、文化中心、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为了这一个任务，从一开始，苏维埃政权就以热烈和前所未有的浪漫的献身精神投入了资金和精力。它发展了一种对教育的热烈、激昂、几乎是狂热的关系。这种政策在社会和人道方面立即产生了很可观的结果。教育的迅速发展很快改变了原先受损害的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的地位，但更多地改变了受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俄国双重排斥的各种人的地位：妇女以及从愚昧无知的隔离状态中走出来的异族人民；使他们在精神上和在民权上得到充分的尊严。一个国家，一方面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心安理得地让人民群众停留在中世纪的不发达状态，对于这样的国家，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有意志和手段来紧急地、迅猛地发动这样一场大变革，其解放力量之大，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不可估量的。

但是苏联的文化革命不仅仅属于启蒙的哲学。对革命政权来说，文化的传播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思想政治赌注。它是动员和

^①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和名作家，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家。主要哲学著作有《存在与无》，《辩证理性批判》等。

推动群众去进行解放斗争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特别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使群众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并行使这个彻底的民主权力，这是列宁常常提到的。他念念不忘的是必须尽快发挥劳动者的能力以便使他们担负起国家的领导责任。这种意识形态的前景显然说明这个政权为什么过早地和极其集中地开展工作，来提高群众的文化。它同样说明这种努力也是为了改造文化的传递和实践方式。它不仅超过了学校的传统范围——（例如识字，关系到大量的成年人）而且还必须找到各种各样办法把它同劳动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它同其他主要要求一样，成为有机需要。最后还必须让这些成就不是作为某种外来的或白送的东西而收下来，而是作为了解、影响和干预社会、经济 and 道德进程的功能的一种直接的提高，并通过这一点加速建立新型的政治秩序。从最初几年起，在苏联革命的启发下，出现了许多潮流，提出了许多倡议，其目的都是为了改造思想创作活动，这些活动到那时为止还是专门的。一方面，人们希望群众积极地、平等地参加这些活动，而不再仅仅是顺从的附和者。另一方面，人们又设法消除所谓纯脑力创造的领域和应用于实际生活的脑力创造的领域之间的界线。因此苏联的文化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试验场地，试验使文化实践非职业化，也就是说，把传统的范畴和社会界线推翻。这种非职业化可以采取各种各样形式，从最简单地把教育扩大到从事生产的成年人，直到设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工作室，工人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同时被邀请到那些工作室去练习创作，最后，废除俄国先驱者对形式和素材所进行的抽象研究同所谓应用艺术的实用任务之间的藩篱，这些应用艺术突然被非凡的功能品质充实起来。由于苏联革命的意识形态讲究文化的社会和政治效率，由于在民主

斗争武库中文化所占有的中心地位，苏联革命使文化以新的独特方式发挥它的作用。苏联革命给主要的概念变化开辟了道路，这种转变对二十世纪的美学思想，从鲍豪斯纲领^①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艺术非学院化和非宗教化的种种形式，都留下了印记。

文化的责任和附庸地位

苏联革命赋予文化以重要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是一件具有巨大意义、非常有成果的事情，它也证明社会主义改造的革新领域是多么宽广。虽然如此，但它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矛盾。文化责任扩大了，文化本身也陷入了危险的附庸地位，并进入职能被取代的复杂过程。既然给予文化那么大的权力，就很难不受到引诱，要求文化作出交代对它加以监督，甚至还要给它规定方向。

这种转变特别可能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那儿多少世纪以来完全缺乏政治自由，缺乏各种多少有些独立性的论坛——议会的或宗教的议坛——这就使得只有在艺术幻想中才能找得到批评态度或反对态度。各种反对意见唯一可能的代言人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态的艺术家、特别是文学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完全超乎美学的影响（列夫·托尔斯泰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典型的），同时也产生这种趋势：政权操纵批准权并且根据政治反响的标准而不是根据艺术的特殊性标准来禁止作品。这种相互侵犯使革命前的全部俄罗斯文学处在罕见的专制和吹

^① 鲍豪斯建筑学院由W·格罗皮乌斯于一九一九年在德国魏玛创立，一九二五年迁德绍。其技术和实践纲领为艺术和手工艺的结合，一九三二年被纳粹取缔，其主要人员迁居美国。

毛求疵的管制之下。毫无疑问，其他一切事情也都如此，思想遗产、还有习惯地把艺术看成超过它所具有的属性，并使之成为崇高的尊严的象征，以及设法了解为什么政权会那么警觉地进行镇压等等，这一切都沉重地压抑着苏联这个时代。

文化受到了构成苏联社会的另一个总特点的影响：低估民主形式和法律的重要性。苏联政权正确地批评资产阶级表面民主的虚假性——（特别是在俄国的条件下）并正当地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全面性，从这一点出发，苏维埃政权迅速地得出一种权力哲学，滑向了这种思想，即认为必须把最终目标摆在所有其他考虑之上，更确切地说，民权和司法结构必须完全服从经济和政治的决定；马克思主义宣称经济和政治的决定是至高无上的。

这种过早决定的方针是苏联革命在许多方面一系列失算的根源；首先，同革命秩序给予公民以可观的社会利益的总和比较，给个人自由提供的保证却是微弱的。无可争论，文化领域属于这些中间的、但又是特定的范畴之一，对这些范畴一直未曾给予足够的自主内容。因此它们同政治的关系变成了完全被吸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来看，它是苏联历史上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的一个实例。

列宁的干预

人们常说，在这方面，领导上和审查上的过激行为只涉及一些不幸的时期，主要是斯大林专制时期。当然最严重的事是在他独断专行的环境下产生的。但是应该说，除了政府或多或少“开明”的作法外，文化有非常广泛的责任这一概念，以及政

治对文化领域直接干涉的合法性这两点，在政权领导人的头脑中是一直存在的。

在这方面，由列宁个人统治的时期是十分典型的。确实，在文化方面也和其他方面一样，不存在人们可以称为列宁主义的现成学说。这是后来斯大林时期的和斯大林以后的教条主义随心所欲的创造。列宁的天才并不在于他在什么犹太教义上续上一页，而在于他善于对最困难甚至最意想不到的局势作出卓越的战略反应，来拯救社会主义革命并使它稳定地迈出头几步。这样树立起来的榜样不是一个解决办法的模式，而是把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和严格的原则性结合起来的一种作法。对于文化，列宁所捍卫的方针导源于同样复杂的情况，离开了当时运用它的整个环境，这个方针就无法理解。的确，最初是列宁不同意革命对任何艺术流派的垄断，而这是苏联当局十多年来的根本立场。列宁在一九零五年的文章中命令文学为党服务^①，在斯大林时期这篇文章是如此粗暴地经常加以引用。其实它是同内部的战斗精神相联系的，它在革命后就不再合适了。无可争议的是，一直到三十年代初，各种文学流派的自由竞争是官方的方针，而且它大体上是苏维埃政权所保证的作法。

然而不久，由于可以理解的政治原因，列宁作出了当头一棒行政压制的例子。面对着无产阶级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②取得群众性的巨大成就以及它提出的由工人有选择地直接掌握文化工作的口号，列宁从一九二零年起就作出了激烈的

① 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版）第一卷，646至651页。

②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一九二五——一九三二年）属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

反应，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理论家们的文化救世主精神，促使他们建立自己的文化机构体系，实际上是同党的机构相重叠的，几乎把政治活动兼并到文化活动中，最后几乎使工人脱离了其他阶层，特别是农民。而当时列宁正努力加强工农联盟。列宁抨击了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从文化出发，具有明显的政治野心，而且表现出同他当时赋予党的团结问题的重要性相矛盾。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导致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专断地修改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章程，并且事实上提出了以后的所有管制措施的模式。这封信也攻击了拥护革命的先进艺术家，即未来派，虽然他们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也发生争吵。这是因为列宁害怕他们的反学术主义同对经典价值的尊重有矛盾，刚接受文化的人民必须通过这一点来开始他们的教育。列宁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当苏维埃政权要避免破坏艺术和扫除文盲之际，把“资产阶级的”这一形容词使用于过去的全部艺术（虽然人们大大地夸大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虚无主义”或提出“打倒陶立克式柱子^①！”“打倒托尔斯泰！”的口号，可能会被误解。但是，《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包含有对未来派的没有根据的侮辱。列宁延续这种作法，限制马雅可夫斯基^②的一首诗的印数。他不喜欢这首诗的风格。

毫无疑问，在列宁启发下写的其他文章中，人们可以发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关于非专业化的论点和未来派功能主义所引起的兴趣，得到了承认。但作者认为尽管这对今后是有益的，

① 陶立克式柱子是最古老的希腊建筑柱型，以朴素和谐见长。

②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著名诗人。早年参加过未来派的活动，后逐渐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一九三〇年四月自杀身死。主要著作有《穿裤子的云》、《穿裤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等。还写了一些剧本。

但它们现在就要求压倒一切则是有害的，辩论始终是复杂的。优先关心通过传统的教育渠道为发展初级教育作出巨大努力，显然是政治上高度的现实主义。反之，认为文化职能的革新——这个充满活力的革命家所提出的最引人入胜的概念之一——应无限期束之高阁的主张是包含有危险的，即某些创作领域重新变成超学术的专业部门，这在以后就成为斯大林时期的一个主要的祸害。不管怎样，在事态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政治直感（人们后来徒劳地要把这些东西奉为永恒的金科玉律）中也包含以当前政治影响为名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和文化互相交叉重叠的样板，简而言之就是，文化事物方面的行政措施的模式。

从社会学论到管制论

在试图把文化局限于它的政治责任以内之后，三十年代后期又出现另外一种限制方针，即对文化的基础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方针，文化的基础似乎最后完全决定了文化职能。一九二五年的著名决议就已经是这样模棱两可的，在这个决议中党表示反对某些垄断倾向，以便使各种流派和各种风格的联邦式的多样化得到尊重。但这只是因为苏联社会仍然由不同的成分（工人、农民等等）组成的，并且这种办法只实行到社会的同一化实现为止，就好象是风格上的差异只不过是各种社会成分的机械反映而已。因此，这个，这个一九二五年的决议后来是作为党的自由时代的宪章留传给后代，而事实上，它也确实使多元主义有可能继续存在。这个决议同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二年的决议没有任何矛盾，这两个议案以斯大林主义所特有的不现实和唯我独尊的专横态度宣称，苏联社会已经“巩固”，已经聚成满

一色的了。文学的各种倾向应停止存在，并按照党的决定融化为单一的协会。在解释文化方面把社会学摆在第一位的作法，从一九二五年起保证了这种演变。

因为出现了矛盾的思想意识的前提，这些前提的逻辑在后来的几十年造成了最具有毁灭性的管制主义。这时候整个苏联社会遭到了不受控制的可怕的镇压浪潮的袭击。但是，必须说在十多年期间——如果说滥用权力的情况没有绝迹的话，则远在一九二九年就发生了一桩这样的事件，一本被检查当局毫无道理拒绝出版的书在国外出版了——这种从理论上加于文化的含糊不清的地位与几乎所有的领域包括诗歌、散文、戏剧、电影、建筑、绘画等令人吃惊的繁荣同时存在。当时苏联的文化是当代欧洲最生动、最有革新精神的文化之一。在许多部门它哺育了很多著名的人材。此外特别是，这一文化的人材和成就是同苏联生活的社会能动性和迅速政治化紧密相联的。许多创作者出自那些由于革命才取得发展的阶层。最有独创性的作品和最大胆的表现形式，是受到了斗争活动的启发的，这种战斗性往往使人目瞪口呆，正象人们从迈耶尔霍尔德^①、爱森斯坦^②或马雅可夫斯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在自发创作方面，可以看到人的才能在自由奔驰中争露头角，这种情景也许比官方的思想更激励人们的热情。这并未带来不好的后果，而是恰恰相反。

这就是说，要对苏联经验中文化和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出判断是多么不简单。很难说，这里面只有不断的、加速

^① 弗·埃·迈耶尔霍尔德 (1874—1940)，苏联戏剧家。曾对苏联戏剧有较大影响，后来受批判。

^② 谢·米·爱森斯坦 (1898—1948)，苏联著名电影导演。曾导演《战舰波将金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伊凡·雷帝》等。

恶化的谬误，因为这种关系既包括有横加干涉的作法，也有很如实的反映，它既有使文化格外丰富的影响（哪怕是出于制造了大量需求的缘故），也有严重的自我毁灭的后果。这是作用着的矛盾所展现的历史上最使人困惑的景象之一。

二、意识形态的变化

十月革命使人民群众思想和行为的改造在社会的变革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有种种困难（国家受到破坏、发生内战等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并不以充分发挥个人的智能、“个性的和谐发展”为唯一目的；它旨在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够“治理国家”。新思想的传播，即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不言而喻，是同积存已久的旧习惯相抵触的。

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斗争动员了最广义的所有文化机构。文化方面这一卓绝的新形势并非没有提出一些新问题。

新政权的文化政策必须接受并保持下述两方面之间的紧张局面，一方面是有计划地支持被认为是进步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保持不同的思想流派和美学流派之间的正常竞争条件。但是，人们知道，情况并不总是那样的。为了了解苏联文化的实际状况，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考虑到它的特殊能动性和它的变化。

社会主义的伟大解放的思想及意义不是只靠大规模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口头和书面的宣传以及教育而深入人的头脑和内心。它们也借助于多种渠道，如通过艺术和文学，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通过榜样，通过日常的实践。即使在今天表示反对或怀疑的人们身上，也可看到这种思想灌输所促成的慷慨热

忧、向往和思想方法。

关于承认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哲学唯物主义，关于国际主义的感情，关于某种意义的平均主义以及集体的团结等，情况都是这样。

同时，从教条出发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伦理上的僵硬态度，文化上的公式主义等，在即使那些自称不满现状的人或持不同政见者身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即使那些自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可能避免不了民族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思想同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结果造成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一种极其复杂的情况，其特点是异类的和矛盾的现象有机地共处（甚至在同一个人的意识中也可能是这样）。

一个时期的政治气候对思想辩论和文化运动如何开展（或者收缩）是有强烈影响的。

本书不打算写苏联文化史，即使纲要也不准备写，而只是抽出几个典型的情况，以便设法看一看意识形态方面的安排是怎样干预文化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个人迷信”、“日丹诺夫主义”、赫鲁晓夫时期，最后再研究一下现在的情况。

十月革命二十年之后，开始了“莫斯科审判”和大规模镇压时期。我们不仅应该考虑苏联和社会主义受到的损害，而且还要考虑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恐怖作法竟然被接受了以及这个现象产生什么比较持久的后果。

让我们大胆假设：关于已经实现了社会的一致、社会主义最终已得到巩固的论点，体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妥协，这种妥协是所谓“斯大林主义”的特点。

其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出身的新工人阶级。他们大量传播农民的思想感情：崇拜领袖、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好大喜功、倾向于搞突如其来的破坏性暴力、尊敬权威、不相信知识分子、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以“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划分好坏）。

因此，（强制加速集体化时）受到最大规模镇压的社会阶级，为工业化提供物质手段和劳动力而蒙受牺牲的阶级，也就是提供这个制度的运行所必不可少的人力、思想和观念的那个阶级。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莫斯科审判及其后果首先打击了党的干部和全国各级的共产党组织。在很多情况下，工人阶级或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成熟干部被新负责人代替了，这些新负责人首先是由于他们盲目相信领导而被选上的。他们往往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他们倾向于用专横的行政手段进行领导，对“指示”有突出的爱好。

“文化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个革命的唯一任务就是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显然未能实现的任务：消灭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传播文化等——使得上述干部的替换成为可能，因为这个革命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初等教育，又不超过这个地步去向文化或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干部在清洗后的党内是完全能适应情况的。一九三零年以后，受过革命锻炼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已无法抵消他们的力量，当集体化暴行造成广泛骚动时，这些布尔什维克立即作出反应，紧密地团结在新领导的周围。

思想方面的公式主义，刚刚在斯大林的权威下出版的《作

为布尔什维克党史中一章) 并被说成是包含所有问题的预先答案的“圣经”这种教理问答课本式的马克思主义, 完全适合这些新干部们的精神状态和他们受到的教育。

然而必须小心, 不要以为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是仅仅由某一个人想出来, 由某一个人颁布的。

稍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但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不同的理论流派已经为之铺平了道路, 例如某个波格丹诺夫^① 思想的非辩证法方面, 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时期传播得非常广, 而且它的某些公式到处渗透; “庸俗社会学”认为可以从阶级根源中直接推论出思想, 象弗里切^② 那样受过旧教育的某些教授用“阶段论”代替了真正的历史运动。在某些领域很快就实行思想辩论的作法, 这种辩论预示了从三十年代中开始成为准则的东西。

拉普领导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拉普妄图掌握文学领导权, 疯狂地揭发其他倾向的作家为革命的敌人。(让我们指出, 在那个组织里的领导人中也有许多人后来遭到镇压, 但他们的方法继续得到采用。)

最触目惊心的例子大概是关于语言学的问题。最初这可能显得奇怪, 而实际上完全不是偶然的。语言在政治斗争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即使人们还没有明确觉察到这一点也罢。因此, 从一九二九年起马尔^③ 的理论被宣布为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们用激烈的词藻揭发其他科学学派的代表, 甚至称那些最富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象波利瓦诺

① A. A. 波格丹诺夫 (1873—1928), 哲学家, 一九零五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 受到颓废和怀疑心理的浸染, 反对马克思主义。

② V. M. 弗里切 (1870—1929), 苏联文学家和艺术研究者。

③ 尼·雅·马尔 (1864—1934), 语言学家, 其理论曾长期影响苏联的语言学。一九五零年斯大林在《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中批判了马尔的学说。

夫^①)为帝国主义代理人。他们攻击发表这些人的著作的出版者,要求清除他们。他们终于得逞了并占据了所有的负责职位。

凭空捏造,有时是光怪陆离的虚构代替了对事实的研究;揭发代替了科学讨论。这样就在—门关键学科的专家当中初步形成了后来的文化政策的主要特点。按照斯大林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本身组成了国家的哲学,因此科学和艺术的每一个领域必须有一个被宣布为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所有其他的都受到谴责,它们的拥护者都被迫屈服或撤职。

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大规模的镇压浪潮被接受或被容忍了。还需要举出下述现象:用宣传在青年中激起热情,这种宣传试图说服青年人相信,从今以后一切都取决于青年(当时主要是新工人阶级的青年),要由青年来发号施令。而这些是发生在那个时候,即内战最严重的后遗症已被消除,新经济政策已经产生效果,居民感觉到最沉重的经济束缚已经放松(取消了粮食卡,降低了物价),苏联在国际上已得到承认,全世界广泛的人民阵线运动把它们的目光转向苏联,苏联更普遍地被看作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主要援军。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个主题也是苏联重要的团结因素,而且在审判时被广泛地利用了。那时也是出现巨大成就和大型企业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莫斯科地下铁道的修筑是一个范例,青年的动员,车站“宫殿”式的装潢,所使用的豪华材料、经济势力和先进技术的显示。最后,让我们补充这一点——这也说明为什么镇压能够被接受的一个相当大的理由——三十年代后半期苏联这个突出的整体,仍然充满了各种潮流,各种向往,各种成就和各种革命原

^① 波利瓦诺夫,苏联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

则。

但是结果“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常常束缚、破坏或抑制了效果。例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著作在隐没多年之后才得以广泛流传。但是对他的著作的介绍和挑选是很有倾向性的。

人们看到了历史和现实遭到篡改，把幻想当做事实，这不仅涉及政治方面（关于莫斯科公审被告的恐怖活动和为德国或日本进行间谍活动的神话、伪造经济统计数字、关于斯大林或内战期间的军事壮举的虚构故事，等等），而且还涉及许多科学方面（这是李森科主义非凡的历史的开端）。

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奇怪但意味深长的表现之一是无冲突的理论。这个理论首先反常地出现在戏剧艺术之中：在有关苏联现实的剧本中，人物之间不能有真正的冲突，因为苏联社会已经不再有矛盾。人们充其量只能设想“好人”和“更好的”人之间的冲突。这个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糟蹋了文化创作，它的理论根源在斯大林对辩证法所作的解释中。他把它说成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的矛盾。而新事物即使看来微小而且不大为人们知晓，最后总是获胜。人们毫不费力地从中得出结论，旧事物即使庞大却微不足道。

这种非辩证观点使人们能够拿出关于苏联社会的一致性以及党和人民在思想意识上是磐石一块的虚设。对知识分子同样采取了思想上妥协的态度。他们也受到镇压、受到出版审查的监督。但同时，“作家”和“学者”得到了恭维和高报酬。尤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采纳了传统知识界传播的一部分思想和态度，例如在文学方面以阿列克塞·托尔斯泰^①为代表的——《新

^① 阿·尼·托尔斯泰（1893—1945），苏联名作家，著有《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粮食》等。

路标》^①的民族主义，还有学院主义、乌托邦主义、实证主义、以思辨代替具体分析的倾向等等。

二

所谓“日丹诺夫主义”就是上述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安排经过战争的考验后的表现形式。

一方面战争松缓了某些严厉的束缚并通过动员所有的力量反对法西斯而使得人们、尤其是作家更加团结和言论更自由，另一方面战争又大大促进了斯大林主义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妥协：讴歌民族的光荣，其中包括讴歌曾同欧洲革命力量坚决作战的象苏沃洛夫^②那样的沙皇军队首领，恢复了军队的传统军衔和制服，向东正教教会让步，等等。

随着胜利而来的相对缓和为期是短暂的。

冷战开始了。

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景色本应具有法国式园林的风貌，却充满了古罗马兵营的气氛。

这座兵营的建筑师日丹诺夫还制订了两个阵营的理论。在他给上述理论定的调子中，这个关于全世界政治斗争的军事化概念要求和平这个阵营从属于苏联，从属于苏共，从属于斯大林。

同铁托的南斯拉夫决裂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从那时起一切都须符合下述著名公式：“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

① 原注：先前敌视革命并侨居国外后来又归附的知识分子出版的文集标题。

② 亚·瓦·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著名将领，一七九九年统率奥俄联军将法军逐出意大利北部。

反对我们。”谁不站齐，就粗暴地把他除掉。很多有声望的人被清除了，在世界上曾经使或将来会使苏联赢得光荣的著作，或者消失了或者无法出版；大批大批的艺术创作、许多科学学科统统被宣布为害人的毒草。历史不断地重写，要多少版本就有多少版本，只要符合当时的决定就行。

因此一本著作、一位象卢那察尔斯基^①那样重要的人物（列宁任命其为文化工作负责人，他光荣担任此职直到一九二九年）也被轻易地清除了。

对领袖的疯狂崇拜成了意识形态功能的主要动力。斯大林是所有各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他是一切科学的主角。他的著作是一切知识的钥匙。不参照他的著作是不可想像的。他的著作是不可想像的。他的著作使先前所有著作都过时了。由于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是多余的。读了斯大林的著作，就是读了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的科学”的最权威最好的版本。

对文学、音乐、造型艺术、生物等，轮流进行了突如其来的粗暴的整顿，等等。

日丹诺夫象迅雷一般革除了最闻名的幽默作家左琴科^②、伟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③、普罗科菲也夫^④、肖斯塔科维奇^⑤、

①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曾任教育人民委员，苏驻西班牙大使等职。

② 米·米·左琴科（1895—1958），苏作家，一九四六年受批判，一九五六年恢复名誉。

③ 安·安·阿赫玛托娃（1889—1966），苏诗人。

④ 谢·谢·普罗科菲也夫（1891—1953），苏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和乐队指挥。

⑤ 德·德·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联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和乐队指挥。一九四八年，被联共（布）中央决议点名批判。斯大林逝世后，上述批判被撤销。他死后，在美国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证词》，对苏进行过激烈的谴责。

哈恰图梁①等。

给艺术和科学规定了狭隘的、公式化的意识形态标准。

到处都有两个阵营的斗争。这个斗争把严格的纪律强加给所有的事情。人们要么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要么属于资产阶级阵营。

正如全部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一样，全部艺术史也是现实主义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

对于现实主义，人们使用处在左倾和右倾之间的正确路线这一政治公式。现实主义处在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偏向之间，自然主义原封不动地再现赤裸裸的现实，而形式主义忽视内容的分析并忽视“现实的形式本身”。这两种偏向都是资产阶级艺术的特点；但最严重的是形式主义，它把艺术变做阔人娱乐的玩物或者是使人民脱离战斗的手段。现实主义从风格上被说成是十九世纪的某些早于所谓资产阶级颓废时期的模式。

印象主义则被谴责为反现实主义的（谴责时所用的词藻同印象派最初公开出现时法国右派报刊攻击它所用的词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此外，艺术必须是人民的（在日丹诺夫看来，这意味着易于被人们理解而且适应一般的口味，在音乐方面，旋律必须有支配地位，正如在民歌中一样）。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党的艺术，意思是它必须帮助党去争取民心，例如宣传普及中央委员会的最新决定。

这一套僵硬的学说是那些被任命去管理和监督文化活动的

① 阿·哈恰图梁（1898—1978），苏联作曲家，苏联作曲家协会理事会书记。一九四八年，被联共（布）中央决议批判。

人必须服从的命令。

同时，人们称赞象《金星英雄》或电影《库班的哥萨克》那样的作品，并且把它们作为样板——如有什么自相矛盾的话，那也只是表面的。在这些作品中，正面的英雄通过他个人的干预就象使用法术一样使一切困难烟消云散，并使集体农庄变得富裕，人们相亲相爱，劳动变成了真正的节日。而这时候正是俄国农村现实情况十分悲惨的时候。

同样，人们把资产阶级科学同“社会主义的”科学对立起来，人们硬要通过生物学方面的李森科，用辩证法和发展规律的一般观点去证明遗传学研究的事实真相本身。

李森科主义的反对者被谴责为信仰主义的信徒并被撤销了领导职务。

伴随着这种科学的假革命的是一种乌托邦，即由于“真正学说”的恩泽，人们能够绝对地掌握自然的规律，使人能够实现人间乐土。《库班的哥萨克》表明了这一点，获得特大的丰收，使母牛变成真正的产奶工厂，生产出奇硕大和味道甘美的水果和蔬菜等。

虚构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记者们立即在热情洋溢的文章中描绘这些小麦、奶牛、水果，而统计数字的人也以计算的奇迹来响应农艺生物学方面的奇迹。

这是“伟大计划”的时代，这些计划用来几乎是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使江河改道以灌溉沙漠，使极地冰雪融化，以及通过种植森林带以大大增加可耕地，等等。

不言而喻，如果人们看不到苏维埃制度的“真正奇迹”，那就不会理解这种规模无比巨大的虚构的作用，这些奇迹是：建立了强大的工业，战胜了纳粹，建立了技术人员和学者的队伍，

在战争大破坏之后飞速重建家园。还有人民向往文化和向往较好生活的热情，对于大大提高人的威力的可能性的信念等。

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状况大大恶化了。

镇压浪潮和揭发运动迭起，发生了“医生案”的假案，反对“世界主义”斗争，反对一切“向西方卑躬屈膝的人”。发生了谋杀、流放（特别是犹太族艺术家和作家）。但是，也有广大知识阶层几乎是被迫作出妥协，不得不公开赞成无法接受的事情，为官方的谴责和辱骂加码帮腔。两面派语言很普遍，如有些批评家内心里酷爱帕斯捷尔纳克^①、曼德尔斯坦^②、谢尔文斯基，能背诵他们的诗句，而在报刊上则疯狂地指责他们为形式主义者，反人民，向堕落的西方卖身投靠的人。在许多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当中，仍然存在深深的难以磨灭的痕迹。

然而，即使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人们也听到一些通情达理的声音，赞成对语言学（一九五零年）或者经济学（一九五二年）进行讨论。一些作家如奥维奇金^③、田德里亚科夫^④比较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和农村的问题。

让我们补充一下，斯大林逝世后，召开了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预备性讨论和后来在代表大会上的讨论都预先表达了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许多要点。作家协会这个机构已经变成一

①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苏联作家、翻译家，著作有《故事集》、《一九零五年》、《日瓦戈医生》、《诗集》等。一九五八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接受。

② O. E. 曼德尔斯坦 (1891—1938)，苏联诗人。

③ 瓦·弗·奥维奇金 (1904—1968)，苏联作家，重要著作有《普拉斯科维亚·马克西莫夫娜》、《这里的工作日》和剧本《娜斯佳·科洛索娃》等。

④ 弗·费·田德里亚科夫 (1923—)，苏联作家，作协理事会理事。近年来发表的作品常引起苏联舆论界的争论。重要作品有：《死结》、《审判》、《野鹤命短》、《白帆》等。

种中央行政机构、一个文学部，然而它当时表明，在它的结构本身中，能够成为解放的工具（当然，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对于某些方面则是决定性的）。在这里，让我们先说一下，匈牙利事件、随后的波兰事件以及最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作家协会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进一步都招来了对作家组织的不信任和加强对它们的控制。

三

正如在苏联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一样，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也引起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对“个人迷信”的批评并没有深入到事情的根源。此外，在对斯大林的公开批评中，赫鲁晓夫所采取的第一步并没有超过一定的限度（见其一九五七年五月对作家、艺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的讲话）。据他看，严重的过失主要是发生在斯大林的晚年，必须小心不要推翻以斯大林为首的党领导的正确路线（特别是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始终被谴责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

在二十大报告关于意识形态的部分中，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具体的经济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部分是决定性的，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应该针对这些问题。

然而，尽管赫鲁晓夫多方回避和限制，二十大政策还是在全苏联掀起了一个巨大的运动。全体人民都渴望了解情况、讨论、思考和革新。新一代诗人和作曲家（“第四代”）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而老前辈的许多代表非常积极地参加到他们当中去。在

受镇压的许多知识分子得到平反之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重建文化园地。人们重新出版了许多长期禁止的著作（巴贝尔^①、左琴科、扎波洛茨基^②等）；人们在音乐会上又演奏起普罗科菲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人在青年时期所创作的作品并灌制唱片发行；人们从档案资料中取出禁止出版的名著，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文学理论方面，巴赫廷的主要著作终于出版了并得到了评论。语言学大师波利瓦诺夫也是如此。在许多学科中出现了创作的激情。

但是，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的政策也是自相矛盾和混乱的。虽然赫鲁晓夫亲自下令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尔多夫斯基^③的《焦尔金游地府》这本激烈讽刺斯大林时期的官僚主义的诗集，这只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他作为大人物的派头罢了。与此同时，他又在粗暴地反对文学领域自由化运动的促进者，反对“第四代”的若干领袖，在马涅什展览会反对非正统的造型艺术家。

特别要提请注意的是党的领导根本不愿推翻在这个领域中原先采取的立场。唯一自我批评的文件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这个决议纠正了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关于穆拉捷里^④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虽然中央委员会承认，那个决议包含有对那些不公正地被谴责为搞反人民的形式主义的有才华的作曲家（普罗科菲叶夫、肖斯塔科维奇、哈

① 伊·埃·巴贝尔（1894—1941），苏联作家，重要作品有《敖德萨故事》等。

② 尼·阿·扎波洛茨基（1903—1958），苏联诗人。

③ 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九一〇—一九七一），苏联著名诗人，主要作品有《走向共产主义之路》、《瓦西里·焦尔金》等。

④ 瓦·伊·穆拉捷里（1908—1970），苏联名作曲家，他的《伟大的友谊》被批评形式主义的歌剧。

恰图梁等人)的过火批评,可是它却又重申,那个决议对于苏联音乐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决议还重复了日丹诺夫的所有基本论点。

对报刊审查,对作家协会的官僚主义工作方法以及警察对各地作家协会的控制也都没有触动。相当多的新一代的代表——二十大的拥护者——进入全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机构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性质。让我们举出那个时期的思想意识的最后一个特点:空想主义的重新兴起。在工农业的主要领域中迅速赶上并超过美国的论点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些热心拥护二十大路线并且想把这条路线推进得更远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空想主义也并不少一些,他们自以为离开大学或研究工作,到外交、警察或宣传机关中担负领导职务,就能够改变事物的进程。又如,新西伯利亚的这些青年科学院院士,他们以为通过向政府建议,根据最现代化的方法,依靠电子计算机制定发展模式,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经济情况。最优秀的专家所做的工作、热忱的倡议,经常遇到政治现实的障碍。这个现实,是因为人们不能或不愿在“非斯大林化”的道路上,在否定过时的或有害的政治结构和精神结构的道路上,在依赖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道路上以及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到底。

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中保持各种禁令、繁琐的监督和行政的方法、采取“稳定”的政策,在“教条主义者”和“自由派”之间维持均衡等做法都取消了思想斗争并保护了“斯大林主义”的干部。其后果是破坏了人们的劲头或把这种劲头引入歧途。这些作法还有另一个后果,就是助长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较为秘密地渗透进来了,而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除了能引起人们对禁果的嫉

奇心外，似乎并没有丝毫吸引人的机会。

这个时期的文化和思想意识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不断地摇摆、时进时退、异常混乱，既有各种希望又留下了未完成的计划。

尽管如此，整个苏联文化还是跟上了我们的时代，恢复了同世界的接触，在许多领域中表现出了巨大的革新能力。在许多部门中，苏联文化变成了活生生的、甚至是丰富的现实，而且又变成了群众的事情。

四

今天的情况极为复杂。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唯意志论的揭露，号召人们对事物抱现实主义的观点，进行有效的管理，强调质量代替了强调数量，这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可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年轻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者中间有影响。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停滞不前引起这些人员从“专家治国论”的角度来重新理解“科技革命”的问题，这种理解得到了官方思想的赞许。

一九六八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摧毁了人们对“更富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的希望，使许多赞成二十大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乃至放弃了社会活动。对“异端分子”的镇压，任意把人关进疯人院，迫使许多在不同程度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逃亡国外，这一切都损害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威望，而且大大损伤了苏联的文化本身，尤其是在某些发达的部门，如语言学。但是，在我看来，最突出的事实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泛滥，意识形态的相对空虚不足以说明这个现象的重要性。举

了避免肤浅的阐述这个问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不久前还占多数但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加速减少的农民（人们预计在世纪末农民只代表不到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同一部分知识分子阶层建立实际的联盟。这些知识分子同农民联合起来反对现在已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这个工人阶级在威胁着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威望和他们的精神状态。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理论家的确在把农村同城市对立起来。他们讴歌宗法社会的农民，把他们看作全部“真正俄罗斯”价值的泉源；他们批评理性主义这种“从西方输入”的思想意识，说它是俄罗斯一切罪恶的因素；他们认为俄罗斯历史命运有其不可抹煞的独创性。同时，这些理论家责备形式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并主张回到文学艺术的传统形式上去。他们欣然把“精神”同“物质”、把生命、有机体同机械对立起来……。

这个运动包括各种很不相同的倾向（见《新评论》第一零八期），显然近来似乎同一个新斯大林派接近。他们的联合攻势的主题是“保卫俄罗斯的古典著作”。多种迹象使人认为，相当数量的、被人称为苏联“左派”的知识分子（革新者、二十大拥护者……）具有同民族主义妥协的倾向。

民族主义在不断扩展，虽然它没有遇到当局极强烈的反应，但看来不可能取得支配的地位。然而它的影响相当大而且充满了危险。还必须看到，在艺术和文学创作领域里，它的影响未必是消极的。因此，所谓“农民”文学的巨大潮流有权说它拥

有高质量的作品：如阿勃拉莫夫^①、别洛夫^②、舒克申^③、瓦连京·拉斯普京^④以及其他人的作品。

另一方面，在文学领域中，所谓“社会学派”的小说也在蓬勃发展，这些小说的作者们在大胆而清醒地探索今日苏联的社会结构以及目前人们的态度和心理状态的历史根源。

象特里丰诺夫^⑤（《滨河街公寓》、《老人》）或阿克肖诺夫^⑥（《体裁的探索》）创作的那些作品，由于它们引起的广泛的兴趣和反响，因而在思想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可以同样评价重建文化园地的庞大工作，这个工作尽管有困难，但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从未停止过。重新出版象波利涅克^⑦、列米佐夫^⑧的作品那样已经脱销的著作，大量出版象迪尼亚诺夫^⑨、季尔蒙斯基那样的“形式主义者”的著作，发掘三十年代的档案，或者发掘长期埋在博物馆收藏室里的美丽图画，都非常有助于在苏联发展自我认识和批判性的思考。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有强迫作家出走、种种禁令和约束等事实，苏联的文化整个说来还是表现出了极其丰富多采和不容置疑的巨大创造力。应该从这个观点去看待一些研究和创作中心始终存在这一事实，有时它们在各省的许多城市中是非常活

① 库·格·阿勃拉莫夫（1918— ），苏联摩尔达维亚作家，重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剧本《新的力量》等。

② 瓦·伊·别洛夫（1932— ），苏联作家，苏联作家协会检察委员，重要作品有《我的森林之乡》（诗集）、《炎热的夏天》（小说集）、《前夜》（长篇小说）等。

③ 瓦·马·舒克申（1929—1974），苏联作家。

④ 瓦·格·拉斯普京（1937— ），苏联作家。著有《活下去，并要记住》等。

⑤ 尤·瓦·特里丰诺夫（1925—1981），苏联作家。主要著作有《大学生》、《交换》、《滨河街公寓》等。

⑥ 瓦·帕·阿克肖诺夫（1932— ），苏联作家。

⑦ 鲍·安·波利涅克（1894—1941），苏联作家。

⑧ 阿·米·列米佐夫（1877—1957），苏联作家。

⑨ 尤·尼·迪尼亚诺夫（1894—1943），苏联作家。

跃的。

还必须看到苏联各民族所引起的作用以及它们为新思想和新形式而越来越经常起的中继作用。

五

因此，苏联在文化方面的经验引起了多方面的思考。

首先它显示出，在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基本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中，任何孤立地、直线地看待这些国家的现实都是错误的。苏联文化这种突出的命运是同各个阶段的政治社会背景给予它的推动、扼制和反作用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不能把其复杂性归结为一条笔直上升的、偶而有些偏差的康庄大道。它所受到的各种互相矛盾的决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引起真正的自我取消，或者甚至是自我毁灭。这种自我毁灭丝毫不是偶然的症状。这个情况证明，在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的国家的政权，如果文化急剧地改变内容，矛盾不会达成一种可以驯服的、次要的协议。文化仍然是构成整个现实的基本成份。苏联精神生活的这些变迁也表明了一定社会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以及为了开展社会主义规划而创造的条件是如何特殊。因此，任何认为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的想法都是轻率的，任何有计划地为显然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使命的行为进行辩解也是轻率的。

如果以时空的距离为理由，认为某些问题苏联显然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在其他背景下开展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会或将不会发生同样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因此，要求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划清追求优势的同一同简

单的专横垄断二者之间的界线，特别重视创作自由、发表不同想法和进行真正的思想交锋的规定，并在这些方面不懈地保持警惕，因为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好处，同时也很容易诱人采取方便的强制办法。此外也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旦缺少了批评这一内容，就只能成为它自身的一个有害的虚影。

结 论

本书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而写的：苏联对法国共产党人，以及更广泛地说，对法国人的生活和前景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正是本书书名《苏联和我们》的含意。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认识苏联的现实，我们的看法也应比过去更确切、更全面。

当然，我们已不再处于这样的时期（至少应该希望如此），即，莫斯科一次管道漏气就证明社会主义不好，或者列宁格勒盖了一幢新房就证明社会主义优越。也必须摆脱那种字面上的对比，工资与工资相比，小麦平均产量与小麦平均产量相比，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相比，因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以美国与苏联为例，它们之间怎能用上述方法来作比较呢？美国是在资本主义阶段产生的，它用对居民的屠杀扫清了过去的组织所占据的地盘，苏联则是在封建的落后状态与工业开始起步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工业发展本身又为资源贫乏和劳动效率低所限制。美国在本土上未发生过现代战争，而苏联曾三次遭到战争的破坏和摧残。美国通过对世界财经和文化方面的掠夺达到很高的平均生活水平，苏联则要费很大力气来摆脱无援的孤立状态。

对充分就业或开垦荒地表示庆贺，对缺乏民主进行谴责，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必须理解为什么这些现象会发生。

这是法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所需要的：必须对苏联和其它国家取得的社会主义经验有更深刻的了解，以便从中吸取教益。

为了进行探索，我们对迄今为止存在的社会主义采取批判的观点。这不是为了与社会主义保持距离，更不是为了对其进行干预。我们几乎完全以苏联方面的文件、事实和分析为依据。持批判观点不等于否定一切，而是从事物的实际运动来研究事物。

一九一七年以来的新事物

实际运动究竟怎样？

一九一七年十月创建了崭新的结构。从此以后，全世界必须根据这一结构的存在来确定自己的地位。

由此产生的决裂把帝国主义，即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抛在一边，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抛在另一边。帝国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现在以一个大国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世界的划分正是根据这一新的形势来进行的。今后，必须在斗争中确定自己的地位。任何民族的命运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首要的阶级问题。

但是，现实并不仅仅是两极的对抗。新的政权从产生之日起，就开始具体地谱写自己的历史。构成这一历史的事件及其在世界上的反响后来便成为当代冲突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这个具体历史，对这历史所作的解释以及人们在这方面形成的概念，决定每个人在这些冲突中所占的地位。这些就是我们准备在这里谈的。

苏联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什么新内容？

苏联的工人阶级以及一般生产者使用的生产资料不再为私人所有，这是最大的，决定一切的变化。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或在贸易中扣佣金的中间商的个人利益不再是社会组织的最终目的。

这给个人生活带来的最主要成果是消除了长期以来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劳动的保障和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

苏联劳动者在劳动和经济、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显然要比其它地方更大，更先进。这在一开始就是如此，后来的情况仍然未变，尽管出现了双重变化，即：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身造成的各种限制，这些限制现在应予取消，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大国在工人和民主运动推动下，很大程度上依靠经受了社会主义实践检验的思想而取得的进展。

消除社会不平等要从基层，首先是从文化方面存在的极端不平等开始。劳动者、妇女群众和各民族的社会地位比其它任何国家提高得快。一种基本上以劳动为基础的财富分配的新形式建立起来了。

过去曾作为沙皇帝国一部分的被奴役，被剥削和落后的国家又获得了新生，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它们突然间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这在全世界产生了影响，而当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力量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得到了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包括苏联和在苏联之后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内的一个阵营。这个阵营拥有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它在世界上还不是多数，也不占统治地位，但它已经改变了国际关系。

这个阵营从根本上说是关心和平的，这是原则立场，也是因为战争对它没有一点好处。现在世界是根据它的地位来划分的，它同时也是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概念和实践的创始者。

它的存在导致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变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的斗争的因素，而不是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通过剥削和战争的办法来解决。或者说，帝国主义国家已不可能挑动各国人民互相对立来解决它们的矛盾；它们面临一系列反帝的压力，除了这些国家人民本身的斗争外，还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后果：经济竞赛、各种交流、人民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必由之路。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以及全世界反帝斗争的相互声援。

这些是决定今天世界形势的实际情况。它决不是局部性或偶然的事件，它涉及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它真正改变着人的条件，使人的生活富有意义并给人的权利以实际内容。

矛盾重重的历史

苏联的历史是充满矛盾的历史。它受由于本身的存在而给世界生活带来的重大矛盾和社会主义早期发展所特有的矛盾这两者之间互相作用的支配。

社会主义仅是在一个国家——俄国——开始的，那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因此引起了一系列的后果。

资本主义曾经对苏联施加巨大压力。至今这种压力还是十分明显的。它迫使苏联在其国民经济和政策，特别是国际政策中优先考虑关系到自己生存的军事问题。它拒绝与苏联进行国家间正常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和竞赛。它组织直接的封锁或引起严重的连锁反应来阻碍苏联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最觉悟的部分仍然支持革命。

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在它之后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具有一些十分鲜明的特征。由于农民占压倒多数，所以就要求农民群众对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积累，国家的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发展作出力不从心的贡献，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政治、思想后果，这些后果无疑对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并使之变形起着决定作用。如果本书中提出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斯大林时期正是标志着与农民群众在思想上的妥协。

但是俄罗斯拥有大量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俄罗斯人民和历史上与俄罗斯人民接近的（即使是殖民地历史）各族人民的力量。这为社会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往往起着先锋作用的俄罗斯文化，对全世界有着无可争辩的影响。由于新政权进行了迅速的革新而获得的成就，使苏联的革命很快在世界上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尽管工业发展和文化、技术、政治教育尚不允许建立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政权已建立起来了。这无疑是国家机构臃肿的根源，其后果至今尚未消除。

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单枪匹马时，它拥有巨大力量和吸引力，使它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冷战又使这种地位得到了加强。紧接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冷战，迫使反帝阵营首先强

调团结。这加强了不考虑各国民族和文化、社会特点而搬用苏联结构和方法的倾向。这在国际工运中也使人接受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阵营——的理论；这一理论显然过分夸大了苏联的作用。不仅仅根据苏联的实力和分量来看待它，而是把它当作参谋长；这一理论还贬低了不同民族形式的具体反帝斗争。

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这一时期，即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情况中断了。在苏联的生活中，这个时期结束了斯大林领导近二十年时间中所一贯采用的强制和肉体消灭的恶劣做法，包括审讯、集中营、可悲的残酷屠杀。但它未能彻底克服斯大林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思想、社会和政治后果。在世界生活中它为国际局势的缓和开辟了道路；一方面，苏共二十大以恢复和平共处的观点取代了国际关系中互相争夺的概念；另一方面，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国际大资产阶级不得不考虑到他们未预料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所推动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重大发展。

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现象深刻地改变了苏联的状况。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了，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已成为多数，它不再从农村居民中大量吸收成员，而是越来越多地由本阶级得到补充和发展。教育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人们称之为“科技革命”的技术变革，以及这些变革所要求的专业，需要巨大的文化和社会变化。知识分子队伍，首先是在教育界和技术界迅速发展起来了。

这些现象与前一时期形成的结构、思想状况和各阶层利益发生了矛盾。生产关系、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以及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不再符合需要。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属

烈变化，导致了一九六五年在工业和农业管理上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的初步成果无可争议，却并不令人信服，看来变化还不够。

阶级关系的变化、占世界第二位的工业生产的产量和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农业走向工业化、生活水平无可争辩的提高，这一切产生了新的问题和不满。要求在增长，表面而持久的社会不平等、与最发达的国家的差距，以及分配方面不能允许的缺点，则越来越使人不能容忍。

这种情况，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积累的性质所造成的。在迫切需要扩大生产的影响下，事实上仍然在坚持优先抓量的发展和国内的重型装配。这比官僚阶层的墨守成规或利益更能使高度集中的计划得以坚持。但集中计划反过来又阻碍工人和基层进一步发挥其积极性和民主的责任感，而这正是许多业已采取的措施所追求的目的。人们看不出，如果没有这种民主活动，如何能有效地克服劳动生产率极低和产品质量低劣的现象。

尽管天天在强调变革的必要性，甚至在最近两次苏共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也十分正式地承认这一点。但看来这些已成为客观需要的变革也遇到思想和社会方面的障碍。

在苏联，人们认为党、甚至社会本身，应该是铁板一块的。这就阻碍了人们实事求是地承认矛盾是变革的动力，也限制了政治行动的手段。这样，困难就被说成是思想上的缺点所造成的（这纯属“教育”问题），或是由于颠覆阴谋（这属于法庭职权范围），或是由于思想腐化（这就需要批评检查）。国家在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孤立，似乎也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所必须付出的极大代价。

坚持过去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结构和运转体制导致了僵

局。可以认为，这种局面最终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人阶级要求更彻底地用民主手段掌握领导和管理权的愿望相对抗。

革命的理想不是根据新的任务不断地向人们展示出来，而更多地是追忆过去。人们感到，在思想理论方面出现了某种僵化。人们认为，世界形势动荡不安，甚至充满着来自那些本应成为盟友的力量（如中国）的威胁。这一切造成了某种消极被动的状态，有时甚至把道义力量歪曲成为思想或活动的代用品。

苏联社会有危机吗？

能否说苏联社会存在危机？

坦率地说，如果危机这个词是指内部矛盾已达到成熟程度而尚未得到解决的时期，那么它并不荒谬。青少年时期的危机是人人必经的动乱和矛盾时期，经过这个时期，人发生了变化，然后有能力在生活道路上前进。从这一意义来说，如果愿意，就可以认为苏联有危机，而且从另一范畴来说，国际共运也有危机。

但如果危机一词象那样被理解成与资本主义危机相似，并由此引出这样的看法，即全世界已进入全面危机，无人能脱逃，那么就必须坚决摒弃这种不怀善意、混淆视听的做法。

当然，光用一个词是无法把事情说清楚的。无疑，苏联处于变化时期。但是不可能预言或设想这一时期将持续多久，以及如何结束。

领导层的变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当然不能。毫无疑問原班人马持久地留在领导岗位上具有某种意义，这首先是要表明连续性，与不稳定和曲折的时期成为对照。但这种连续性已

发展成为一种消极等待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不同派别平衡的结果，尽管这些派别不一定都由同样的人物来代表。在这方面，对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进行的颂扬、晋升和表彰——这并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提高他的威望——事实上是为了表明折衷政策的继续。这一政策虽主张进行某些变革，但并未与旧时期在人们思想上和不同社会阶层中得到如此广泛支持的那些做法和观点一刀两断。

不管怎样，（除非有不测情况），通过领导层的变动，可以加速走向变革，但不太可能发生突变。因为这将意味着，目前的形势不是由于我们上面试图证实的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意志所造成的。

相反，无可争辩的是，目前的形势不仅充满着不安、矛盾和冲突，而且也是处在不断发展之中；苏联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中期来看尽管曲折，但人们已可以在那里看到内部的和缓，生活在逐渐抵消专断的做法。已有了一些进展，这是多少男男女女耐心努力和积极争取的结果。

经过群众讨论，依靠法律和初步实践重新调整的苏维埃工作，以及各种组织的活动所占的重要位置，均成了发展的方向。可以看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完全有可能朝更有效和更进步的自治形式方面变化。一些科学家、作家和演员在努力提高真正的社会觉悟，使之具体表现出来，并摆脱不科学的教条和政治、行政的压力。这是符合青年和劳动人民的愿望的，而工人阶级在他们中间起着越来越决定性的作用。

以上只是几点看法，其目的是探索究竟应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人们可以看到，这同用反面样板的理论把我们自己的前景机械搬到完全不同的形势的那种做法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和平的对外政策

当然，苏联的内部生活不能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分开，因而也不能同她的对外政策分开。

苏维埃制度是在反对战争之中产生的；为了生存，她需要和平。在苏联，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在战争中得益。养肥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军备，正在毁掉社会主义的物资。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战争使人民遭到名副其实的大屠杀，国家成为废墟；战争的恐怖在人们心灵中尚未消失。

国际合作对苏联来说，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项政策。同“西方”的合作在发展。这是由于大资本家出自本身的利益，或者是由于力量对比而不得不这样做。同第三世界的合作是根据政治抉择、国际形势和本国的条件而发展的。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苏联在外交方面提出的倡议总的说来，是符合和平、和缓、集体安全、裁军和实现和平共处的方向的。

但是，不可能通过单方面的决定将实力从国际关系中排除。不当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世界市场，不参加扩张势力的斗争，不去占领战略据点。因而苏联积极参与了这些方面的活动。这不会没有矛盾。

苏联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出现在世界上。她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量很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那样。除了社会主义内部市场外，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完全占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经济还未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它有竞争力，在少数部门，它甚至占主导地位。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对付垄断资本敲诈的有效办

法，对象法国这样一些国家来说也可以这样，如果它们要摆脱对多国公司的完全依赖。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有限，帝国主义在处理同新独立的年青国家的关系中正是利用了这种情况。

相反，苏联经济能够保证国家同时发展军备。物质和社会方面的代价虽然很高，但政治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帝国主义不能再炫耀实力，到处横行霸道。从这点来说，和平并不象反动派宣传的那样靠用恐怖的平衡来维持，而是依靠社会主义世界用自己的力量反击“西方”武装的能力来维持。

苏联还通过自己的革命思想、社会革新及其民族解放的经验的影响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她确实震撼了世界。

还有，苏联对象越南这样的人民的民族抵抗斗争，对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发展所提供的援助，过去和现在都是促使我们时代前进的一个基本因素。

是一个超级大国吗？

然而，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吗？她与美国一样，作为当代世界“两大国”之一，是否推行强权政策？换言之，她是否企图把由于自己在反帝斗争中的实际作用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优势变为政治上的霸权？

说实话，要回答这个问题不简单。我们认为，如果两个大国决定按照以相互的实力为基础而不断进行交易来瓜分世界，那么就有两个超级大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理由很简单：苏联从其社会性质来说，并不象大的工业和银行帝国那样（美国是它们的工具），企图统治世界。

苏联也必须执行世界性的政策。她在世界舞台上遇到美国的阴谋活动。凡是自己在经济、财政、军事或政治上进入的地区，美国都试图在那里起领导作用。她也考虑到在不断变化的许多矛盾中使大国和小国、原来的富国或新富的国家之间对立或靠拢的利害关系。

大家都熟悉这个公式：“我按我的帝国主义的原则进行干预、占领、剥削，我按你们反帝和不干预的原则，禁止你们反对我的行动。”正是因为这样的强盗逻辑，而使苏联常常处于受指责的境地。

那些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进行大屠杀并在世界上布满军事基地（其中许多基地对苏联进行包围）的人却企图要求苏联按和平的原则放弃对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各国人民的援助，这是十足的虚伪。当苏联设法以不同方式在战略区占有自己的地位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加强自己的安全时，这些人又大喊特喊，这也是虚伪的。反之，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进行霸权主义活动时，只要这些活动被认为是针对苏联的，就受到鼓励，这是令人愤慨的。

无疑，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会不引起一些困难。

有时，苏联还要对那些其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国家表示支持。或者是支持一些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外的社会力量领导下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或者是与这些国家发生一些互利的经济关系。

对当时的埃及，今天的伊拉克提供武器援助就属于这种情况。应该说，这类很花钱的援助在一部分苏联公众舆论中引起了一些麻烦。还可提到非洲之角的混乱情况，那里一些年轻而脆弱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的方针同全副武装的战争考虑是相吻合

的，任何人都不能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苏联同法国的关系既是国与国之间必要和互利的关系，又是一个共产党政府同一个共产党人反对的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涉及产生困难的客观原因，苏联既是象其他国家一样的一个国家，又是一个与其它国家不同的国家，因为她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领导着这个国家，而同时她又承担国际主义声援的义务。

然而，国家的利益是存在的，并且应加以维护；一个领导党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而且苏联强大也符合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

但是这里有一条很严格的界线不能超越。世界民主运动是具体的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的综合体，每个运动在领导本国斗争方向对自己的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责。因此，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对苏联的国家利益表示某种程度的屈从，尽管苏联的行动是如此的宝贵和不可取代，否则就会造成严重损害。

对人们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些问题的提法有所不同。

首先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一切国家）不一定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中国就是反对这个大家庭的。阿尔巴尼亚也是这样。北朝鲜也站在外边，尽管她同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保持良好关系。南斯拉夫同经济互助委员会有联系，但不是其成员。经互会开始是地区性的组合（中欧和东欧），后来影响扩大了，现在除蒙古外，它还包括古巴，最近还有越南，但并不都是自动参加的。

大家庭的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这加强了每个成员以及整个大家庭的力量。经济结构的亲近关系有利于劳动分

工、合作和发展中的配合。缓慢而持续的一体化过程正在进行中。然而，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民族利益，随着这些利益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加强了自己的特性，更有能力在国际关系和贸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要求有更多的独立性。

这里有一个矛盾，如果适当地加以考虑，可以于人有益。大家庭的各成员，由于一体化而力量得到加强。他们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比把力量拉平可以更好地开展行动并导致更重要的结果。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原则就是通过协调民族利益的讨论而寻求共同的利益。

然而，事物的发展可能不完全符合这些原则。问题也可以在最强的伙伴通过施加霸权主义性质的压力中求得解决，最弱小的伙伴则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讹诈来抵制这些压力。

在这方面，经互会内部加紧联系以及在政治、思想斗争方面采取共同决定可能引起某些忧虑，尽管这些决定是正当的，并且也属于每个参加国的主权范围。

尤其是北大西洋条约军事集团的存在及其力量的加强，促使中欧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华沙条约军事集团来进行对抗。如果不始终保持警惕，怎么能避免苏联在军事上的明显优势转而成为使别人屈从她的工具？

因此，在总的国际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藩关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没有保证使她免除强权政治的野心。

想用树立统一的模式、利用某国接管另一国，或从外部对国家生活进行监督等办法来加强团结，这是在削弱联盟并推迟共同目标的实现。但在苏联的政策中，不可能不看到这类倾向。同样，对革命进程监督和全面推行一个政治模式的霸权主义模

向（这种倾向遭到各国共产党的明确反对，但人们尚能经常看到其残余）只能有害于在全世界发展起来并表现出不同特点的革命反帝运动的进展。

这一切表明以下观点是危险的，即：认为世界的未来首先取决于苏联领导的政治和军事集团的加强，归根结底取决于苏联本身实力的加强。这种观点将使一切反帝的革命政策从属于这种实力的加强，而事实上它只是这半个世纪来的独特的运动的一个因素，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运动表现为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对陷于不可克服的总危机的资本主义地位进行冲击的人民力量在各国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带来不同的成果。

换言之，“革命不能输出”这句常说的格言越来越强烈地具体表现为这样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大家的事情”。

苏联是社会主义吗？

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我们知道人们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常常是以“三段论”的方式提出来的：你们法国共产党人说，社会主义就是把民主进行到底，而你们可以观察到，民主在苏联根本没有进行到底，因此你们得承认，苏联不是社会主义。

让我们来谈谈这一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谁也不或多或少是社会主义者呢？这个词本身没有问题，但它象船舱一样，装着许多货色。它可以是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普遍愿望所表示的一种敬意，也可以是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极大地鼓舞广大群众这一事实的无可奈何的

承认。

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库集中力量企图使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在劳动者心目中威信扫地，同时又试图利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变种上面贴上社会主义标签而加以宣扬。

对这些“社会主义”——瑞典的、非洲的、中国的、苏联的、西德的，还有许多别的国家的——如何辨别呢？我们把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说成是科学社会主义，以表明这是人类发展客观上必经的阶段，但这种定义也可能是武断的。

因此，只有实践、具体的实践，才能使人识别哪些是社会主义，那些不是，这就要看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并决定他们存在的社会关系的组织中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工人阶级革命行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与剥削社会的特点相比，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一般特征，除此之外，它对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具体描绘，更没有对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加以描绘。即使这样做了，也需用实践来检验。共产主义难道不正是事物的真正运动吗？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化之前，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实践证明，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创立一个只需根据不同的地点和条件作些调整的社会样板的历史使命。它的使命，尽管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却更多地是为在全世界创造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发展条件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因此，不能象一个国家颁布法律而人人必须遵照执行那样宣布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如果存在规律的话，只能象一切科学规律那样从无数次反复的实验中得出，而目前社会主义还不够发展，也不够多样化，不足以得出自己运动的规律。

可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看来并不单纯是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一般（社会主义）只存在于特殊（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中，而特殊只是一般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更不是通过达到检查表规定必须达到的一系列标准而产生的。一个具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普遍蓝图的运用，而是独特的创建。

这绝不是说，必须依靠运动的自发性。对社会现象的实质以及对人类历史动力的科学认识能够使人作出方向性的预计，作为革命运动的理论指导。

一个社会、经济体制或组织的性质取决于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交换的方式，以及这种所有制决定的政权的类型。社会主义可能有的特征最终可归结为两个问题：能创造并管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大企业和大机构的社会所有制，以及从中产生的政权的性质。

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即最大限度的自由，那么必须看到剥夺大家劳动成果的私人占有制完全不可能保证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也不可能保证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因而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至于社会主义的纯粹人道主义的典型定义，如公正的制度、平等的制度等等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没有指出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社会力量。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把作为社会、政治领导力量的资本家排斥在外，即把发展的目的颠倒过来，从个人的利益变为劳动群众的利益。事实充分证明，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决定性的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工人阶级是使现代化的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并且没有任何利益要去剥削其它劳动者的社会阶级。

在苏联正是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曾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在那里是正在发展的现象，从国家所有制发展到每个

生产者真正成为生产主人的自治管理制度还有漫长的道路。我们也曾指出，工人阶级的政权不是通过简单的决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的。它需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变化，远不是简单地由国家机器里由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

这些看法也许会使人更好地懂得社会主义概念的实际意义，它经历着符合这一运动所产生的矛盾不断得到解决的一系列阶段而向共产主义过渡。

因此，不必等到路走完才来判断道路的方向。相反，也许要运用一些不过于绝对但更符合现象的实际情况，甚至更符合现象本质的看法。我们不再这样说：苏联存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工人阶级政权，因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宁肯这样说：生产资料成为大家所有，因而不属于任何人，但它由国家来管理，这种所有制将发展为使生产者本人真正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管理人（经济民主），政权不再是剥削阶级的政权，它不是一个新的官僚阶级的政权，也不是一些机关的无名政权，而是面向工人阶级并部分由工人阶级指导的政权，它在发展过程中将通过劳动者责任心的不断加强（政治民主）来克服矛盾，这种发展是艰难的，时起时伏，但显然是越来越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社会主义的多样化和发展

说社会主义确实存在，这完全是合理的。但社会主义的存在形式是多样化的，十分不同的。否定单一样板的概念，意味着过渡道路的不同，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形式的不同。

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十分不同，它们之间存在利害矛盾，但这并没有妨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合的一致性。为什么社会主义就非得另一样呢？

在两个无可置疑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对立。为什么要无视这一事实，并把它看成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以致无法作科学分析呢？设法进行分析不是更好些吗？

所以说，社会主义并不消除民族利益的对立，这种对立没有通过合作来解决，反而引起一些危险的行动，直至发生武装冲突。这是事实。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以便确定尊重各民族差异的形式来促进联合而不是造成分裂。对今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从中吸取教训。

社会主义的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历的阶段应该完全重复，或根据不变的顺序连接起来，相反它意味着不同的经验正在积累。

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一定经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按顺序重复的一系列阶段。各国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内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认为每个国家可以从符合自己发展水平的阶段开始，然后再一步步地向前发展，那是简单化的和荒谬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地前进。

马克思曾经注意生产方式发展的性质。关于封建主义，他曾指出，当一种生产方式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然后在几个国家里建立时，它便拥有更广泛的基础，并且采取更典型的形式。他认为，资本主义也在重复这一现象。这一看法对研究社会主义如何在当代世界中发展是有意义的。

请注意，如果认为当时落后的俄国的那种“原始社会主义”、“古老社会主义”现在可以取代在那些资本主义发展了生产力、

帝国主义和工人斗争的国家中业已成熟的、先进的社会主义，那就是无视事物的发展。明确地说，我们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将不会是“不典型”之后的典型社会主义，不成熟之后的成熟社会主义。马克思概念中重要的东西是：它排斥了重复性。

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我们有一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清单，共十五个。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被列入清单：国家必须由真正的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吗？那么，如何评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以及柬埔寨处于社会主义的那一段呢？我们不要从中得出任何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这方面任何死板的做法，任何硬性规定哪些该接受、哪些该否定的分类，无疑是过时的。

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有多种社会主义，以及好几条不同的和不变的发展路线。当然，我们称我们争取在法国实现的社会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可以把历史上形成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为“专制社会主义”。但这不是要确定一些不同的蓝图，供人们选择后加以照搬；也不是要用一系列小样板来取代单一的样板。问题只在于突出强调一定时期某个具体事例的特征。互相交流和影响无疑是创造今后社会主义不同形式的因素。我们不认为，发展的结果将是形成统一、普遍的模式，但可以设想今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在许多方面互相学习。

人们当然会怀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占统治地位、帝国主义尽管在后退并处于历史防御地位，但仍然有广泛活动余地的世界里，能否建立起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我们的共同点

但是反过来，如果对象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能够把特殊

形式的、避免社会主义在最初几十年内发生的一部分强制和专断手段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前景，这无疑是由于这些国家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以及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所取得的力量和影响。这也是由于它们有可能利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是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给现代世界带来的变化。

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工人阶级、更具体地说法共和苏共之间应建立的关系的性质。

上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用“国际声援”取代了表达我们互相关系的原则的公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这类公式的优点是它以一系列经验为依据，但其缺点是人们头脑中形成一些现成的概念，掩盖了发展和变化。还是让实际情况来检验书面的提法吧！

不再存在无条件的、即单方面支持的问题，也不存在“忠诚”的问题，更谈不上去谴责许多人在建立第三国际时所想的国际党，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在提的正是这样的建议。如果说这些公式和做法过去曾实现过，那么它们存在的必要性早就消失了。法国共产党人要在法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前途方面对法国人民负责。

我们当然不支持我们所谴责的镇压行动，也不支持我们不赞成的立场。

但是，严格地说，我们也不“支持”苏联在世界力量对比中具体表现其积极份量的那些具体措施、政策和行动，即我们不能对此负责，尽管我们认为这是一股有利于我们自己行动的历史、政治潜在力量。

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不仅是参加国际阶级斗争，超越国界

联合一切主张把各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对国际的工人声援存在着一些客观基础。我们时代变革的关键，即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资产阶级被清除并没有结束这一过程，而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为了推动这一进程而互相支持、交流经验、互相从各自的胜利中得益。我们意识到，这不是单方面的现实，已进入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在其发展、思考、行动和演变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我们的存在和我们斗争的份量。我们维护我们民族的经验已向我们证实了的社会主义发展因素：政治自由、经济发展、社会成果、国际斗争等。

但是，在建设未来方面的这种互相支持的条件是各自的独立。

我们充分意识到苏联人民在维护和平和争取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中肩负着重大责任，但我们不因此而认为苏联是决定一切的唯一堡垒、未来的组织中心。在当代的世界中，十月革命是目前形势的根源，各国人民、工人阶级和革命政党已取得了改变本国生活并在国土上制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为继续削弱并推翻大垄断资本的统治而采取的独立行动则是他们自己的革命职责。这就要求他们明确否定在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艰难发展中他们认为根本上背离社会主义的一切东西。

这就要求新的合作形式，包括思想辩论和批判。在相互关系中采取明确态度，这是收得成效的条件。有不同意见，这没有什么不光彩，在这种情况下，坦率地进行讨论，要比表面上完全一致好得多。

这也许要求对干预这一概念有一个尽可能一致的看法。如果对执行共同的原则，或就一些对对方产生影响的行为发表自

己的意见，这是否也叫干预？这与企图在对方挑起对抗行动，或干脆支持兄弟党的政敌是不同的。难道不是正常的事情吗？

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来考虑苏联同民主的、接着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将为此而努力）法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把它看成完全亲密无间则是徒劳无益的。执政的共产党将以全民族利益为依据，彻底改变国家对外关系的性质。但是认为法苏民族利益的任何矛盾、属于观点或目标不同的一切分歧都会消失，那也是幻想。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符合两国利益，但不能跟着走。民主的法国不会脱离一个集团而参加另一集团，摆脱一种控制而接受另一种控制，不跟这些人走而跟那些人走。如果建议社会主义的法国要参加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看来这不是美好的前途。社会主义的法国将与苏联建立并发展符合民族利益的关系，而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屈从目前阻碍我国发展这种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将使会晤和合作的共同点增多。

各国人民运动的高涨

在我们西方世界，有人在舆论方面开展大量的活动以制造混乱，把维护剥削、屠杀和蔑视人类贡献的旧制度说成是对时代的需要，甚至是未来世界的前奏。

这是在撒谎。新世界存在缺陷和错误，它有时还沾上旧的习气，许多矛盾难以区别和克服，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陷入历史的悲观主义而听天由命。

我们完全懂得，经济发展的波折、生活方式的变革或文化

上的进展，可以在体现物质力量或人们的判断方面为这个或那个重大的制度提供有利条件。但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各国人民运动的高涨，消灭剥削而解放出来的创造力，即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一切。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决定未来的，不光是苏联的成就，还有苏联在世界上引起的变化和创造的气氛。苏联不是、也不可能是未来的体现，不是必须仿效的模式，也不是应该反对的反面样板。她比这些更多，也许更少：仅仅通过苏联报刊的日常报道来判断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而无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普遍因素，这将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时代的深刻意义是正在改变时代的社会变革。历史在加速前进，因为全人类现已组成一个统一体，触及一发而牵动全局。如果一九一七年秋季的一天，变革没有在涅瓦河^①开始的话，那就会一事无成。从那时起，一切都受到那里发出的光芒的照耀；但这一光芒遇到任何东西又沿着原路反射回来，化整为零，而最初的发展只是组成革命运动错综复杂的互相影响的混合体中的一个因素。

① 涅瓦河：苏联的一条河，流经列宁格勒，注入芬兰湾，全长七十四公里。